

学校编码: 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 号: 10320141152280

UDC_____

厦 门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与当地民族主义运动
(1940—1945)

Japan's Invasion and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st
Movements(1940-1945)

贾 超

指导教师姓名: 陈遥 助理教授

专 业 名 称: 世 界 史

论文提交日期: 2017 年 月

论文答辩时间: 2017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17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 阅 人: _____

2017 年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获得()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贾超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 1. 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贾超

年 月 日

摘要

本文是关于 1940-1945 年间日本侵略东南亚的政策（日本称“南进”政策）与东南亚当地民族主义运动互动关系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日本的军事侵略同当地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以及阐述这种演变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本文首先回顾了日本的“南进”政策和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各自的发展脉络，并从中探究二者的早期互动所产生的影响；再以二战爆发之后到太平洋战争初期这段时期内日本与同盟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博弈为视角，来研究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者的反应及动机；然后对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双方的互动，则选取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和荷属东印度为三种主要类型的代表加以研究；最后再从整体上分析日本的侵略对东南亚产生的影响，并认为后者在战后获得独立与日本的入侵并无决定性的联系。

总之，日本对东南亚的的侵略与占领异常残暴而又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与此同时，也有必要认识到日本的侵略与当地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日本的军政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一批战后东南亚的军政领袖，并部分地影响到了战后东南亚的政治演变路径。对此问题的研究，将有利于中国更加深入理解造成当代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现状的历史背景，也有利于当前中国制定恰当的对东南亚和日本的外交政策。

关键词：二战；日本；侵略；东南亚；南进；民族主义。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s abo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Japan's southward expansion(Southern Advance/Nanshin)and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st movements from 1940 to 1945. By indica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Japan's invasion and nationalist movements, to interpret the reason and influence of this evolution.

The dissertation firstl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venation of two objects respectively and discusses the early interaction between from Meiji period to 1930s; secondly it expounds the impact of two different ideologies: “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Daitōa kyōeiken) and *Atlantic Charter* to the nationalist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irdly it illustrates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action with French Indochina, Burma and Dutch Indies during the Pacific War; lastly it analyzes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as a whole of Japan's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policies.

In the end, this paper shows Japan's intentional or unintentional activities indee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s, although its military force has retreated, and shape the political/military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path of Southeast Asia after Second World War.

Keywords: World War II; Japan; Invasion; Southeast Asia; Southern Advance; Nationalism.

目录

导论	1
第一节：选题缘由.....	1
第二节：研究现状.....	4
1、日本：长期与全面.....	4
2、欧美：视角多样.....	8
3、东南亚：立足本土.....	11
4、国内：有待深入.....	12
5、档案史料.....	16
第三节：关键概念界定	17
1、地理与历史概念.....	17
2、政治与军事概念.....	19
第四节：研究方法.....	21
第一章：日本的“南进”与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渊源 ...	23
第一节：日本的“南进”轨迹.....	23
第二节：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31
第三节：两者的早期互动	40
小结.....	44
第二章：观念的博弈：“大东亚共荣圈”与《大西洋宪章》 ...	45
第一节：日本在战时的进军与西方在东南亚殖民秩序的逐步瓦解	45
第二节：建构“大东亚共荣圈”	54
第三节：《大西洋宪章》的冲击.....	59
第四节：民族主义者的反应.....	63
小结.....	67
第三章：日本占领期间与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互动类型..	68
第一节：法属印度支那	68
第二节：英属缅甸.....	75
第三节：荷属东印度	84
小结.....	89
第四章：“南进”的“冲击”与“遗产”	90
第一节：“南进”与东南亚民族主义：“真实”与“虚幻”	90
第二节：“南进”的实质：“破坏”与“掠夺”	94
第三节：“双重枷锁”与“双重使命”	100
小结.....	107
总结	108
参考文献.....	112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1. The origin of the issue.....	1
2. Literature review.....	4
2.1 Japan.....	4
2.2 West.....	8
2.3 Southeast Asia.....	11
2.4 Domestic.....	12
2.5 Historical documents.....	16
3. Key concept definition.....	17
3.1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concepts.....	17
3.2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oncepts.....	19
4. Research Methods.....	21

Chapter 1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Southern Advance and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st movements.....	23
1. Japan's early Southern Advance.....	23
2. The rise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st movements.....	31
3. Early interaction.....	40
4. Summary.....	44

Chapter 2 The concept collision: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and <i>Atlantic Charter</i>.....	45
1. Japan's invasion and the collapse of western order.....	45
2. To form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54
3. The impact of <i>Atlantic Charter</i>.....	59
4. Nationalists reaction.....	63

5. Summary.....	67
 Chapter 3 Main types of interaction during the occupation.....	68
1. French Indochina.....	68
2. British Burma.....	75
3. Dutch Indies.....	84
4. Summary.....	89
 Chapter 4 The impact and legacy of Southern Advance.....	90
1. The reality and illusion.....	90
2.The truth.....	94
3. <i>Double burdens and double duty</i>	100
4. Summary.....	107
 Conclusion.....	108
 Bibliography.....	112

导论

日本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的侵略扩张影响了亚洲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在 1889 年《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时，日本不过是由包括四个大岛在内的数千个岛屿组成的国家，然而之后五十余年的军事扩张使其成为了在东亚大陆和太平洋上新兴的帝国主义列强。到了 1942 年末，北至阿留申群岛，南抵爪哇海，东起吉尔伯特群岛，西临印度边界在内的广大区域都处在日本军队的控制当中，这一连串军事胜利似乎证明了白人作为亚洲主宰者的历史已然被终结。然而，日本作为侵略者的本质使其无法有效整合占领区的力量以对抗实力占优的同盟国。

1945 年以后，日本丢失掉了帝国宪法颁布后的所有扩张“成果”，而“帝国”这一字眼本身也成为了历史。日本帝国的崩溃使亚洲出现了权力真空，一些殖民帝国试图卷土重来，然而他们很快发现，那些之前无论是选择与日本合作还是与之反抗的当地人似乎都不会重新接受异族人的统治。战后的东南亚成为了民族主义的天下。尽管过程曲折且并不同步——一些国家很快获得了独立，如缅甸和菲律宾，而印尼和越南却陷入同殖民者的战争——但东南亚最终摆脱了受支配的命运。这种结果同日本之间的关联程度有多深，换言之，除了残暴和深具欺骗性的侵略行为之外，日本在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将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重点。这将有利于中国深刻理解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并有利于中国制定对东南亚和日本的外交政策，并最终有利于中国的崛起。

第一节：选题缘由

二战结束七十余年来，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认定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因素。前段时间爆发的 APA 酒店事件又将此问题推到了前台，中韩等国一如既往地纷纷表示抗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南亚等国在这一问题上似乎吝于表态，有时甚至会出现对日谅解的声音，上至政府

官员，下至普通民众，似乎都对声讨日本缺乏兴趣，至少不如中韩等国那么态度坚决（如表 0-1 所示）。

表 0-1 关于日本是否已为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军事行动展示出足够歉意的调查（百分比）

	否	是	没有道歉的必要	不清楚
韩国	98	1	1	1
中国	78	4	2	16
菲律宾	47	29	19	5
印度尼西亚	40	29	6	25
马来西亚	30	22	10	38
澳大利亚	30	29	26	16
日本	28	48	15	9

资料来源：Bruce Drake, *Decades after war's end, some of Japan's neighbors still see need for atonement*, August 15, 2013,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3/08/15/decades-after-wars-end-some-of-japans-neighbors-still-see-need-for-atonement/>, 2017 年 6 月 15 日。

而近几年，随着南中国海形势的持续紧张，日本这一原先的侵略者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之前的经济交往，更试图在地区事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东南亚国家也乐见于此。即使考虑到日本战后对于东南亚进行了赔偿，并通过贸易投资及经济援助等方式重塑了自身形象，但理应作为受害者的东南亚对于昔日的侵略者表现出相对的“宽容”，仍是让人费解的。如果将目光回溯到历史本身，就会发现今日的东南亚诸国在二战时期都分属不同的政治实体——英属缅甸、英属马来亚、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等——换言之，东南亚诸国的真正建立都是在战后，日本势力被驱逐之后。这个时间点是耐人寻味的，尽管无法断言，但正如拿破仑的征服催生了欧洲众多的民族国家一样，^①日本人的占领同战后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之间究竟有无关联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①将日本人的征服同拿破仑一世对欧洲的征服进行比较的观点可参阅 Nicholas Tarling, *Na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If the people are with u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p.121.

问题。

其实在西方，很早之前就有学者发现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约翰·托兰（John Toland）就认为“我认为美国在二战中的最大错误是没有认识到她正在同时进行两场完全不同的战争：在欧洲对抗另一群西方人和他们的价值观，纳粹主义；而在亚洲则不仅是一场对抗一个为求强图存而进行扩张的民族战争，还是一场对抗整个亚洲大陆的意识形态斗争。数百万亚洲人将日本的战争看作自身的战争，看作一场种族和肤色的对抗。他们同样将日本的胜利视作从西方统治下的解放。”^①而在日本，众所周知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已经盛行多年，并成为右翼人士的主要论调。即使是承认侵略中国事实的左翼人士，有时也会将中日战争同太平洋战争切割开来，并认为后者的性质更接近于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将同欧美殖民者对抗的日本军官兵视作“解放者”。

中国的学者已经充分并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侵略亚洲的残暴性、欺骗性，及其给亚洲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逐步认识到当今世界各国对于日本谅解程度的不一及其原因，以便更好地处理复杂的东亚国际关系。历史学往往为现实所服务。时至今日，在世界政治局势总体转右的背景下，日本也在谋求恢复地区性大国的地位，并试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获取更多话语权，而东南亚国家出于对抗日益强大的中国的考量，也在考虑引入更多的日本势力作为制衡手段。而正面临国内政局动荡的特朗普政府恐怕也会不得不考虑将日本这位盟友推到亚太博弈的前沿，如此一来日本所面临的处境也同历史上选择“南进”战略时期的处境发生了微妙的契合。这一现象应该引起中国学界、政界和舆论界的警惕。

通过对日本在历史上同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间的互动进行再阐释，来探究战后东南亚国家对日本态度变化原因的合理解释，进而对当今东南亚国家同日本关系的演变做出合理推断。对于中国来说，在正确认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欺骗性的同时，也有必要充分重视并深刻理解东南亚与日本在历史上和当前的关系状况及其原因，以便于中国政府制定恰当和与时俱进的对东南亚与日本的外交政策。

^①John Toland,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foreword.

第二节：研究现状

尽管日本在东南亚的统治相对短暂，但仍对东亚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国家在今天对于日本的观感，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研究这一课题的现实意义。而关于日本“南进”政策^①的发源、演变、实施过程以及造成的影响与后果等，学界已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问世。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影响也比较大，而欧美和东南亚等地的学者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问世。相较之下，国内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有待发展的阶段，研究视角和方法还比较单一，影响力还比较有限。

1、日本：长期与全面

在日本，对南洋和东南亚的研究由来已久，考虑到时间上的延续性，笔者将明治维新后至 1945 年战争结束这段时期的研究也考虑了进来，并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节点分为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阶段分别论述。

战前日本对“南进”的研究可主要分为前期的民间学者的自发研究和后期的官方调查研究。

明治维新开始之后，在以“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为口号走上对外扩张道路的大背景下，至 19 世纪 80 年代，日本出现了一批鼓动南进的学者，其中以志贺重昂和竹越与三郎最具代表性。志贺重昂在其 1887 年的著作《南洋时事》^②中主张日本应向海外进行商业上的扩张，将南洋从白种人手中夺回来，在本书的结束语中他还特别强调在“海外各地创建商业上的新日本”是当时日本人的使命和要务。而曾担任国会议员的竹越与三郎则在 1910 年的《南国记》^③中认为日本作为岛国向大陆扩张是不明智的，日本的未来“不在北方而在南方，不在大陆而

^①南进政策为日本大正时期至二战之间的重要国家战略之一，可分为大正南进期、中国抗日战争前期、太平洋战争等三个时期。广义政策施达区域则涵盖华南、台湾、东南亚等。这一政策是相对与“北进”政策而言的。南进政策的实质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一种。本文为了行文方便，并尽量保持历史原貌，仍沿用“南进”政策这一概念。

^②志贺富士男编《志贺重昂全集》（全八卷）、志贺重昂全集刊行会、1928 年。

^③竹越与三郎《南国记》、东京：二酉社、1910 年。

在海洋”，日本人更应该关心的是“将太平洋变为自家内湖的宏图伟业”^①。尽管这些人物的著作及观点对当时的日本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这样一时期日本的扩张重心仍然放在大陆地区，对于南洋地区则只是以鼓励贸易和移民为主。

进入大正时期，由于在一战中获取了原属于德国的太平洋岛屿，日本对于南洋的重视程度开始与日俱增，一些半官方、官方甚至军方的团体及个人开始加入到对于南进的调查和研究中来。而早在 1894 年，德富猪一郎（德富苏峰）就在为当时的大藏大臣松方正义写就的《占领台湾意见书》中提出日本将来必须采取“北守南攻”的方针，并以台湾为基地向南方发展^②。而在割占台湾后的翌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中将就曾考察过印度支那和暹罗（今泰国）等地的地理情况，又在两年后派遣明石元二郎少佐前往菲律宾等地考察，并与当地的民族独立势力接触。^③这些举动都说明了日本统治高层已逐渐将南方作为潜在的扩张方向。而后在 1915 年 1 月成立于东京的南洋协会则是一个以财阀为主要成员的半官方团体，在其宗旨中就含有鼓动日本向“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苏拉威西、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等南洋诸岛”方向扩张以攫取当地资源的潜台词^④。事实上，该协会不仅通过创办刊物和出版书籍宣传南进思想，更通过调查东南亚的政经舆情和为当地日资企业培养人才等活动来促进日本在当地的经济扩张。除此之外，从 1922 年 4 月正式设立南洋厅和 1923 年修订《帝国国防方针》上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和军方尤其是海军正逐渐将南洋地区的战略地位上升到国家层面，这也为今后日本全面南进埋下了伏笔。

而到了昭和时期，随着日本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对于南洋地区的调查研究也越来越频繁和深入。除了之前提到的南洋协会的各支部外，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台湾总督府下属外事部及官房调查课、海务院情报课、农林省总务局南方资源调查室等大批官方和军方机构都参与到调查中来，不过其目的大多是为了之后的军事扩张进行先期准备。

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日本战败投降这段时期虽然不长，但在日本国内还是保留了大量关于日本在东南亚实行军政时期的文件档案等一手史料。同时在这一时期问世的研究也多从为当时日本在东南亚实行统治提供帮助和借鉴出发，或是

^①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 年、51 頁。

^②矢野暢『日本の南洋史観』、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 年、103 頁。

^③德富猪一郎『陸軍大將川上操六』、東京：第一公論社、1942 年、165～166 頁。

^④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 年、76 頁。

为军方提供更为详尽的占领区的地理、人口、民族和宗教等资料和数据，或是鼓动和宣传所谓的“解放亚洲”、“南方共荣圈”和“南方生命线”等概念来为战争寻求国内民众的支持。如1944年由三省堂所编的《南方文化讲座—民族及民族运动篇》^①便以东南亚不同地区的民族构成及民族运动史为切入点，鼓吹为创造新的“共荣圈文化”而对南方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进行回顾是十分必要的，这种观点在当时曾一度盛兴。

而随着日本的战败，在战后初期作为反思战争的需要，对于“南进”政策的源起、过程和影响的系统研究开始逐渐问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原大本营作战科科长服部卓四郎大佐编写的战史专著《大东亚战争全史》^②。该书内容涉及广泛，资料丰富翔实。得益于其原大本营参谋的便利身份，服部获取了大量涉及大本营和御前会议决策的一手资料，并通过其流畅的文笔，较全面地揭示了日本从策划和发动“大东亚战争”再到最后战败投降的全貌，并列举了大量珍贵的经济数据，对于研究日本当年国家战略的制订以及在东南亚的统治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当然，也同样受限于作者的身份，书中的一些观点和主张也并不能为所有人接受，不过这也同样为从日本视角出发来认识那场战争提供了契机。无独有偶，另一位拥有传奇经历的前大本营参谋瀨岛龙三也撰写过对于这场战争的回忆录，在这本《大东亚战争的真相》^③中他对早年从事参谋策划作战的经历进行了梳理和反思。而另一位在南进问题研究上成果卓著的学者便是原京都大学教授矢野畅，他在《“南进”的系谱》^④、《日本的“南进”与东南亚》^⑤以及《日本の南洋史観》^⑥等一系列著作中对日本“南进”政策思想上的渊源、发展和演变，日本商人对东南亚的投资、开发历程和日本移民在当地的生存状态做了系统的概括，为了解战前日本对东南亚认识和行动的入门。同时他也在著作中对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虚妄性以及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建进行了论述，并且总结了这一段历史的给日本带来的教训，可谓是全面性和客观性兼备。而另一位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后藤乾一的著作《近代日本和东南亚—南进的“遗产”和“冲

^①三省堂南方文化講座刊行係編『南方文化講座—民族と民族運動篇』、三省堂、1944年。

^②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全4巻）、鱗書房、1953年。

^③瀨島龍三『大東亜戦争の真相』、東京：PHP研究所、2000年。

^④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年。

^⑤矢野暢『日本の「南進」と東南アジア』、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75年。

^⑥矢野暢『日本の南洋史観』、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年。

击”》^①，则对近代以来日本对东南亚的认识、东南亚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地位和日本军政统治在当地造成的冲击及遗产做了综合论述。他的另外一本著作《东南亚眼中的近现代日本——围绕“南进”、占领和去殖民化的历史认识》^②则是关于日本与东南亚在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时期的关系史研究，并通过研究日本的外交官、陆海军武官和残留日本兵等不同层面的日本人在战时同印尼的互动来探究其对印尼独立革命的真正意义，并在最后着力批判了日本学界存在的“解放战争”、“自卫战争”和“独立贡献”史观。

信夫清三郎所编的《日本外交史》^③叙述了从1853年佩里舰队来日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共120年的历史，分析了这段时期日本高层外交政策的演变，并对其对外侵略政策进行了批判。佐藤诚三郎的《近代日本的对外态度》^④和冈本幸治的《近代日本的亚洲观》^⑤均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对东南亚的认识的起源、演变和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仓泽爱子的《东南亚史中的日本占领时期》^⑥则论述了日本占领东南亚期间实行的军政和经济统制给当地造成的影响。而日本历史学研究会所编的《太平洋战争史》^⑦和细谷千博的《太平洋战争》^⑧则对日本所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日本又称“大东亚战争”）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对于了解日本武力南进时期的国际大背景具有一定帮助。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如小林英夫的《日本军政下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与军票》^⑨、《“大东亚共荣圈”的形成与崩溃》^⑩和安藤良雄的《太平洋战争的经济史研究：日本资本主义的展开过程》^⑪等，都着重探讨了日本在这一对外侵略扩张时期中在占领区所实行的币制改革、产业开发和资源掠夺等经济政策的演变。当然，也有一些著作的观点颇具争议性，如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所编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⑫中的观点就同当下大陆对于中日战争

^①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南進の「衝撃」と「遺産」』、東京：岩波書店、1986年。

^②後藤乾一『東南アジアから見た近代日本——「南進」・占領・脱植民地化をめぐる歴史認識』、東京：岩波書店、2012年。

^③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上下冊）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④佐藤誠三郎『近代日本の対外態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

^⑤岡本幸治編著『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観』、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8年。

^⑥倉沢愛子『東南アジア史の中の日本占領』、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97年。

^⑦歴史学研究会編『太平洋戦争史』（全6巻）、東京：青木書店、1973年。

^⑧細谷千博編『太平洋戦争』、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

^⑨小林英夫『日本軍政下のアジア——大東亜共栄圏と軍票』、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

^⑩小林英夫『「大東亜共栄圏」の形成と崩壊』、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6年。

^⑪安藤良雄『太平洋戦争の経済史的研究：日本資本主義の展開過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

^⑫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

和太平洋战争的主流观点背道而驰，该书也因而受到许多国内学者的口诛笔伐。

另外，在研究日本对东南亚个别国家或地区的统治方面，日本学界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如后藤乾一在其两部著作《昭和期日本与印度尼西亚》^①和《日本占领时期的印度尼西亚研究》^②中对日本在战前和战时同印尼关系的演变做了详尽论述。而早稻田大学大隈纪念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写的《印度尼西亚的日本军政研究》^③就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日本在爪哇岛的统治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仓泽爱子则在《日本占领下的爪哇农村的变化》^④中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日本的占领给爪哇当地普通的乡村生活带来的变化。太田常藏的《缅甸日本军政史的研究》^⑤对日本在缅甸的统治进行了全面阐释。而原不二夫的《英属马来亚的日本人》^⑥则另辟蹊径，跳脱了以往在研究英属马来亚（除马来半岛、新加坡之外，还包括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文莱）的日本移民时只聚焦于“南洋姐（日本娼妇）”和商业移民这种固定套路，而将目光投向以往学界一直不太重视的农业移民身上，从而为更加全面认识经济“南进”时期这一地区的日本移民情况做出了有益尝试。而亚非研究所所编的《越南解放史：资料》^⑦则记录了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期间印支半岛的状况。此外池瑞雪浦在《日本占领下的菲律宾》^⑧中对日本在菲律宾实施的民族和宗教统治以及经济掠夺等进行了论述。

2、欧美：视角多样

欧美学界对于日本在二战时期的扩张研究由来已久。约翰·托兰（John Toland）的《日本帝国的衰亡：1936—1945》^⑨通过引用大量美日双方的战时档案，以全景式的视角描绘了日本确立“南进”政策到发动太平洋战争再到战败投

^①后藤乾一『昭和期日本とインドネシア』、東京：勁草書房、1986年。

^②後藤乾一『日本占領期インドネシア研究』、東京：龍溪書舎、1989年。

^③早稲田大学大隈記念社社会科学研究所編『インドネシアにおける日本軍政の研究』、東京：紀伊国屋書店、1959年。

^④倉沢愛子『日本占領下のジャワ農村の変容』、東京：草思社、1992年。

^⑤太田常蔵『ビルマにおける日本軍政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7年。

^⑥原不二夫：《英属马来亚的日本人》刘晓民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⑦アジアアフリカ研究所編『ベトナム解放史：資料』（全三冊）、東京：労働旬報社、1970年。

^⑧池瑞雪浦編『日本占領下のフィリピン』、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

^⑨John Toland,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 Toronto: London: Bantam, 1971.

降的整个过程。F.C.琼斯(F. C. Jones)则在《日本在东亚的新秩序：崛起和陨落，1937—1945》^①中系统论述了日本对东南亚各地的占领和军政统治等情况。而乔恩·利文斯顿(Jon Livingston)、乔·摩尔(Joe Moore)和菲莉西亚·欧德法瑟(Felicia Oldfather)等人合力编撰的《帝国日本，1800-1945》^②则从更较遥远的江户幕府时期开始，来回顾和总结一百五十年来日本是如何从一个封闭落后、偏居一隅的小国逐步迈入世界列强的行列，并最后由称雄亚洲的顶峰跌入毁灭深渊的历史，这对于从一个长期的脉络上来整体把握日本南进的历史提供了必要的铺垫。与之类似的是威廉·G·比斯利(William G. Beasley)的《日本帝国主义，1894-1945》^③，该书以甲午战争爆发为起始点，详尽记述了日本帝国的在东亚的崛起、扩张和陨落过程。威廉·H·纽维尔(William H. Newell)所编写的论文集《日本在亚洲，1942-1945》^④则囊括了一大批研究日本占领东南亚时期在当地实行的官僚和军政体制的论文。尼古拉斯·塔林的《突然的暴怒：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1941-1945》^⑤也回顾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整个过程，并探讨了其在东南亚留下的创伤和遗产。

而关于日本的统治与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则首推威拉德·H·埃斯伯瑞(Willard H. Elsbree)的《日本在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角色：1940—1945》^⑥，他在书中对日本在占领东南亚后在当地民族独立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富有洞察力的论述，令本书成为欧美学界研究日本对东南亚军政统治方面的开创者，但考虑到该书的成书时间较早，书中所使用的资料和得出的结论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另外阿尔弗雷德·W·麦考伊(Alfred W. McCoy)的《日本占领下的东南亚》^⑦和乔伊西·C·莱博若(Joyce C. Lebra)的《日本训练的东南亚军队》^⑧则从日本在战时于东南亚所训练的独立军和志愿军为视角，论述其对当地的革命与动员能力方面的影响，并认为日本人并没有预见到这会塑造出东南

^①F. C. Jones, *Japan's New Order in East Asia: Its Rise and Fall, 1937—194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②Jon Livingston(eds.), *Imperial Japan, 1800-1945*,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③William G. Beasley, *Japanese imperialism, 1894-194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④William H. Newell(eds.), *Japan in Asia, 1942-194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⑤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Singapore: Horizon, 2001.

^⑥Willard H. Elsbree, *Japan's Role in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st Movements, 1940—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⑦Alfred W. McCoy (eds.), *Southeast Asia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80.

^⑧Joyce C. Lebra, *Japanese-trained Armi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0.

亚在战后整整一代的政治及军事领袖。

与日本学者类似的是,除了对于日本在东南亚统治的整体性研究之外,欧美学者也对个别东南亚国家在日本统治时期的状况做了深入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如著名东南亚史专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两部著作《被占领和反抗时期的爪哇:1944—1946》^①和《日本占领下印度尼西亚政治的某些方面:1944—1945》^②,这两本书均以日本占领末期的印度尼西亚为研究对象,论述了日本军政统治对当地的政治及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约翰·海特(John Hayter)在《囚笼中的圣徒:日本占领新加坡的四年,1941-1945》^③则对新加坡这座城市在沦陷期间的历史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梳理。而其他关于英属马来亚地区的研究则还有贾斯汀·科菲尔德(Justin Corfield)的《马来亚战役和西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婆罗洲的日据时期的参考文献,1941-1945》^④则列举了大量关于这一时期的文献,包括存放于英国、欧洲、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图书馆中的已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文章以及未出版的日记和其他手抄本,以便读者们能更方便的搜寻有关当年日军暴行和当地民众反抗的信息。另外E·布鲁斯·雷诺兹(E. Bruce Reynolds)的《泰国与日本的南进,1940-1945》^⑤则是以这一时期的暹罗(泰国)为研究对象,来论述当时的奎披汶·颂堪政府为何会选择同日本合作,丙协助后者进军东南亚。简·贝卡(Jan Becka)的《日本占领时期的缅甸民族解放运动,1941-1945》^⑥则探讨了这段时期缅甸民族独立运动同日本占领军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关于菲律宾方面的研究,则有埃尔默·诺顿·李尔(Elmer Norton Lear)的《日本占领时期的菲律宾莱特岛,1941-1945》^⑦,该书将研究范围缩小至菲律宾莱特岛上,来探讨日本的占领对当地造成的冲击。而与之类似的是鲍勃·里斯的《日本时间:日本统治下的沙捞越,1941-1945》^⑧,这本书将研究目光投向了当

^①Benedict Anderson, *Java in a Time of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1944-1946*,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②Benedict Anderson, *Some Aspects of Indonesian Politics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4-1945*, New York: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1961.

^③John Hayter, *Priest in Prison: Four Years of Life in Japanese-occupied Singapore, 1941-1945*, Rangoon, Singapore: Graham Brash, 1991.

^④Justin Corfield, *A Bibliography of the Malayan Campaign and the Japanese Period in West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orneo, 1941-1945*,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2001.

^⑤E. Bruce Reynolds, *Thailand and Japan's Southern Advance, 1940-1945*, Hounds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⑥Jan Becka,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in Burma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1941-1945*, Prague: Oriental Institute in Academia, 1983.

^⑦Elmer Norton Lea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Leyte, 1941-1945*, Ithaca, N.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Dept. of Far Easter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1961.

^⑧Bob Reece, *Masa Jepun: Sarawak Under the Japanese, 1941-1945*, Sarawak Literary Society, 1998.

时的沙捞越地区，通过收集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和沙捞越的官方文件和私人档案，并对幸存者进行采访，作者试图描绘出沙捞越的多样性族群在面对频繁和空前的政治和经济变动的短暂时期的不同反应和所遭受的影响。

3、东南亚：立足本土

作为当事者的一方，东南亚学者利用一手资料获取上的便利性，从本国的视角出发，对日本在战时对东南亚的统治以及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新加坡的保罗·H·克雷托斯卡（Paul H. Kratoska）在《日本占领下的马来亚：1941—1945》^①中对当时日本对占领区的各项政策以及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在所参与撰写的《粮食供给与日本占领下的东南亚》^②一书中阐述了日本军政当局的战时粮食政策给东南亚当地造成的影响，而在其最新的著作《日本占领下的马来亚和新加坡，1940-1945》^③中，他则将英属马来亚时期也纳入了研究范围，以便对比日本占领前后当地生活的改变。新加坡华人学者陈明鸾（Tan Beng Luan）等人编写的《日本占领时期，1942-1945：战争期间新加坡的影像记录》^④则收录了大量当时的照片，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更为直观的途径。而拿督·沙龙·艾合买提（Datuk Sharom Ahmat）等人所采访撰写的《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在日本占领时期的回忆录，1941-1945》^⑤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了解这段时期的马来亚的珍贵视角，即通过这位马来西亚首任总理的双眼来审视日本的占领岁月为马来西亚留下的印记。

而印尼学者同时也是印尼独立后首任外交部长的艾哈迈德·苏巴德基奥（Achmad Soebardjo）的《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和革命》^⑥对日本统治给印尼独立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做了阐释。缅甸的博·民噶乌则在《昂山将军与三十壮士—缅

^①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1—1945*, London: C. Hurst, 1998.

^②Paul H. Kratoska (eds.), *Food Supplies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South-East Asia*, Houndmills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③Paul H. Kratoska,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0-1945*,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2.

^④Tan Beng Luan (eds.),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1945: A Pictorial Record of Singapore During the War*,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1996.

^⑤Datuk Sharom Ahmat (eds.), *Reminiscences of Tunku Abdul Rahman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1-1945*, Jawatankuasa Sejarah Lisan dan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1989.

^⑥アハマッド・スバルジョ著『インドネシアの独立と革命』、奥源造編訳、東京：龍溪書舎、1973年。

甸独立义勇军与日本》^①中详细介绍了缅甸独立运动领导人昂山将军同日本由战争初期的合作到最后转为对抗的全过程。而同为缅甸学者的大学盛丁则在其著作《1945年缅甸反法西斯斗争史》^②对于日本在缅甸的短暂统治给当地造成的损失进行了描述,并着重阐释了在二战的最后一年缅甸的抵抗组织是如何投入到对日本占领军的斗争当中并最终在盟军配合下取得胜利的过程。菲律宾学者阿龚斯里奥(Teodoro A. Agocillo)在《决定命运的岁月:日本在菲律宾的冒险,1941—1945》^③对日本在占领菲律宾期间给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带来的巨大冲击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华裔学者安东尼奥·谭(Antonio S. Tan)在其著作《日本占领时期的菲律宾华人,1942-1945》^④中对于日本占领菲律宾时期当地华人的遭遇作了特别关注。而与欧美学者一样,东南亚学者也对日占时期的沙捞越地区进行了研究,如著名华人学者林韶华(Julitta Lim Shau Hua)在《井中的猫咪:日本占领时期的沙捞越,1941-1945》^⑤中对于日本占领当局在沙捞越地区的残暴统治和当地民众特别是华人的抗争做了详尽论述。

4、国内:有待深入

相较于国外在这一领域丰硕的研究成果,国内学界虽然起步较晚,但在日本侵略扩张史和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史方面的研究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探索,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特别是研究日本的入侵与东南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之间关联的系统性研究上尚缺乏相关著述。

而目前国内与日本南进问题相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从外交角度研究日本近代以来的对外政策,此种研究多具整体性和系

^①ボ・ミンガウン著『アウンサン將軍と三十人の志士——ビルマ独立義勇軍と日本』、田辺寿夫訳編、東京：中央公論社、1990年。

^②大学盛丁：《1945年缅甸反法西斯斗争史》，李秉年、赵德芳译，北京：北京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2006年。

^③Teodoro A. Agocillo, *The Fateful Years: Japan's Adventure in the Philippines, 1941—45*, Manila: Garcia Pub. Co., 1965.

^④Antonio S.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1945*, Published for the Asian Center,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81.

^⑤Julitta Lim Shau Hua, *Pussy's in the well: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arawak, 1941-1945*,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Research and Resource Centre, SUPP Headquarters, 2005.

统性。如米庆余的《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①就是针对近代日本自明治初年以来形成的东亚战略和政策的系统性研究,其以日本的外交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按照时间顺序具体论证这些战略与政策对近代日本的国家命运走向产生的深刻影响。而臧运祜的《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②则以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以对华政策为核心)为研究对象,时间限定在十五年战争时期(1931-1945),其引用了大量一手史料,对日本由大陆政策向“大东亚共荣圈”演变的过程作了清晰的梳理。林庆元等人撰写的《“大东亚共荣圈”源流》^③以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剖析这些理论的起源与演变过程来揭露近代日本称霸世界的野心。熊沛彪的《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④则将对近代日本的对外战略放置于东亚国际秩序演变的大框架内进行研究,认为日本的综合国力并不能支撑起其庞大的霸权战略,这也就注定了其失败的最终命运。

其二是以南进背景下的台湾为研究出发点。此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有王学新的《南进政策下的籍民教育(1895-1937)》^⑤,该文以台湾总督府开展的籍民教育为切入点,认为随着日本政府大陆政策和台湾总督府南进政策的发展,籍民教育逐渐变质为拉拢和扶持亲日势力,而随着排日运动的发展,其在表面上达成“中日亲善”的目的宣告破产,但在培育亲日势力方面则卓有成效。此外还有陈小冲的《日本南进政策中的台湾——以福建官脑局案为中心之个案分析》^⑥,其通过以福建官脑局案为中心对20世纪初期台湾在日本南进战略中的地位作个案分析,认为台湾总督府在很大程度上策划和执行了日本的南进扩张,而台湾也在日本南进政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其他关于台湾总督府的研究还有陈艳云的两篇文章《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对东南亚日侨的调查——以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为中心》^⑦和《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对南洋种植业的调查与日本南进政策》^⑧,这两篇文章据以台湾总督府对东南亚地区的调查活动为研究切入点,认为无论是对日侨移民还是南洋种植业的调查活动,其对日本南进政策的开展都具有举足轻重

^①米庆余:《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②臧运祜:《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③林庆元,杨齐福:《“大东亚共荣圈”源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④熊沛彪:《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⑤王学新:《南进政策下的籍民教育(1895-1937)》,《国史馆学术集刊》,第十四期。

^⑥陈小冲:《日本南进政策中的台湾——以福建官脑局案为中心之个案分析》,《台湾研究集刊》,1988年第4期。

^⑦陈艳云:《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对东南亚日侨的调查——以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为中心》,《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

^⑧陈艳云:《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对南洋种植业的调查与日本南进政策》,《求索》,2010年第8期。

的作用。

其三是以南进政策下东南亚地区的华裔族群为研究对象。如李国梁的两篇文章《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政的华侨政策》^①和《日本“军政”统治下的东南亚华侨》^②，均以日本军政统治东南亚时期当地华侨的遭遇着手，认为其在当局的镇压和掠夺的高压政策下备受劫难。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研究将台湾总督府和南洋华侨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论述，如纪宗安和崔丕撰写的《日本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1925-1945）》^③就做出了此类尝试，其以日本近年来新出版的48种调查报告资料为中心，集中探讨了1937-1942年间日本政府和国策会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认为这种调查的性质仍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所服务，但不可否认的是调查所取得的数据资料对于开展相关学术研究仍具有重要价值。

其四将探究日本实施南进政策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同中国抗战的进程相联系起来。如余茂辉的《略论中国抗日战争对日本“南进”政策的牵制》^④，余子道的《中国抗战与日本的南进政策》^⑤，黄光耀的《中国抗战与日本南进政策的选择》^⑥和黄生秀的《中国抗战与日本北进、南进》^⑦等文章，大体上都认为日本之所以由北进转向南进，再到最终失败，同中国人民的坚持抗战有直接的因果联系。

其五则是直接以日本在东南亚的军政和经济统制为研究对象。如陈奉林的《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源流》^⑧和《日本对东南亚政策源流的再讨论》^⑨两篇文章均对日本在战前对东南亚地位的认识及在对东南亚殖民的政策安排上进行了阐释。而孙福生也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对东南亚政策》^⑩中对日本南进侵占东南亚的目的和在战争初期的统治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日本的入侵给当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专门研究当时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政策的研究在国内尚不多见，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毕世鸿的《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⑪，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和数据作为支撑，并用专业的方法对日本对东南亚经济统制的

^①李国梁：《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政的华侨政策》，《东南亚》，1987年第4期。

^②李国梁：《日本“军政”统治下的东南亚华侨》，《八桂侨刊》，2005年第3期。

^③纪宗安，崔丕：《日本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1925-1945）》，《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④余茂辉：《略论中国抗日战争对日本“南进”政策的牵制》，《咸宁师专学报》，1991年第8期。

^⑤余子道：《中国抗战与日本的南进政策》，《江海学刊》，1995年第2期。

^⑥黄光耀：《中国抗战与日本南进政策的选择》，《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⑦黄生秀：《中国抗战与日本北进、南进》，《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3年第3期。

^⑧陈奉林：《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源流》，《日本学论坛》，1997年第2期。

^⑨陈奉林：《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源流的再讨论》，《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⑩孙福生：《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对东南亚政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⑪毕世鸿：《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演进进行了全景式论述,认为其具有强制性、短期性和残酷性,特别是进入战争中后期时日本占领当局更是竭泽而渔,横征暴敛,彻底撕下了“共存共荣”的伪装,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而具体到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国内学位论文,关于这一时期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有出自云南大学的两篇硕士学位论文:杨梅的《“我缅人协会”研究》^①与李文超的《二战时期缅甸民族主义精英对日本态度的转变研究》^②。以及吴永航的《知识分子与缅甸独立运动之关系研究》^③;而关于日本“南进”的研究则有周彦宇的《日本“南进政策”原因探析》^④、汪济南的《论日本近代南部扩张战略的形成与实施(1868——1941)》^⑤以及张艳军的《论日本的南中国海政策:1901-1945》^⑥。博士论文方面,厦门大学王学新的《日本对华南进政策与台湾籍民之研究(1895-1945)——兼论台湾黑帮籍民的形成与演变》^⑦与卞凤奎的《台湾总督府的华南与南洋拓进政策——以籍民为中心探讨》^⑧均以台湾为出发点来探讨该地区在南进背景下的角色,并着重于台湾“籍民”与南进政策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此外,王云翠的《日本陆军派阀与战略抉择》^⑨则以这一时期日本陆军内部的不同派系与战略选择上的角力为研究对象,南进政策只是其中的单个组成部分。而对于东南亚民族主义方面的研究,则有张坚的《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研究(1912-1928)》^⑩与张旭东的《缅甸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研究》^⑪。总体上看,这些论文在研究南进政策时侧重于研究该政策整体上的形成、实施情况,在研究东南亚民族主义时则往往仅从东南亚某个单一地区(多为缅甸或台湾)与单一族群(华人华侨族群)的研究视角出发,而对于双方的具体互动与影响则缺乏空间和时间上的整体把握,而这正是本研究所侧重的方面。

^①杨梅:《“我缅人协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0年。

^②李文超:《二战时期缅甸民族主义精英对日本态度的转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5年。

^③吴永航:《知识分子与缅甸独立运动之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师范大学,2015年。

^④周彦宇:《日本“南进政策”原因探析》,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⑤汪济南:《论日本近代南部扩张战略的形成与实施(1868——1941)》,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5年。

^⑥张艳军:《论日本的南中国海政策:1901-1945》,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师范大学,2012年。

^⑦王学新:《日本对华南进政策与台湾籍民之研究(1895-1945)——兼论台湾黑帮籍民的形成与演变》,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7年。

^⑧卞凤奎:《台湾总督府的华南与南洋拓进政策——以籍民为中心探讨》,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1年。

^⑨王云翠:《日本陆军派阀与战略抉择》,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⑩张坚:《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研究(1912-1928)》,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2年。

^⑪张旭东:《缅甸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2年。

5、档案史料

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档案资料以日本所藏最为丰富。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军、政、商、学界等机构和团体的相关人士就纷纷著书立说,为如何侵占东南亚和实行统治出谋划策。这些资料数量众多、种类繁多、涉及范围广,基本涵盖了日本对东南亚实行统治和掠夺的各类方针政策、草案文书等重要资料。另外日本这一时期的外交档案多存放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数量庞大、种类齐全,真实记录了明治以来日本外交活动的方方面面,其中大正、昭和时期的相关文件是研究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在东南亚统治的重要原始史料。另外,日本其他重要的档案史料还包括日本外务省编纂的《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①,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主编的“战史丛书”^②以及鹿儿岛和平研究所主编的《日本外交史》^③等。

除此之外,随着近年来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电子文献的兴起,日本一些研究机构也将太平洋战争前后的相关史料制作成电子文档并保存于各重要数据库中,并供公众阅览和研究使用。其中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岸幸一文库”^④收集了大量旧日本海军相关史料、太平洋战争前的政治、外交、经济和思想等领域的相关史料以及侵占东南亚时期各地军政当局所发布的文告、政令和经济领域的调查报告等,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另外,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下属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⑤以及国立国会图书馆下属的电子数据库^⑥也在其网站公开了大量近代以来日本与亚洲各国之间的电子版外交公文资料以及军政相关的档案。

而美国方面的档案史料则主要来自于美国国务院所编辑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日本(1931—1941)》(1、2卷)^⑦,其记录这十年间美日两国间大量的往来电文、声明、照会和备忘录等外交文件,有助于了解日美冲突由起源到激化的来

^①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1840-1945』、東京:原書房、1965年。

^②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編『戦史叢書』(全102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66~1980年。

^③鹿島平和研究所編『日本外交史』(全34巻)、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70~1974年。

^④「岸幸一コレクション-南方関係軍政・海軍資料を中心に」

http://d-arch.ide.go.jp/asia_archive/collections/Kishi/index.html

^⑤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http://www.jacar.go.jp/>

^⑥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http://dl.ndl.go.jp/>

^⑦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1931-1941 (in two volume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http://digioll.library.wisc.edu/cgi-bin/FRUS/FRUS-idx?type=header&id=FRUS.FRUS193141v02>

龙去脉，并为研究东南亚在日美博弈中所处的位置提供更立体的研究视角

综上所述，有关这一时期日本在东南亚的统治情况的研究虽然汗牛充栋，但专门研究日本“南进”行动同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之间联系的研究则屈指可数。而在现有的研究当中，各方的资料来源、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某种局限性。如日本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总会不自觉地受到自身主观情感的影响，要么一味为侵略历史洗白翻案，要么全盘否定日本对东南亚民族独立进程所产生的客观影响，这种局限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东南亚学者的研究成果上。相比较而言，欧美学者的研究视角则更为理性和中立，但在资料的更新和使用上则不及日本学界。而中国学界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面临的最大阻碍则是资料获取和理解应用上的困难，但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前者的难度将会不断下降，而后者相信也会在研究者外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相关背景知识的不断丰富下得以解决。因此从研究现状来看，本文选择这一课题作为研究主题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在当今时代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三节：关键概念界定

1、地理与历史概念

东南亚是指亚洲的东南部地区。在中国地理书上通称“南洋”，意指它位于中国南方的大洋之中。在中国古籍中，又称为“南海”。自清代中叶以来，则皆以“南洋”概称东南亚地区。西方人则将这一地区称为“远印度”、“外印度”或“东印度群岛”。^①东南亚作为一个地理名称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英国蒙巴顿将军在此地建立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后，“东南亚”一词逐步推广。战后1962年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南亚地理学家会议上，学者们同意采取“东南亚”（Southeast Asia）作为本地区的地理名称，这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②

^①梁英明、梁志朋等：《东南亚近现代史》（上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②同上，第5页。

今天，东南亚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东帝汶等 11 国。东南亚幅员辽阔，起地域绝大部分在北回归线以南，横跨赤道两侧，南北跨越 39 个纬度，长达 4500 公里，东西跨越 49 个经度，宽达 5600 公里。海域面积 70 多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 449 万平方公里，海陆范围共约 1200 万平方公里。其总面积约相当于整个欧洲及非洲海岸以北的广大地区。^①

就纯粹地理意义而言，东南亚恰好分为两部分：大陆部分，包括与中国的长江以南相连的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和马来半岛；海岛部分，包括印度尼西亚、东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和台湾。^②东南亚属热带气候地区，特点为高温多雨，除半岛北部山区外，绝大部分终年无雪，不分春夏秋冬四季。由于雨量充沛，草木茂盛，气候宜人，也适于各种作物的生长。季候的划分，对东南亚的政治、军事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军事上的大规模战斗，一般是在旱季发生，雨季则是开展丛林游击战的有利时机。^③

除了温度和雨量之外，东南亚的另一些自然因素也同样重要。安东尼·瑞德认为“水与森林是对东南亚环境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④东南亚虽然从陆路上难以抵达，但其水路却四通八达。因此，东南亚一方面能避免像中国和印度那样受到来自中亚的移民和入侵，另一方面又对海上商人、冒险家和传教士保持着开放。而这一地区相对于其他海域更加良好的海况，再加上温和的季风气候，使其进一步成为海上贸易的交通要道。“另外，东南亚水域旁边丰富的木材资源适于造船……所以，东南亚是一个特别适宜海上活动的地区，小船在那里是每个家庭的必备品。”^⑤东南亚特殊的自然地理特征造就了其丰富的人文特征。霍尔就指出“今日的东南亚是人类学者的乐园”。^⑥由于地理环境的破碎性和封闭性，许多古老的人种得以残存到今天，再加上殖民时代以来大量移民的进入，东南亚各地的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均呈现较大的差异性。

以上这些自然和人文上的特征，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何东南亚历史上未曾出

^①梁英明、梁志朋等：《东南亚近现代史》（上册），第 5 页。

^②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I, From Early Times to c. 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56-57.

^③梁英明、梁志朋等：《东南亚近现代史》（上册），第 7 页。

^④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年》（第一卷 季风吹拂下的土地），吴小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22 页。

^⑤同上。

^⑥D·G·E·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The Macmillan Press, 1981, p.5.

现过整个地区性的统一政权。即使是携坚船利炮而来的殖民者们，也更多是划分好彼此的势力范围，牟取商业利益。纵观历史，似乎只有日本曾凭借武力基本上将整个东南亚地区置于统治之下（但这种统治也是粗暴和不统一的），这种短暂的成功同日本在战前几十年就开始的“南进”准备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2、政治与军事概念

南进：“南进”起初是日本迈入近世之后所逐渐形成的一种思潮，其后又逐渐演变为国家层面的对外扩张战略，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真正步入实施阶段。其核心思想在于宣称日本应向南部地域进行扩张。

亚细亚主义：又称泛亚主义（英语：Pan-Asianism）、亚洲主义，是宣称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应团结起来反抗西方国家霸权主义的理想主张及运动。在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被日本政府当作政治宣传，借此对付欧洲及美国帝国主义，来助长自己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

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多方面反应一个民族共同认同的社会建构。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其旨在为本民族群体在一块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区获取并保持一种自治或者完全独立的地位。民族主义认为一个民族应能够管理自身而不受外部的干预，并与“民族自决”相联系。民族主义更倡导发展一种基于共同文化、语言、种族、宗教、政治目标或共同历史渊源的民族认同感。^①

大东亚共荣圈：为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扩张版图所提出的“将东亚从西方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建立类似邦联制的战略构想与政治主张。

南方军：为日本帝国陆军的总军之一。于 1941 年 11 月依大陆令第 555 号^②编制成总军，寺内寿一伯爵任总司令官，塚田攻中将任总参谋长。缅甸、泰国、南洋方面等地区为其作战地域，并担负防卫·军政之任务。

美属菲律宾：为美国统治菲律宾时期（1898 年-1935 年）的国号，在此期间菲律宾为美国非自治领土。1935 年菲律宾获得自治，成立菲律宾自治领并且颁

^①Anna Triandafyllidou,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ther",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1 (4) (1998), pp. 593-612.

^②大陆令第 555 号命令、「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20634400、第 14 軍関係命令綴 昭和 16. 11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布自治邦宪法，实施十年的自治期后将完全独立。

英属缅甸：是大英帝国在中南半岛上的一个殖民地，存在于 1824 年至 1948 年。原先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937 年成为独立的殖民地。二战期间被日本占领，后成立傀儡政权“缅甸国”，直至战后才正式独立。

法属印度支那：是法兰西殖民帝国在东南亚的领土，由老挝、柬埔寨和三个居民以越南人为主的地区（东京，安南与交趾支那）以及位于中国广东雷州半岛的湛江租借地组成。老挝与湛江分别在 1893 年与 1900 年加入法属印度支那。1902 年，当地首府由交趾支那西贡迁至东京河内，到了 1939 年，首府又由河内迁至安南大叻，二战结束之后，首府再次由大叻迁回河内。法国本土在二战期间沦陷之后，之前由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管理的印度支那，交给了维希法国在日本的监督之下管理。不过，在 1945 年 3 月至 8 月期间，印度支那由日本全权支配。自 1941 年 5 月开始，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就一直在越南进行企图推翻法国殖民政府的叛乱，并在战后开始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9 年，法国赋予了以保大帝为首的反共政权“越南国”独立地位。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越盟在北越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而南越的越南国则继续维持独立地位。

英属马来亚：是大英帝国殖民地之一，包含了海峡殖民地（1826 年成立）、马来联邦（1895 年成立）及五个马来属邦（1904 年至 1909 年间取得宗主权），战后，先后改组成马来亚联邦及马来亚联合邦，直至 1957 年独立。

荷属东印度：是指 1800 年至 1949 年荷兰人所统治的印度尼西亚。1596 年，荷兰人霍特曼率领的一支荷兰船队到达爪哇岛的万丹。1603 年，荷兰在爪哇建商站；1605 年，征服盛产香料的马鲁古群岛中的安汶岛、帝利岛。1619 年，攻占爪哇岛上的雅加达，命名巴达维亚，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总部。在荷兰人到来之前，葡萄牙人已经在印尼地区建立了一些商站。之后，英国人也登陆印尼，建立殖民地。而荷兰变成了这些欧洲国家里面占领最多领土的国家。荷兰最初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对这些地区实行殖民统治。1799 年东印度公司解散后殖民地被荷兰政府接管，史称荷属东印度。

由于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集中于政治和军事范畴，对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则着墨不多，而这部分的专门研究已可见于国内其他学者的相关学术成果上，固只在此列出以上的概念界定。

第四节：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日本在二战期间的“南进”同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间的互动过程，并以此为出发点来探究两者产生的背景、原因以及对当时和战后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进程的影响。为达此研究目的，本文拟采用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从前辈们的研究成果出发，通过一定的逻辑推理来客观地论证两者关系的演变。

除此之外，鉴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偏向于政治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范畴，所以笔者引入一些相关的理论作为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具体为建构主义和区域主义的理论。通过这些框架，希望可以探究出作为日本区域主义主张体现的“亚细亚主义”以及其变体“大东亚共荣圈”是如何解构东南亚原有的“殖民主义”观念，并在其之上建构起了“民族主义”认同，或者说激发了东南亚民族主义的发展。而关于这种解构与建构的成败得失则将在本文的最后一章进行专门阐述。

根据以上的思路，则本文的结构大致如下：

第一章分别回溯 19 世纪末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的“南进”同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演变，并在最后一节着重论述民族主义者们对于日本这一行为的所采取的反应的动机、过程和结果等。

第二章则是构建分析框架。首先对东南亚原先的殖民秩序在日本武力南进过程中的瓦解过程进行梳理。并结合对同一时期日本的区域主义主张“亚细亚主义”同其最终变体“大东亚共荣圈”的分析，兼与同盟国所提出的“大西洋宪章”加以对比，来阐释殖民观念的解构带给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和影响。

第三章则聚焦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统治下的东南亚。由于东南亚地区众多，各地区差异性又较大，限于篇幅故只能选取数个有代表性的地区加以论述。根据日本在战前和战时形成的占领计划以及现实状况，可大致将东南亚分成三类地区：一、并未推翻当地政府建立军政统治，而只是驻扎军队，占用军事设施，代表地区为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选取印支的原因在于战争末期日本通过政变表面上建立起了三个独立国家，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二、口头承诺给予完全独立地位的地区，如缅甸、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部分地区，选取缅甸的原因在于其处于日本军和同盟国军战线的前沿，且自始至终都处于战争状态，对于研究战局如何

影响日本占领当局同当地民族主义运动关系的演变具有一定价值；三、选取荷属东印度作为最后的个案进行研究是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复杂性：既有陆军又有海军主管的地区；既有如爪哇那样的计划完全兼并地区，又有计划组成印度尼西亚联邦使其完全独立的地区。正是基于这种复杂性，荷属东印度才具备了最突出的研究价值。

第四章是对“南进”及“大东亚共荣圈”的总结，着重阐释其“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并试图阐释这种落差与日本最终的失败之间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视角延伸至战后获得独立的东南亚国家身上，来审视“南进”的影响与余波，兼以厘清日本侵略者、西方殖民者与东南亚民族主义者之间在这段时期互动的本质。

最后则是对全文的总结，试图将“南进”对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本质影响和直接与间接遗产做全面和系统的论述，并最终对日本在战时和战后东南亚实现民族独立上扮演的角色进行尽量客观和准确的定位。

第一章：日本的“南进”与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渊源

虽然日本开始频繁同东南亚民族主义者打交道是在二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但两者的历史渊源可上溯至明治时期，而作为日本行动指导思想的“南进”主张甚至在江户幕府时代便已见诸于世。经过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的酝酿，“南进”从原先的民间主张升格为国家战略，从原先的经济“南进”演变成武力“南进”，回顾这一进程的脉络走向对于理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在东南亚的活动动机是有必要的。而在同一时期，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在逐渐发展，并与日本的“南进”产生了交集，了解这一期间两者的互动对于理解民族主义者在战时的行动和态度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本章即试图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同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互动的脉络进程。

第一节：日本的“南进”轨迹

作为与传统世界（欧亚大陆）近在咫尺，同时又饱受地震、火山和海啸等自然灾害侵袭的岛国日本来说，向大陆扩张可以说是天然选项。然而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在德川氏统治之下却保持了两百余年的“锁国”状态，似乎又与这种严苛的自然条件产生了矛盾之处。事实上细究起来，虽然后世将江户幕府时期定性为“锁国”时代，但当时的日本并非处于对外完全封闭的状态，幕府创始人德川家康更是积极振兴对外贸易，热衷于恢复因万历朝鲜战争（朝鲜称壬辰倭乱、日本称文禄庆长之役）而一度中断的与明国、朝鲜的邦交关系。所谓的“锁国令”，其“着眼点其实在于垄断贸易和情报”。^①与此同时，幕府将军们也希望建立起一种有别于东亚当时已存在的华夷秩序的属于日本的独特的国际秩序——“大

^①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页。

君外交体制”。

幕府理论家林罗山在 1610 年底替家康的亲信本多正纯所起草的致福建总督的书信中声称，由于受家康的“德化”所感召，“朝鲜入贡，琉球称臣，他如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献表纳贡”。^①作为一封希望同明国恢复贸易往来的书信来说，以上的字句未免过于夸张。但深知若要同明国贸易就势必会被纳入朝贡体系的林罗山，似乎是有意写下这样与致信意图所矛盾的字句，以显示日本企图创立同华夷秩序对等的自成一体的外交体制。但这样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在明王朝那里碰壁。未能加入华夷秩序的日本在之后的基督徒暴动和清朝入主中国的刺激下，开始寻求建立属于自己的国际秩序。^②1635 年，幕府规定征夷大将军在外交上的称号为“日本国大君”，将“通信”（互通信义）限于朝鲜、琉球，贸易限于中国、荷兰，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大君体制可以视作华夷秩序的日本翻版，不过规模更小，但仍可从中看出日本对屈服于现存秩序的抗拒和创立自身所主导的区域秩序的野心。

其后的两百年，日本大抵处于承平之世，但到了江户时代中晚期，面对逐渐严峻的国内外局势，有一批学者在其著作中表达了向外扩张的意图以维护本国利益的主张。如著名海防论者林子平在 1786 年写就的《三国通览图说》中就主张为了保卫日本，必须确保虾夷、朝鲜和琉球，^③他还赤裸裸地宣称写此书的意图就在于“日本勇士率兵入此三国时，谙察情况而随机应变”。^④经世家本多利明在 1798 年出版的《经世秘策》中也提出日本为求得在国际上有所发展有四大当务之急，其中第三条的“大量建造船只，确立海外贸易制度”和第四条的“大力开发日本周围的无人岛屿”可被视作日本应积极对外拓展势力的主张。^⑤为使日本成为“大国”，本多利明还要求实行“开拓制度”（殖民制度）。他指出，“欧洲各强盛国家，其本国虽小，但多有属国，亦堪称大国”。强调“即使侵犯他国，也应由此而增强本国，是乃国务”，^⑥这等于承认了对外扩张的必要性。最后，他还将英国作为日本的理想国家加以描述，他认为英国与日本同属小国和海国，

^①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第 23 页。

^②同上，第 27 页。

^③同上，第 43 页。

^④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 西欧的冲击与开国），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第 73 页。

^⑤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第 45 页。

^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 西欧的冲击与开国），周启乾译，第 76 页。

但其本國小而屬國多，希望日本能在將來成為像英吉利一樣的大富大強之國，完成“大日本帝國”的建設。^①繼承了本多利明衣鉢的佐藤信淵則在《海防策》中提出一反閉關主義而採取積極的侵略東亞各國的主張。^②而在1823年所著的《宇內混同秘策》中他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觀點，勾勒出極其詳盡的對外擴張方案，他的以滿洲為踏板征服中國，向大陸和東南亞並進的擴張路線被認為是“南進”的思想淵源之一，並深刻地影響了後來的軍國主義者們。儘管這一時期日本國內涌現出了各種主張對外通商和擴張的言論，但在將政權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的幕府眼中，這些主張若是實行無疑會增強地方上強藩的實力，從而有悖於幕府“強干弱枝”的鎖國意圖，因此對於這些言論多採取排擠和打壓的態勢。

然而到了黑船叩關的幕末時期，面對西方列強的步步進逼，幕府開始不得不應對來自外部的威脅了。鎖國體制出現了鬆動。由於不滿於幕府面對列強忍讓退縮的態度，一些中下層武士發起了以“攘夷”為代表的排外運動，但很快被證明是徒勞之舉。面對此種情勢，一些政治人物開始紛紛提出向海外擴張勢力用以補償列強對日本造成的損失。其中以長洲藩的吉田松陰為代表，他在1854年所著的《幽囚錄》中寫道“現在要加緊進行軍備，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可開拓蝦夷，封立諸侯，乘隙奪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曉諭琉球……責難朝鮮，使之納幣進貢，一如古時強盛之時。北則割取滿洲，南則掠取台灣及呂宋，漸示進取之勢，然後愛民養士慎守邊圉，則可謂善保國矣”。^③從中可以看出，這位曾教育出眾多維新志士的老師已對今後日本的對外擴張戰略勾畫出了藍圖，也提及到了向東南亞方向擴張一事。雖然當時日本正深陷於開國、攘夷、倒幕和內戰所帶來動蕩和混亂之中，松陰的主張並沒有馬上轉化為行動，但其影響已經留存於曾接受其教誨並在明治維新後擔任政府重要職位的那批中下級武士的身上，如提出“主權線”和“利益線”論的山縣有朋，“維新三傑”之一木戶孝允以及“明治憲法之父”伊藤博文等。

明治維新以降，在大陸政策的陰影下，南進論在大部分時間里仍只為民間學者所鼓吹，如橫尾東作、田口卯吉、志賀重昂、菅沼貞風、竹越與三郎、福本日

^①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 西歐的衝擊與開國），周啟乾譯，第77頁。

^②井上清：《日本軍國主義》（第一冊 天皇制軍隊的形成），姜晚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22頁。

^③井上清：《日本軍國主義》（第二冊 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姜晚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7頁。

南等。他们受自由贸易主义和亚细亚主义思潮的影响，主张向大洋洲和东南亚岛屿进行贸易及移民。这些人当中以志贺重昂和竹越与三郎为代表。志贺在1888年出版的《南洋时事》中以自身的理解诠释了“南洋”这一概念，并将其置于重要位置。他认为“所谓南洋，是一个丝毫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地方，然而我辈却要将“南洋”二字首次置于诸君面前，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他提倡日本人通过和平的商业主义实现海外雄飞，“希冀能在海外各处见到大和民族温和的笑颜。盼望能在海外塑造一个商业上的崭新日本”。最后，他呼吁“在海外各地创造商业上的崭新日本，是你们的使命，也是现在的急务”。^①然而作为当时年仅二十四岁的志贺的作品，本书在总体构思和写作方式上还存在着商榷之处，而且不久之后他就将研究方向转到了国粹主义上，从而在“南洋”问题上就此偃旗息鼓。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南洋时事》在当时具有的开创性的历史意义。明治时期的“南进”讨论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爆发很快降温，直到明治末期的1910年，竹越与三郎出版了代表作《南国记》，才将公众的视线从大陆又拉回到了遥远的南方，并使讨论的热潮持续到了大正时代。在《南国记》的开篇，就出现了“向南！向南！”的大声疾呼，接下来他写下“国人已忘记了南方”，“得热带者得天下”，“南人（日本人）北进违背天理”，“（日本）作为岛国向大陆发展于己不利”，“我国的将来在南方”^②等鼓吹南进的话语。竹越的这本书一方面以历史学家的角度，将整个亚洲置于思考范围，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进行了客观地比较。另一方面，他又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了南方经略论。^③正是这两种态度的微妙交错才使得这本书充满了张力，从而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针对这一时期的南进论，有学者总结出了七大要素：其一、提出对于前往海外的日本人而言，最适合的地方便是南洋，并对这一地域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潜在重要性做了详细描述；其二、针对“北进”论，也就是同重视向俄国、朝鲜半岛和中国北部等地扩张和投资的论调进行非常激烈的对抗，并认为对北面采取守势是最好的政策；其三、强调南洋的未开发性和政治上的落后性，并且认为对其进行开发是日本独一无二的使命；其四、不认为南洋是天生应该归属于西方的势力

^①矢野暢『「南進」の系譜』中央公論社、1975、57-59頁。

^②同上、62頁。

^③同上、63頁。

范围。“老天将本属于新日本的上好版图暂且预置给了他人”（菅沼贞风）这种辞藻上的修辞便是绝佳的例证。并对西欧发达国家是否具备对南洋的妥当的开发能力提出疑问；其五、用比喻的手法将“陆地”思想和“海洋”思想加以比较。比如，竹越提出的“我国的将来不在北方而在南方，不在大陆而在海洋。日本人民应该关注的是，将太平洋变为我国内湖这一大业”是典型的言论。于是与之相伴的增强海军、强化造船能力、延伸航路、振兴贸易、自由移民的政策建议的增多；其六、感叹于日本人对南洋对海洋方向的缺乏关注；其七，认为日本干预和参与南方的开发可以解决日本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①从中可以看出，早期南进论者们的观点除了一些例外之外，多数是保持着善意的思想，比起用军事力量强行侵略更倾向于和平的经济参与，这种和平主义的论调与当时主流的主张国权的亚洲主义思想格格不入。另外这一时期，进入南洋的多是一些社会中底层人群，如妓女、农民、苦力、小商贩等，为了维持生计而远渡重洋来到东南亚，这也反映了当时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地不均的问题。

而正如早期南进论者们所指出的，同时期日本政府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大陆方面，更具体地说是集中在东北亚方向。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围绕朝鲜和满洲的归属，日本、清国和俄国三方之间进行了诸多角力，之后更是演变成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两场决定了东北亚未来数十年地缘政治格局的摊牌。而这两场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在大陆站稳了脚跟，也使日本政府的重心放在了大陆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了向南扩张的意图。实际上，1874年的出兵台湾，1879年占领琉球群岛，1895年《马关条约》中的割让台湾、澎湖列岛条款等都为日本接下来向南进一步拓展势力埋下了伏笔。同一时期，国际地位上升的日本也开始效仿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方式同东南亚打起交道，如1898年日本同东南亚唯一的独立国家泰国签署了《日本暹罗修好通商航海条约》，取得了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再比如1899年，日本通过外交途径促使荷属东印度政府颁布法令将日本人从“东洋人”（高于土著人而低于欧洲人）提升至与欧洲人相同的待遇水平。^②1910年日本政府又迫使荷兰当局将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也提升至欧洲人的待遇。^③另外，这一时期，日据台湾总督府还从事了对南洋航路的开拓以及调查

^①矢野暢『「南進」の系譜』、53-54頁。

^②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南進の「衝撃」と「遺産」』、岩波書店、2010、8頁。

^③同上、83頁。

活动，而菲律宾独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方曾向独立军提供过援助，以探索扶持当地势力的可能性，尽管最后这一努力付诸东流，但仍可视为日本对向南方扩张势力的最初尝试，这一部分内容将在本章第三节详细论述。

第一次大战期间，日本海军占领了德属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南洋群岛），在战后被委任统治的该地也成为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1922 年南洋厅设立，日本由此获得了由“内南洋（里南洋）”向“外南洋（表南洋）”进发的关键据点，进而引发了南进的热潮，而这一次是由政府来主导通向东南亚的人员和资金流动了。与此同时，日本的金融业也开始在南洋设置网点，金融和物流网络的完善使得东南亚逐渐成为日本的原料产地和重要的市场。在战时趁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迅速扩大了在东南亚的参与度，贸易和投资额迅速增加，移民数量也在逐年上升。在政府的推动下，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南进论又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并迅速将影响扩大到一般民众当中。不过此时南进论的主流仍是以贸易、投资和移民为代表的和平的经济扩张理论。而且从表 1-1 可以看出，至三十年代末，居住在东南亚经济圈中的日本移民的数量仍相对稀少，且广泛分布于各地区，不像华人数量庞大且集中分布于马来亚和新加坡地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日本此时的扩张方向仍偏重于大陆方面。

表 1-1 南方圈居住移民职业分类人口表（截止 1938 年 10 月 1 日）

	马来 亚	荷属东 印度	法属印 度支那	菲律宾	北婆罗 洲沙捞 越	暹罗	合计
农林业	168	142	7	6278	21	1	6807
水产业	1019	402	——	1467	277	——	3165
矿业	60	6	——	14	——	——	80
工业	245	211	1	1523	207	12	2199
商业	1068	2190	100	2650	141	198	6347
交通业	57	21	——	97	1	1	177
公务自由 业	232	180	8	261	25	60	766
家务佣人	163	75	28	145	11	22	444
其他	57	73	2	484	1	——	617
无业（主要 为家属）	2839	3169	88	12918	620	288	19862
合计	5908	6469	234	25837	1494	521	40464

资料来源：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千倉書房、2009、113 頁。

但是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欧美国家在东南亚的贸易份额出现严重受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凭借廉价劳动力、低汇率以及地理上的交通优势快速地扩大自身在东南亚的贸易”。^②这引起了列强们的反感，再加上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同英美的关系逐渐恶化，日本在国际上进一步陷于孤立。由于认为日本对东南亚怀有某种政治上的野心，当地的宗主国纷纷对日设立贸易壁垒，日本因而开始担心南进的大门就此被关闭。再加上东南亚的资源对于日本维持战争机器运转是不可或缺的，南进由此开始成为国家政策的重要选项之一，并且往往伴随着以武力强制实施的情况。1936 年，继 1933 年退出国联后，

^②周俊：《二战前日本南进政策形成的历史脉络——海洋史视角下国际关系》，《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 期。

日本又退出了伦敦海军军缩会议，为了应对即将展开的海军军备竞赛，面向海洋防御和扩张的国家战略开始成型。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内阁召开五相会议，确立了在对外问题上的基本国策。在随后制定的《国策基准》中披露了这一会议的内容，即帝国的根本国策为“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以外交和国防相结合的手段向南方海洋发展”，^①以及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盟主的构想，由此南进方针作为重要国策被确定下来，而一直秉持南进论的日本海军也获得了更强大的支持。

而以武力手段进行南进则始于1940年。彼时日本正深陷于中日全面战争的泥沼中，而德国在1940年4月至6月的闪电战中迫使在东南亚占据广大殖民地的荷兰与法国投降，而英国也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考虑到或可利用此时局将东南亚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内以摆脱当前的危机，日本决定实施武力南进。但在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草案的基础上，经由企画院总裁铃木贞一调查策划所形成的武力南进方案与准备周全的国策相比更像是临时起意所决定的政策。尽管如此，在7月27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根据具体场合行使武力以进军东南亚的方针被最终确定，这便是之后所公布的《基本国策纲要》和《适应世界形势处理时局纲要》两个重要文件。日本武力南进的最初目标是法属印度支那。彼时的印度支那为中国国民政府（蒋介石政权）接受美英援助的重要通道，在经过与维希政府的谈判后，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至1941年6月，日本战时的同盟国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入侵苏联，这令当时的第二次近卫内阁始料未及。在关于是否废弃于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以追随德国参战的问题上，松冈洋右外相与近卫文磨首相之间产生了对立。近卫为摆脱松冈“北进论”的影响决定率内阁集体辞职，随后改组为第三次近卫内阁，并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帝国国策纲要》，进一步确定了南进的立场。7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国遂决定对日实施全面石油及钢铁等战略物资禁运，其反应大大出乎日本政府的意料之外。以此为契机，日美关系迅速恶化，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重要诱因。

如果从历史结果倒推原因的话，日本南进的原因可归结为主观上日本的野心使然以及东南亚出现的权力真空，如同历史上任何强权进行扩张的原因一样。但

^①国策ノ基準，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157900、帝国ノ対支外交政策關係一件 第六卷(A-1-1-0-10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细究起来，南进之所以从之前民间的一种较为和平的思想主张最后上升到日本的国家战略，中间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并受到来自国内外局势的双重影响。有学者认为“南进思想折射出的是一种华夷秩序的重构。换言之，南进思想中实际上包含着日本将自身定义为‘华’，将南洋地区视为文明落后的‘夷’的思想观念。因此，可以说南进思想的演变，也是日本试图建构一种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替代曾经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表现。”^①而关于对南进思想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亚洲主义，以及其重构的“华夷秩序”的最终形态“大东亚共荣圈”对东南亚殖民秩序的解构则将会在第二章详细阐述。

第二节：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从西方殖民者进入东南亚的第一天起，当地人就开始了不间断的反殖民斗争，但若真要从16世纪开始说起，则以本章的篇幅恐难胜任。事实上，若要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与日本的南进产生交集的话，那么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民族主义在东南亚兴起的主要时间应不会晚于欧洲殖民体系在东南亚完全形成的时间，也就是法属印度支那正式建立的1893年（1900年并入的广州湾不属于本文研究范围），而这一时间点也恰好对应了日本在朝鲜的扩张以及菲律宾人对西班牙的反叛，构成了一个绝佳的研究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之前的历史没有延伸的必要，只是因为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往往伴随着对近代国家这一共同体的认同，如同明治维新后近代日本国家的诞生催生了日本民族的认同一样。

只是在东南亚，情况或许不同于日本这样的拥有单一民族和长期稳定的政权结构的国家。长期以来，这片地区孕育和融合了无数的语言、宗教和人种（如今日的印尼拥有100多个民族，菲律宾有90多个民族，越南有50多个民族，缅甸也有30多个民族^②）。在这里，有时反殖民主义并不等同于民族主义，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类跨区域的意识形态会本能地敌视民族主义；而另一些反殖民群体则代表了某些非民族团体利益，如地方贵族、商人或信仰特定宗教的

^①周俊：《二战前日本南进政策形成的历史脉络——海洋史视角下国际关系》。

^②梁英明、梁志朋等：《东南亚近现代史》（上册），第9页。

群体。^①同时存在的开放性和封闭性导致了一个统一且稳定的政权无法在这里存在，同时相对落后的生产力至少部分地导致了当地人面对外力侵入时的无力，这也阻碍了他们形成一种广泛上的民族认同。但反过来，欧洲人的入侵也确实将众多操着不同语言、信奉着不同宗教和不同人种的人群置于同一个殖民政府的统治之下。与此同时，这个政府所创立的近代教育体系也塑造了殖民地的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在任何国家和地区这些人都是民族主义中的核心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通常所接受的双语教育使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共同的语言，并且能接触和了解早期欧洲民族主义的历史、思想和行动模式。就如同欧洲人是从美洲革命上学会了反抗王权一样，东南亚人也开始了模仿并付诸于针对宗主国的实践。另一方面，殖民地自上而下歧视性的行政和教育体系也限制了当地人的社会和政治流动，形成了类似于安德森提出的“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cramped pilgrimage*）^②的共同体验，殖民地的边界就是他们的活动边界，这促使他们将殖民地想象成“祖国”，将殖民地民众想象成了“民族”。语言的共通与技术的进步为东南亚民族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其又通过民粹式的主张获得了下层民众的狂热支持，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则为这种蕴含着巨大能量——驱使无数人去屠杀或者赴死——的想象打开了喷涌的闸门。

第一处喷发的闸门坐落在菲律宾。当二十世纪即将到来时，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和菲律宾的地位即将受到新兴的美利坚帝国的挑战，不过在此之前，她还必须应对来自殖民地的叛乱。得益于印刷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卡蒂普南”（民族儿女最尊贵协会，其首字母缩写为 K.K.K.）这一由安德烈斯·波尼法西奥（*Andrés Bonifacio*）于 1892 年在马尼拉秘密成立的革命团体得以飞速发展。拜殖民地的教育体系所赐，波尼法西奥和团体的另一位得力干将埃米利奥·哈辛托均获取了足够的知识来推进他们的革命事业。相比于波尼法西奥，哈辛托收到了更为良好的教育——他在圣胡安·德·累特朗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又在圣托斯大学学习法律。但这些知识分子的教育经历并未造就他对宗主国的忠诚，反而使他立志于恢复被奴役的菲律宾的自由，并利用所学在卡蒂普南撰写文件，编辑报纸，制造火药和武器，甚至在革命期间指挥军队作战。而团体的其他成员也多在西班牙

^①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2,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54.

^②关于这一概念可参阅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6, pp.53-58.

殖民机构中或外国商行中担任文书和办事员的职务，可以说对于殖民统治有着耳濡目染的认识，思想和行为也偏向激进。

在何塞·黎刹博士被西班牙当局流放后，其主导的渐进式的改良运动——“宣传运动”便偃旗息鼓，让位于卡普蒂南的暴力式革命，民族主义的烽火在1896年8月23日燃烧了起来，并很快蔓延至吕宋岛全境。面对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殖民当局很快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将原本被批准前往古巴——那里同样在进行革命和镇压——从事军医工作的黎刹从苏伊士运河上直接押解回菲律宾。在一场犹如走过场般的“审判”之后，1896年圣诞节后的第二天，他被军事法庭以煽动叛乱为名判处死刑，并于四天后在马尼拉的海滩上被处决。这一行动很快被证明是愚蠢和毫无意义的，唯一的结果是激起了菲律宾人更大的愤怒。

但正如很多中途夭折的革命一样，菲律宾革命阵营内部也很快因权力斗争出现了分裂。在经历了一番血雨腥风之后，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成为了最后的赢家，并将对手波尼法西奥送进了坟墓。出身于甲米地省一个名门望族的他由于先前获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而赢得了巨大的威望，这也成为了他攫取革命领导权力的资本。但是权力斗争不可避免地削弱了革命阵营本就逊于宗主国的力量，西班牙的军队趁此良机大举进逼，至1897年6月，甲米地省已重新被殖民政府控制。尽管革命者们退到了八打雁和布拉康继续坚持抗争，但双方出于现实的考量而实现妥协显然已为期不远。虽然革命者最初提出的交涉条件中包含了“菲律宾在西班牙议会中的代表权”，“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和“允许菲律宾人担任政府机关高级职务”^①这类体现民族主义者们渴望打破同宗主国之间藩篱的主张，但在最终签订的和平协议《边那巴多条约》（《破石洞条约》）中，这些条款全无踪影。阿吉纳尔多根据协议内容自动流放至香港，但他并未打算就此放弃。在即将到来的美西战争中，他即将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实现菲律宾独立的愿望，而当美国人染指菲律宾的扩张主义野心暴露之时，作为现实主义者的他同样会选择妥协，正如四十年后他会选择同踏上菲律宾土地的日本人合作，并在战后继续同美国人合作一样。

不过客观来看，阿吉纳尔多代表了早期亚洲殖民地民族主义者中的一类人，

^①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81页。

他们尽管渴望独立，但更恐惧于底层民众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当敌对势力的武力占据上风时，他们会做出基于现实主义考虑的退让，而不是煽动民众进行代价高昂与徒劳的战斗。菲律宾革命最终以菲律宾共和国在美菲战争中的失败作为收场，菲律宾成为了美国的殖民地。而关于这场革命的性质和特点仍存在很多争议，而这些争议也同样存在于其他地方的革命活动中。究竟革命是民族主义精英动员和煽动的结果，还是底层民众自发的群众性运动的产物？如果是后者，那么民族主义、民间信仰和宗教是否起到了鼓舞作用？现实情况是复杂的，可以说没有一种一概而论的解释。一些学者认为那些壮大了卡蒂普南阶层构成的人们的关于世界和他们身在其中的地位的思想是有别于菲律宾社会中的“优等阶层”的思想的，而这些思想在革命领导权落入像阿吉纳尔多这样的精英手中的过程中被保存了下来，并成为了一股促进日后菲律宾在美国统治下实现重生和复兴的持续涌动的思想源泉。^①

无论如何，菲律宾的革命与之后同美国的战争开启了所谓“亚洲觉醒”的先声，促进了同时期亚洲的其他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黎刹与卡蒂普南的思想和主张鼓舞着亚洲的民族主义者们为争取本民族和本国的独立和解放而不懈斗争。菲律宾扮演这样一种先行者的角色并非偶然。“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一直困扰着亚洲的改革和革命，从明治维新到戊戌变法莫不如此。这种冲突越是激烈，亚洲实现社会变革并赢得对西方的斗争的可能性就越是渺茫。由于没有像中国那样长期的君主专制或东印度和马来亚众多的封建土邦这样的阻碍，“菲律宾……先于亚洲其他国家而觉醒也就势在必然了”。^②

或许对于当时的菲律宾来说，业已没落和专制的西班牙统治者被相对先进和民主的美国所取代不失为一种更为务实的选择。虽然在美国人主导的“舒尔曼委员会”和“塔夫脱委员会”等“菲律宾委员会”的控制下，由菲律宾人自己选举产生的“菲律宾会议”的权力相当有限，而且其决议的最终裁定权掌握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国会手中，与之相似的是菲律宾的最高法院也收美国最高法院的管控。与此同时在各级地方政府中，尽管菲律宾人占有较大比重（如1910年的省级官

^①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2,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p.261.

^②陈衍德：《亚洲觉醒的先声——菲律宾1896年革命及其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对抗、适应与融合——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岳麓书社，2003年，第49页。

员的90%以上，镇级官员的99%为菲律宾人^①），但其多为各项事务的執行者，并不拥有决策权。^②总体上看，美国殖民初期的菲律宾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均为美国人所把持，当地人在权力分配中基本上处于装饰性地位。尽管如此，除了一些地方上的游击活动外，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者并没有制造很大的麻烦。自诩为代表了民族利益的精英们在权衡了各项利弊，并同美国人达成了各项交易后，放弃了暴力手段，转而采取压力集团的策略来达到自身的目的。这样一来，随着美国通过军事手段确立了对南部穆斯林社区的统治之后，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平息下来。在二战前的这段日子里，除了1935年间接加速了菲律宾自治的“萨克达尔党”（他加禄语 Sakdal，表示“抗议”的意思）起义和共产主义者组织的集会、游行和罢工之外，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菲律宾的上层民族主义精英主要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的形式来争取利益。

以菲律宾革命为契机，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在东南亚的其他地区也开始萌发，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发展态势。

在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的反抗程度最为激烈。作为一个长期以来抵抗来自北方中国政权控制的国家来说，要区分传统上的爱国主义（毋宁说是受儒家影响下的忠君爱国思想）与近代民族主义还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法国在十九世纪中期控制交趾支那后，由于顺化朝廷承认了入侵者的特权，这就使当时的越南人产生了某种道德困境——即反抗殖民者等于反抗朝廷的意志。^③即使在后来朝廷被强硬派掌控并号召发起勤王运动时，法国人也通过采取另立顺从的新帝并抓获和流放前任君主的手段使朝廷彻底丧失了作为民族主义旗帜的作用。越南的命运最终由法国和中国的战争和谈判所决定，清政府在朝鲜爆发甲申政变以及台湾战况危急之际^④只得承认《第二次顺化条约》，即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为东亚“华夷秩序”的崩溃又增添了一处注脚。此后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渐趋稳固，虽然在政治和文化政策上较为反复无常，但其经济政策则总体稳定和连续，即将越南建设成为从属于宗主国的经济体，这也是许多殖民帝国对待殖民地的一贯态度。

^①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第448页。

^②陈衍德：《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与菲律宾的民族主义》，《对抗、适应与融合——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岳麓书社，2003年，第67页。

^③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2,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p.276.

^④如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寄两广总督张之洞电旨：“……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85页。

进入二十世纪后，越南的民族主义运动随着之前提到的殖民地教育体系的完善而开始发端，并受到中国的维新改良思潮及日俄战争的影响。这期间两个代表性人物分别为希望维持君主制并以皇室作为民族主义大旗的潘佩珠，和更受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影响，主张彻底摒弃卖国朝廷在越南实行共和制的潘周桢。而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似乎令后者的思想更具吸引力。观念上的分歧最终使二人分道扬镳。但到了二十年代，随着儒家知识分子的年龄同其拥戴的朝廷的威望一样日渐衰弱，越南的民族主义被激进派占据了上风。此时另一个日后声名显赫的人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自号“阮爱国”的他成为了越南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份子，并将在1945年后以其众多化名中最著名的一个——胡志明而广为人知并被包装成一个道德楷模和革命神话，尽管有学者批评他在这时期有可能为了赏金而做出过出卖自己的恩师潘佩珠这一令人不齿的行为。^①这一时期另一个昙花一现的激进团体是越南国民党（VNQDD），作为中国国民党的模仿者，前者在创立初期的种种冒险行为招致了法国殖民当局迅速且毫不留情的镇压，并从此陷入一蹶不振的状态，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开始重新活跃起来，但旋即又遭到越盟的清洗。国民党的失败反过来为胡志明的印度支那共产党腾出了空间，该党在随后到来的经济危机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壮大，并开始同民族主义者争夺反殖民主义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而在印度支那的其他地方，比起越南的动荡，老挝和柬埔寨的相对平静令人疑惑，一种说法是这两地相对于越南在资源上的相对匮乏使得当地殖民政府无力也无意实行严苛的统治，这种表面上的“宽松”或许是造成当地在战前民族主义式微的主要原因。^②

而在英属殖民地，情况要复杂得多。在英属缅甸和英属马来亚及北婆罗洲这几处拥有众多族群、宗教和文化的地区，单一地以领土范围界定民族主义的构成似乎并不合适。在缅甸，少数民族问题是困扰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实现独立的主要阻碍。无论是人数较多的缅族、孟族、若开族、克伦族、掸族及克钦族，还是人数较少印度人和华人，都会不自觉地民族主义运动中制造分离因素。一些少数民族由于担心受到人数居多的缅族的统治，甚至会寻求殖民当局的庇护，而对实现独立缺乏热情。^③以至于在战后缅甸同英国就独立进行谈判时，少数民

^①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一个越南民族主义的伪装者》，传记文学，1970年，第42页。

^②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2,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p.282.

^③*Ibid.*, p.284.

族的向心问题成为了超越缅甸人同英国人分歧问题的存在。如果将视线集中到英国人同缅族人的互动上，那么至少可以理清后者的民族主义发展脉络。在三次英缅战争之后，贡榜王朝灭亡，君主制的废除成为英国人对缅甸政治进程的重要干预之一。从印度支那、马来亚和东印度的例子来看，保留一个传统的上层统治阶级会给殖民统治带来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而且从越南民族主义的经验（潘佩珠和潘周桢的分歧）出发，传统精英的存在或许会给民族主义带来一定程度的分裂。

①英国人的另一项重要的干预在于将缅甸的行政管理挂靠在英属印度之下，由于这项得天独厚的优势，印度业已成熟的由国大党所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无疑会使缅甸本土的民族主义在组织和策略方面获益匪浅。

除了印度之外，佛教也在缅甸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了象征民族凝聚力的角色，不过这一传统的代表也注定会同新兴的世俗主义间爆发冲突。也正因如此，1906年成立的佛教青年会（YMBA）才会在1921年改头换面为缅甸人民团体总会（GCBA），并通过煽动仰光大学学生的罢课确立了今后学生参与到缅甸政治进程中的传统。②然而，传统的佛教徒同西方化人士之间的鸿沟已难以弥合，在面对英国的二元制政治改革时，关于参与还是抵制这样的有限自治计划的争论贯穿了缅甸民族主义者的二三十年代。在代表了传统反叛形式的萨耶山起义被镇压之后，以德钦党为代表的新兴城市知识分子逐渐掌握了民族主义的话语权。他们中的昂山和吴努将成为今后数十年的焦点人物。在1937年缅印分治之后，一些对于英国的有限让步和对持合作态度的原民族主义领导人不满的年青人开始寻求激进的方案来实现缅甸的彻底独立，被英国人的傲慢和吴素政权的镇压激怒的他们希望借助外力来实现这一目标，并最终促成了与日本的合作。

而在马来亚，民族主义的发展则不同于东南亚的大多数地区。如表1-1所示，这一地区的外来移民人数要多于本地马来人，这也就意味着针对外来族群的复杂情感将影响着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马来亚的经济主要依靠外来的华人和印度人等非马来族裔，因此英国当局对于当地人接受必要的教育和培训的需求并不是很迫切，因此作为民族主义天然温床的知识分子阶层在这里出现的时间要稍晚于其他地区。一个关于马来民族主义可能的标志性事件是1926年“新加坡马来人联盟”的这个马来人政党的成立，马来人得以以此为契机开展对民族主义的

①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2,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p.285.

②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下册）》，姚楠、马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643页。

讨论和宣传。^①这些讨论除了在东南亚其他地区同样存在的针对殖民当局及同其合作的马来人统治者的批评之外，也包含着对外来移民数量不断增加的担忧。而英国人也利用了这一点，开始有意识地实行亲马来人的政策，并煽动马来人对其其他族群的敌对情绪。^②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又迫使殖民当局重新考虑外国劳工的重要性，并开始探讨华人和印度人的作为马来亚的永久居民的可行性，这又加剧了马来人对外来族群地位上升的担忧。再加上中国的国民政府于中日战争爆发后在当地华人社区中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引发了诸多骚乱，马来人认为这体现了华人对母国的忠诚要高于对马来亚的忠诚，导致对于外国势力干涉的担心与日俱增。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马来民族主义中的激进团体马来青年联盟（KMM）应运而生。但从总体上看，马来亚民族主义并未在当地民众当中获得足够的支持。马来亚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的概念在当时并未收获多少认同，普通的马来农民只忠于当地土邦的苏丹，而其他马来土邦的人在他们眼中都可归入外国人的范畴。或许正因如此，在日本入侵之前，马来人在东南亚人对政治的态度最为冷淡，导致民族主义运动在当地一直不温不火。^③

表 1-2 1911 年-1941 年英属马来亚（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人口普查统计表

	1911 年	1921 年	1931 年	1941 年
马来人	1437000	1651000	1962000	2278000
华人	916000	1174000	1709000	2379000
印度人	267000	471000	624000	744000

资料来源：D·G·E·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The Macmillan Press, 1981, p.836.

最后，在荷属东印度，民族主义的处境可以视作其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缩影。二十世纪初期，东印度世俗化的民族主义者除了要同殖民当局博弈外，还要面对来自共产主义渗透和伊斯兰教联盟壮大的挑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后两者没有民

^①Radin Soenarno, "Malay Nationalism, 1896-194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1, No. 1, Nationalism in Malaya (Mar., 1960), pp. 1-28.

^②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2,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p.302.

^③D·G·E·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The Macmillan Press, 1981, p.839.

族主义的诉求。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伊斯兰教联盟是爪哇的底层民众表达反殖民情绪的唯一通道。^①1912年成立的这个联盟最鼎盛时号称有超过两百万的成员，受益于荷兰当局在1901年开始实施的旨在提升殖民地福利、促进经济发展并提高当地自治水平“道义政策”，它的初期发展并未受到过多束缚，但这种待遇恐怕也同其领导层采取与当局合作的态度有关。然而以共产主义为首的激进主义逐渐在组织内部渗透，许多分部成员同时加入了伊斯兰教和共产党，而这恐怕与马克思批判宗教的态度相左。这种身份认知上的撕裂最终导致两者暂时合作的产物——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在1921年后销声匿迹，当共产党人煽动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脱离联盟时，其同伊斯兰教联盟保守分子的彻底决裂也就不可避免了。^②

然而，由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更名而来的东印度共产党在之后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进入二十年代后荷兰当局逐渐放缓了改革进程，并开始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监控和镇压，针对日益收紧的局势，不愿坐以待毙的共产党在1926年发动了孤注一掷的暴动。然而殖民政府以铁腕的镇压手段证明了其在东印度仍然拥有稳固的根基，并使共产党从此转入地下状态直至1945年。同时伊斯兰教联盟也受此牵连而名誉扫地并失去了主导民族主义运动的地位。这之后直到战前的一段时间内，由出身学校教育的知识分子团体——同东南亚其余地方一样——接过了民族主义的大旗。1928年成立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创始人之一苏加诺将作为印度尼西亚之父被后世铭记，然而此时他只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并将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饱受逮捕和监禁之苦。日渐强硬的荷兰政府将民族主义和穆斯林运动列为五个威胁殖民政权的来源之一，^③并禁止使用任何带有“印度尼西亚”的字眼。这或许是一种过激的反应，至少对苏加诺和他的党来说，他们的人数有限，根基尚浅，且与传统穆斯林之间分歧较大。同缅甸的德钦党人类似，东印度的民族主义者真正拓展势力还要等到日本占领时期。^④随着三十年代末期世界局势的逐渐紧张，荷兰当局本有机会同民族主义者们实现和解来共同应对外部威胁，但他们以殖民地尚不具备自治的基础而拒绝了这一建议。再一次，西方人的傲慢葬送了武装保卫殖民地的最后时机，并最终将民族主义者推向了日本人一

^①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下册）》，第682页。

^②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下册）》，第682页。

^③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2,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p.273.

^④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下册）》，第684页。

方。

以西方殖民者所划分的领土范围基本上塑造了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疆界，在这些殖民地兴起的民族主义也基本上认同将本殖民地的范围作为塑造未来国家的基础。然而，必须承认还存在着一些跨越了政治分界线的民族主义主张，如华人、印度人和穆斯林等族群实际上对于所处殖民地的独立的关注要远远少于对母国（中国和印度）的命运或者同东南亚其他地区族群的统一（泛伊斯兰运动）的关注。另外还必须看到在各殖民地内部的少数民族同主体民族间的对立，如缅甸的掸族、克伦族和穆斯林，菲律宾南部的摩洛人，暹罗北大年邦的马来穆斯林等，这种对立往往会为殖民者“分而治之”提供机会，并最终成为分离主义的温床。最后，暹罗作为一个独特样本也值得被特别关注，作为东南亚在战前唯一的独立国家，她被朱拉隆功和瓦栖拉兀所提倡的“官方民族主义”所影响，这成为暹罗同具有同样意识形态的日本进行合作的基础。最终在銓披汶时期，将国号变为“泰国”的民族主义者发起了更类似于帝国主义的“泛泰运动”，意图收复过往所失去的领土。总体上看，在战前的半个世纪的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在各殖民地的发展可谓态势各异，且因为除了共同受殖民统治的经历外殖民地内部并无多少团结基础，因此总体成果并不尽如人意。然而必须看到民族主义为东南亚的前景毕竟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政治蓝图并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地区民族身份意识的增强，这种内在的变化将在西方势力衰弱之时显示出真正的威力。

第三节：两者的早期互动

在菲律宾革命爆发八年前的1888年4月，何塞·黎刹博士在从横滨踏上前往欧美的途中时偶遇日本作家末广铁肠，黎刹作为这个不会外语的日本记者的翻译与其在路上结伴而行并共同游历了美国、英国，在末广于12月离开伦敦时，黎刹还专门前往码头送行。^①三年之后，末广完成了他关于菲律宾独立运动的小说《南洋之大波澜》，这本书的主人公多加山峻是以黎刹为原型，描写了他为实现本国独立借助日本的力量赶走了西班牙人并最终被日本天皇册封为菲律宾总督

^①详情可参阅末広鉄腸『鴻雪録』博文堂、1890。

的故事。由于当时日本的对外政策重心放在朝鲜半岛，且顾及到同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最终表示中立并支持美国对菲律宾的支配主张，小说描写的情景在菲律宾最终并未实现（吊诡的是朝鲜最后的结局却与小说不谋而合），但末广同黎刹的这段交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日本同东南亚民族主义者之间深厚的渊源。

如前文所述，十九世纪末期的“南进论”在日本国内并未成为主流，持这种主张的也多为民间人士，但是这并不妨碍曾经同样面临西方入侵危机的日本人对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抱有某种同情的心理。事实上日本在1895年对中国的胜利引起了民族主义者们的注意。在1896年菲律宾爆发之前，就有两名革命者何塞·A·拉莫斯（Jose A. Ramos）和多罗泰奥·柯提斯（Doroteo Cortes）前往日本寻求帮助，并同当时日本的一位民族主义者大井宪太郎有过接触。另外据说卡蒂普南的革命者曾在1896年5月向日本“金刚”号训练舰的舰长发出过呼吁，希望日本能像当年援助美洲革命的法国那样对菲律宾革命伸出援手。^①同时另一些狂热的爱国者（志士）想要走得更远，而一些西方人也确实考虑到日本干涉的可能性，但日本的当政者却将三国干涉还辽的屈辱埋在心里而选择谨慎行事^②。此外美国人的介入更加剧了这种谨慎。当时受台湾总督府指名在菲律宾从事了7年的情报收集活动并参与了独立运动的志士坂本志鲁雄向东京建议在杜威封锁马尼拉时可相机占领之，然而参谋本部回复：“控制南部海域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事业，然而现在并不是最佳的时机，你必须使自己置身事外”。^③然而，美国在战胜西班牙后是否会将菲律宾据为己有在当时尚不明了。日本外相大隈重信指示日本驻华盛顿代表，无论美国是吞并还是将菲律宾置于保护国地位，日本都予以承认。而如果美国以上两种打算都没有的话，日本则希望同美国一道或者伙同其他列强来稳定当地的局势并重建秩序。只是后来美国根据《巴黎条约》将菲律宾置于自己统治之下，这一“帝国主义”行径招致其国内的广泛批评，而日本染指菲律宾的意图也就此落空。^④

相比于日本政府的低调，日本的民间人士倒是为菲律宾的革命和独立贡献良多。曾为中国革命提供过大量资助的梅屋庄吉就与菲律宾革命人士有过重要来

^①Usha Mahajani, *Philippine Nationalism*, St Lucia: Queensland Univ. Press, 1971, p.405. 转引自 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Singapore: Horizon Books, 2001, p.4.

^②J.M.Saniel,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Quezon City: Univ. of the Philippones, 1962, p.182. 转引自 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Singapore: Horizon Books, 2001, p.4.

^③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Singapore: Horizon Books, 2001, p.5.

往。1897 底，流亡香港的阿吉纳尔多结识此时在港开照相馆的梅屋庄吉，次年 4 月 25 日美西战争爆发，4 月 30 日日本政府宣布“局外中立”。尽管如此，梅屋在阿吉纳尔多动身返回菲律宾时仍决定为其提供资金帮助，并选择随其前往菲律宾并担任菲律宾独立军中的高级参谋。^①之后的 1899 年 6 月，决定武装反抗美国统治的阿吉纳尔多派遣特使马里亚诺·蓬塞秘密前往日本，希望获取军火援助。但日本政府和军方顾忌美国方面的反应拒绝对菲律宾提供武器。然而经梅屋介绍，蓬塞找到了此时居住在横滨的孙中山，后者将其引荐到当时日本亚细亚主义的领军人物犬养毅处。在犬养毅的运作下，原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经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福岛安正找到当时的陆军大臣桂太郎，将一批据说为甲午战争战利品（500 万发毛瑟枪弹）的军火以大仓公司之名从军部手中买下，装上三井物产的一艘旧船“布引”号（1440 吨）计划秘密运往菲律宾。不过这批军火最后并没有到达菲律宾人手中，据传船只在途经台湾海域时遭遇风暴于 7 月 21 日沉没。^②

但日本人并未就此罢手，据梅屋庄吉的《永代日记》所记载，中村在多方奔走之后从西班牙人那里接受了 40 万美元的和解金作为日本带阿吉纳尔多离开菲律宾的报酬，但日本人似乎并不热衷于履行同西班牙人的承诺，反而把这笔钱用在为阿吉纳尔多的反美独立运动购买武器之上，而账面上的伪装最后也是交由梅屋操办。^③此外，在 1898 年菲律宾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日本华族、后来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父亲近卫笃麿创立了东洋青年协会，并将菲律宾独立运动作为主要议题，吸引了日本、中国、菲律宾、暹罗等国家的众多青年参加。作为该协会的成员的作家山田美妙也在同蓬塞有过接触并参加了纪念就义的黎刹博士的追悼会。菲律宾独立战争结束之后他又以蓬塞委托日本人翻译和出版的《南洋之风云》为蓝本撰写了一部阿吉纳尔多的人物传记，这本在 1902 年出版的《阿吉纳尔多：菲律宾独立战话》使菲律宾革命和阿吉纳尔多在日本的知名度有了显著提升，从而使更多的日本人开始关注大海南边的那片岛屿。

除了菲律宾之外，日本对外战争的胜利同样刺激到了其他东南亚人。如潘佩珠在成立越南维新会的次年，就为寻求资金和武器援助来到日本。彼时的日本由于刚刚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俄国，其在亚洲的声望正逐渐上升。在逗留日本的

^①小坂文乃：《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吴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年，第 66 页。

^②小坂文乃：《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第 68 页。

^③同上。

1905 到 1908 年间，潘佩珠与越南阮朝末期宗室彊柢发起了“东游运动”，号召越南的知识分子前往日本留学，学习日本之所以能战胜欧洲列强的先进经验。彊柢本人还使用化名进入振武学校和早稻田大学学习。而未能获取到军事援助的潘佩珠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在此期间结识了正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和孙中山，并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另外他还在梁启超的帮助下使用别号“巢南子”撰写并出版了《越南亡国史》一书，在书中他记述了越南的历史、亡于法国的原因和革命者志士们的抗法事迹，并展望了越南的将来，希望能唤醒越南广大的民众为摆脱殖民统治实现独立而奋斗。^①然而好景不长，随着 1907 年《日法协约》的签订，迫于法国方面的压力，日本政府开始取缔国内的越南民族主义活动并驱逐越南留学生。

而缅甸佛教团体总会创始人同时也是一名民族主义者的缅甸僧侣吴欧德马曾在 1905 年写道“日本是历史上未闻其名的东瀛小国。俄国人的体格近日本人的两倍”，“从未入流的日本和俄国人开战，为何会取得胜利呢？简直不可思议”。^②他于 1907 年来到日本，在东京佛教研究院教授梵文、巴利文等课程，又到京都研究佛学。当印度巴罗达土邦（Baroda State）的大君到日本争取援助以反对英国统治时，他也曾提供过帮助。^③印尼独立运动领导人穆罕默德·哈达在 1923 年于荷兰留学中的论文中称，日俄战争是影响印尼民族主义的三要素之一（其他两项为印度国民会议派运动和土耳其近代化），“对马海峡的炮声开启了 20 世纪。”^④不能否认的是，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这段时期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者们对于日本还是抱有着希冀与好感的，比如有菲律宾学者就认为“日本在中日战争（1894-95）中的胜利，为亚洲所有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人民所欢迎。尤其是菲律宾人，他们那时正呻吟于西班牙残暴统治之下，仰望日本帮助他们的正在面临的求自由的斗争”。^⑤当然这也同日本当时的一批亚细亚主义者的活动有一定的关系。只是日本当时的对外政策重心放在大陆方向，对东南亚方向只能

^①参阅越南巢南子述，梁启超撰：《越南亡国史（记越南人之言）》，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第 508-542 页。

^②吉川利治『近代史のなかの日本と東南アジア』東京書籍株式会社、1992、236 頁。转引自周俊：《二战前日本南进政策形成的历史脉络——海洋史视角下国际关系》。

^③宋立道：《佛教民族主义在南亚·东南亚的发展》，《佛学研究》，1996 年第 5 期。

^④後藤乾一『東南アジアから見た近現代日本——「南進」・占領・脱植民地化をめぐる歴史認識』岩波書店、2012 年、15 頁。

^⑤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上册）》，吴世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214 页。

暂时做现实主义式的克制，再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政府的帝国主义式行径亦逐渐使各国的民族主义者们感到失望，双方的互动随之转入低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得到了原属德国的太平洋岛屿，再加上对台湾的治理逐渐步入正轨，同东南亚的经济往来也稳步增多，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日本对东南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并未达到可以取代朝鲜和满洲的地位。然而，在1929年经济危机、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联等变故接踵而至之后，日本逐渐走上了武力挑战西方列强在东亚和太平洋的条约体系的道路，而东南亚因扼守交通咽喉和自身丰富的战略资源而成为昭和军阀们觊觎的宝地。在1936年8月7日的五相会议上，“南进”正式从一种民间思想上升为同大陆政策平起平坐的一项“国策”，而与其配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也将陆续展开。以此为契机，日本同东南亚民族主义者们互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小结

本章用较大的篇幅分别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的“南进”与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发展和互动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两者从最初的相对比较独立的发展过程以甲午和日俄两场战争为契机产生了交集，并随着日本同东南亚的物资、人员和资金的往来而逐渐加深。但是，这时的日本由于自身实力所限，往往会选择维护东南亚原先存在的殖民秩序，从而对民族主义者会采取冷淡甚至是打压的态度。不过随着世界局势的演变，尤其是一战和1929年经济危机极大地削弱了西方殖民帝国的实力后，再加上日本国内军部势力的抬头，日本对于东南亚的侵略野心逐渐膨胀起来，并出于现实和功利的需要开始尝试拉拢和扶持东南亚的民族主义势力，最后更直接抛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以合理化自身所发动的战争，而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将在下一章着重阐释。

第二章：观念的博弈：“大东亚共荣圈”与《大西洋宪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于以往任何战争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不仅是一场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更是一场证明各交战国意识形态优越性的战争。民主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当然还有本文的主角——民族主义）各类意识形态名词粉墨登场，成为各交战国政府证明其战争正当性和获取本国民众支持的手段。具体到东南亚战场上，日本为其发动和延续战争寻找的意识形态借口则由中日战争时期的“膺惩暴支”、建设“东亚新秩序”演变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标榜其为驱逐白人势力，解放东南亚受殖民的当地人才发动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此种极具欺骗性的说辞为日本的战争披上了反殖民主义和区域主义的外衣，并使其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获取了部分东南亚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从而相对减少了征服的阻力。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其中所包含的“尊重民族自决”的条款可以视作向新兴的轴心国集团的挑战。在面对这两种相对立意识形态的拉拢时，民族主义者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做出了何种选择，其动机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将是本章所讨论的重点。

第一节：日本在战时的进军与西方在东南亚殖民秩序的逐步瓦解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降，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蔓延以及欧洲由于纳粹上台造成局势日益紧张，西方宗主国迫于经济考量和现实压力，大都对处于“帝国边缘”的东南亚殖民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松绑”。一些地区在立法层面上有所突破，如菲律宾和缅甸均在1935年获得了一部新的宪法，从而获得了相对较大的自治空间，并朝着独立的前景迈进。相比之下法属印度支那和东印度群岛的改革步伐要缓慢得多，尽管当局增加了当地人在立法机构和各种委员会中的代表人

数，但这显然无法满足业已达成身份觉醒的殖民地民众。而两个特殊的政治体是暹罗和马来亚，前者在一个独立的政府主导下进行了一场更倾向于官方民族主义的改革，而后者则如上一章所讲，似乎对于政治地位的诉求不那么热衷。或许，如果没有二战的爆发和日本的入侵，东南亚的殖民秩序仍然会逐渐消亡，但对比非洲的例子，恐怕这一过程将会持续相对更长的时间。从这一角度来看，日本的征服和占领加速了东南亚殖民秩序的瓦解这一观点显然具备一定的说服力。

在东南亚被卷入战火之前，欧洲的大战已经爆发了两年，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巨人正在进行着一场有史以来最为血腥残酷的战争。而在亚洲，日本同中国的战争也已经持续了四年，并呈现长期僵持的态势。根据“中华民国”政府所编《抗战简史》中的数据计算，截止1941年底，日本军在中国战场阵亡人数已达326761人，^①另据中国派遣军第一课高级参谋真田穰一郎大佐于1940年11月28日在东京所作的报告，目前日本在华兵力（应不含关东军）为：华北25万，华中29万6千，华南16万6千，定员外1万6千，总数为72万8千人，航空部队共二十个中队。^②而日本在1941年的军费支出和临时军费预算合计为198亿2700万日元，占全部政府财政支出259亿5700万日元的比重约为76%。^③很显然，在中国维持一支庞大的占领军和进行攻势作战对于此时的日本财政来说已是不堪重负，因此中国派遣军在将今后的作战重心转向治安作战的同时，更计划到1944年时逐渐将总兵力缩减为60万人。^④有鉴于此，为了将对华侵略战争长期进行下去，除了要在国内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依战争所需进行改革之外，更要对外确保战略物资的充足供应。根据表2-1，在日本1936年进口的工业原料中，东南亚提供了18种重要原料中的十种，而铁矿、锡、橡胶、矿油和纤维的比重都接近甚至超过50%，所以如果要将日本的战争机器维持下去，在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不断恶化且早晚会有一战的前提构想下，提前做好进攻并占领东南亚的准备无疑是相当迫切的要求。恰在此时，德国在欧洲的征服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时机。首先法国和荷兰本土在1940年相继沦陷，英国则退守英伦三岛苦苦支撑，欧洲政治版图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室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07页。

^②同上，第608页。

^③中村隆英编：《日本经济史7：“计划化”和“民主化”》，历以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39页。

^④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室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608页。

的巨大变动不可避免地投射到了远东和东南亚，西方宗主国似乎已无暇顾及远在天边的殖民地，趁机夺取东南亚的条件似乎已经成熟。但对于在 1937 年 11 月 6 日就同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防共协定》、1940 年 9 月 27 日正式缔结《三国同盟条约》后又在 1941 年 4 月 13 日同苏联签署《日苏中立条约》的日本来说，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的爆发却使其外交方针陷入了巨大的混乱。据当时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所分析，日本当时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一、由于同德意等轴心国签署了盟约而被绑住了手脚；二、同苏联签署的中立条约也束缚了日本；三、解决同中国的冲突遥遥无期；四、同荷属东印度的谈判未取得预期结果；五、同美国的关系正在急剧恶化。”^①这些困境无论是在日本政府还是军部内部都造成了对立，如近卫文麿首相和海军方面都希望慎重对待德苏开战问题，而松冈洋右外相和陆军方面则主张对北方实行武力解决。经过一系列的博弈，最终近卫以内阁总辞职的手段罢免了松冈，于 7 月 18 日再次组阁，并任命一直主张避免同美国冲突的丰田贞次郎担任外相。而近卫经过一番商讨也已在 7 月 2 日的御前会议上同主张立即对苏开战的强硬派达成了交换，以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作为妥协的条件。^②然而，日本在印度支那的进一步侵略扩张终于使得美国忍无可忍，并招致了严厉的惩罚。

^①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1932 至 1942 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蒋相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397 页。

^②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三卷 太平洋战争前期），金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 139 页。

表 2-1 日本工业原料中的东南亚资源（1936 年）

品目	供给量	在该品输入总额中的比率
铁矿	169 万吨	44.7%
屑铁	7.8 万吨	5.2%
锡	0.27 万吨	50.8%
煤炭	88.5 万吨	21.7%
磷矿	9.9 万吨	10.7%
橡胶	4.3 万吨	68.5%
原重油	82.2 万升	21.1%
矿油	48.3 万升	66.1%
棉花	4.1 万俵	0.3%
麻及其他纤维	123 万斤	57.0%
平均		34.1%

资料来源：依田熹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1868-1945》，卞立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380 页。

时间回溯到一年前，1940 年 7 月 22 日第二届近卫内阁组建伊始就在 7 月 27 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通过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法国投降后紧急制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首次提出以武力来解决南方问题。^①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如果想在东南亚侵占任何领土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一块地区将会是印度支那，这里是进入东南亚的跳板。举例来说如果日本想要绕过印度支那进攻东印度群岛的话，那么就会暴露其脆弱的侧翼。很明显，“若想征服东南亚任一块区域，就必须先使印度支那臣服，无论是用说服还是用武力的方式。”^②日本开始使用武力手段是在西原一策机关长同印支法国当局商讨切断援助重庆政权路线并使用印支北部机场的交涉并无多少进展的情况下，以华南方面军下属

^①藤原彰：《日本近现代史》（第三卷），伊文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79 页。

^②Stephen Uhalley, Jr., “Japan's Southern Advance: The Indochina Phase”, *Asian Studies*, (April 1966), pp.84-102.

第5师团在边境集结为威胁手段，迫使印支总督德库派遣陆军司令马尔丁同西原于9月4日签署了《西原——马尔丁协定》。这一协定原则上同意日本军队进驻印支北部，但将行动区域限定在红河以北地区，且日军不得采取任何威压行动，否则中断谈判。^①然而次日却发生第5师团森本宅二大队越境事件，导致法国单方面中断了谈判，此后直至22日，日军才在经过一系列小规模冲突后强行进驻了法属印支北部。针对此情况，美国在7月26日对日本必需的石油和废铁实行了输出许可制，并在31日限制向日本输出航空汽油作为报复，然而这并未阻碍日本在1940年从美国获得470万磅废铁，而到了1941年，这个数字将攀升为2270万磅。^②之后泰国的銮披汶·颂堪政府基于泛泰主义的扩张野心，也效仿日本向法属印支当局挑起挑起边境纠纷，希望能收回在1893年法暹战争后被迫割让的领土。后来经过日本的介入，法国当局被迫割让了老挝和柬埔寨的一部分争议领土，颂堪政府借此迈出了建立个人帝国的第一步，而日本也借机深化了同泰国的合作关系，为战时日泰攻守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除中南半岛外，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另一处外交重点为荷属东印度。在1940年8月中旬，日本向荷印派出以三井物产会长向井忠晴为首的七名民间交涉员，并于27日任命商工大臣小林一三为荷印特使，希望同荷兰当局达成政治上的合作关系，以确保来自当地的资源。然而谈判持续到10月15日，双方只是发表了一个聊胜于无的标榜“友好”的共同声明。其后日本直接说明了意图，民间代表在29日的最后通牒中不仅要求对婆罗洲、苏拉威西、荷属新几内亚、阿洛群岛及斯豪顿群岛等广大地区的开发权，而且要求荷印当局承认上述地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并支援日本在这一地区的行动。^③对于这一咄咄逼人的要求，荷兰人选择一边敷衍，一边向英美求援。而美国也早已认为日本的南进威胁到了自身在远东的利益，但又希望日本的侵略矛头能转向苏联；而日本在当时也未放弃北进的计划，并考虑能在尽可能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获得南方的资源，这两点成为日美能在今后得以进行长达一年的交涉的基础。

在日美谈判进行中时，处于日本南进矛头指向的英、荷、澳感受到了危机，并在1941年2月22日由英国远东军总司令波法姆空军上将于新加坡召开三国协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室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565页。

^②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三卷 太平洋战争前期），金峰等译，第130页。

^③同上，第131页。

防远东会议，讨论了与日本开战的条件等相关事宜，其中值得注意的一项条款是将日本进攻菲律宾也视作开战条件之一。很显然这同1月29日开始的华盛顿英美参谋会议有密切关系，截止3月29日，两国代表共召开14次会议，最后提出被称为“ABC——1”的美英参谋协定报告。依据该报告，两国决定先全力对付主要敌人德国，而在远东采取战略守势，并由美国削弱日本经济力量，使日本不再威胁马来半岛和新加坡。^①之后英、美、荷三国在远东的驻军代表又于4月21日至26日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形成了“ADB协定”这一对日联合战略。相比于本国政客们的消极态度，前线的将士们对于日本与日俱增的威胁感受得更为明显，希望借此协定提出联合应对日本入侵的建议。然而美国政府在7月3日以该方案过于强调英国在新加坡的利益为由拒绝同意这一协定。但局势的发展却很快令美国人转变了态度。

日本方面，在调停了泰国和法属印支之间的纠纷后，于1941年5月6日同后者签署了经济协定。但在1941年1月开始的，继小林和向井被任命为特使的芳泽谦吉同荷印当局的谈判却一直迟滞不前。1月16日，驻荷印的石泽总领事向当局递交了一份提案，希望能放宽对日本人的入境限制，扩大日本人在荷印的企业经营并确保对日的石油、橡胶和锡等战略资源的供应。但是荷兰人担心会被纳入日本的“共荣圈”内，因此迟迟未做答复。于是在二月间，日本将谈判范围缩小的经济问题上，并于5月14日由芳泽使节提出第二次提案，但在6月6日遭荷印当局拒绝，双方的谈判在6月18日发表了一个外交辞令式的联合公报后彻底破裂。这样日本人通过外交手段从荷属东印度获取充足战略资源的期望就彻底落空了，荷兰当局的这一做法恐怕是出于一些物资尤其是橡胶会经日本转手到敌国德国手中这一担心。^②与此同时日本人在其他地区获取资源的努力也受到了阻力。由于1939年朝鲜粮食歉收，日本必须从法属印支、泰国和缅甸进口大米。但是法属印支当局对于履行同日本的经济协议态度消极，将6月份原定10万吨的对日粮食出口量减半到5万吨，待日方同意后又进一步提出7、8月份的出口量再减少一半，日本认为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可能是由于美英和法国戴高乐派及当地华侨的策动。除了粮食之外，橡胶和锰等战略物资也预计会越来越难以获取。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室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599-604页。

^②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卷》，鱗書房、1953年、133頁。

而泰国也已在上年年末被英国订购了 60 万吨运往新加坡的大米，因此也难以维持对日本的出口量。而英国也在 5 月 16 日禁止马来亚向日本及其经济圈内出口橡胶。^①

以上的种种迹象使日本当局确信，一张由美、英、中、荷四国组成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包围网已经在面前拉开，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准确，在这种外部环境的刺激下，再加上国内物资的紧张（1941 年 4 月开始实施《生活必需物资统制令》，4 月 1 日起使用购粮本，5 月起对木炭和酒实行配给），^②日本政府和军部若想将同中国的战争进行下去，并维持自身在东亚的霸权地位，用武力向南方进军甚至不惜同英美一战也就成了昭和军阀的唯一选择。特别是在 7 月 23 日逼迫法属印支签订共同防卫协定，29 日开始进驻法属印支南部后，美国迅速对这一直接威胁到新加坡的行为做出了强硬的回应，在 8 月 1 日宣布禁止除棉花和粮食以外包括石油在内的一切物资对日出口，并冻结日本在美资产，而英国和荷兰也在其后仿效。^③这样一来，等同于日本同日元经济区以外地区的贸易彻底断绝，这对于燃料基本仰仗进口的日本海军来说，不啻为宣判了缓期执行的死刑，按照每天消耗一万两千吨燃油计算，不出两年海军就会完全瘫痪。在政府方面试图寻求外交解决途径时，大本营陆、海军部已就开战达成了一致。随后在 9 月 6 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适应局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计划在十月下旬完成战争准备。

此后在对美交涉陷入胶着之时，陆海军各自开始了紧张的战备工作，并在 10 月 12 日于首相别墅萩外庄召开的五相会议上逼迫首相立即作出和战决定，但近卫仍坚持不放弃外交途径的解决办法。^④结果到了之前规定的开战时限的 10 月 14 日，在这一天的内阁会议上双方的分歧仍未得到解决，于是第三届近卫内阁在两天后宣布总辞职，并由东条英机陆军大臣组阁。东条内阁在 11 月 5 日的御前会议上又讨论了《帝国国策贯彻纲要》，最后决定发起武装进攻的时间为 12 月初，并强调若对美交涉在 12 月 1 日零时前获得成功，则立即取消使用武力。^⑤但其后的历史发展并没有给日本取消使用武力的理由。对于同日本开战已做好心

^①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戦争全史第 1 卷』、133 頁。

^②中村隆英编：《日本经济史 7：“计划化”和“民主化”》，第 95 页。

^③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三卷 太平洋战争前期），第 143 页。

^④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戦争全史第 1 卷』、198 頁。

^⑤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三卷 太平洋战争前期），第 153 页。

理准备的美国在 11 月 26 日向来栖和野村两位日本大使递交了措辞强硬的《赫尔备忘录》，里面的内容一言以蔽之，等同于抹杀掉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所有扩张成果，这是日本政府和军方所万万不能接受的，这也意味着 11 月 5 日以来的所有交涉已经完全失败。

事已至此，开战已不可避免，而军部实际上比政府更早地放弃了对谈判的希望。在 26 日当天赫尔将备忘录交给日方时，海军由 6 艘航母为主力编成的南云机动部队已从千岛群岛的单冠湾启程开赴夏威夷。而陆军方面，早在 11 月 15 日大本营陆军部就对南方军下达了关于攻占南方重要地区的命令，其后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向所属各部队传达了这一命令，并分配了开战时具体的作战任务。终于，在 1941 年 12 月 1 日下午 4 时的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终于做出了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定，并将开战之日基本定于 12 月 8 日。在这短暂却又漫长的 7 天中，虽然发生了携开战机密文件的杉坂共之少佐飞机失事事件以及进驻泰国时銮披汶总理失踪事件等突发情况，但并未给日军的行动造成影响。

最后，决定命运的 12 月 8 日如期而至。凌晨 2 时 15 分，山下奉文指挥的 25 军下属的佗美浩少将的先遣部队在马来亚的哥打巴鲁成功登陆，比南云机动部队的攻击机群在珍珠港上空投下第一颗炸弹（3 时 22 分）还要早一个小时。而在稍晚些的 4 时 12 分，25 军另一路由第 5 师团先头部队组成的攻击波也在泰国的宋卡和北大年一带的海岸登陆，且未遇泰军激烈抵抗。至午时日泰两国达成谅解，日军得以顺利借道泰国进攻马来亚和缅甸。而在 11 时 40 分，东京方面公布了天皇的宣战诏书，持续 3 年零 8 个月的被称作太平洋战争或是“大东亚战争”的血腥冲突就此拉开帷幕。菲律宾方面，海军台南航空队的 197 架陆攻机和战斗机于 12 时 30 分飞临克拉克和伊巴机场上空，一举摧毁 125 架美军飞机，而在 10 日，第 11 航空舰队再度出动 140 架飞机攻击马尼拉周围航空及海军基地，击落击毁 100 架敌机。^①经此两役，菲律宾制空权已彻底落入日军手中，再加上美太平洋舰队此时已陷入瘫痪状态，而英国远东舰队的两艘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及“却敌号”在 10 日的马来海海战中被海军第 22 航空战队下属的 88 架轰炸机击沉。来自空中和海上的威胁均被消除后，本间雅晴的 14 军主力得以在 22 日夜在菲律宾仁牙因湾登陆。登上马来亚和菲律宾的两股日军为实现早日会师东印度群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室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0~16 页。

岛的目标而发起猛烈的进攻。日后被称作“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将军发起了东方式的“闪电战”，只是他的“装甲部队”与其说是一些装甲薄弱只拥有一门37毫米火炮的95式轻战车（但仍对英军的装甲车形成压倒性优势），不如说是给予步兵更多载重量和机动性的自行车，不过英国人在撤退时所遗弃的大量卡车和燃油倒成全了日本人加快进攻速度的愿望。^①虽然英国人在马来亚拥有13万军队，但他们缺乏坦克、火炮等重型武器，并缺乏训练与战意，且丢失了制空权，因此难以应对日军穿插于丛林中的钳形攻势。经过了50余天的狂飙激进后，马来之虎终于兵临新加坡城下，并于8天后从马来亚陆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Percival）和他手下7万多名已疲惫不堪的将士那里攫取了这颗大英帝国在远东的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而在菲律宾，本间雅晴中将军的军队虽然没有推进地如此迅速，但仍于1942年新年的第二天攻陷了马尼拉，并将麦克阿瑟的美菲联军压缩到了巴丹半岛，但这些战士即使在主将已逃往澳大利亚的情况下仍拼死抵抗，而当地险峻的地势与茂密的丛林也削弱了补给不足的日军的进攻势头，导致这一地区有组织的抵抗要到4月9日才结束。除了马来亚和菲律宾之外，日军下一个必须确保的关键战略据点便是缅甸，这不仅是为切断援助重庆政府的通道，更可以促进印度脱离英国。^②因此在马来亚方向激战正酣之际，饭田祥二郎中将军的15军下属的33师团和55师团等部队已越过泰缅边境，兵锋直指萨尔温江。而新加坡之战结束后，18师团和56师团被调往缅甸，战力得到充实的日军于3月8日占领仰光，并在之后的曼德勒会战中重创英军和增援的中国远征军。至5月底日军控制缅甸全境，切断了滇缅公路，并陈兵怒江和印度边境。日军的另一大目标是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和橡胶。在15军侵入缅甸的同一天，南方军司令部向今村均中将军的16军下达了攻占爪哇的命令。在此之前，南方军直属的川口支队已于去年年底之前攻占了婆罗洲北部，占领了美里、斯里亚和古晋的港口及附近的油田。而东婆罗洲、苏拉威西、帝汶岛和巴厘岛等地的港口和机场也在1942年1至2月间落入日军之手。日本的空降兵又于2月14日突袭了苏门答腊南部的巨港，并协助38师团在3天后确保了当地的油田设施。这样日军就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对爪哇岛形成了合围之势。2月27日，在陆军第3飞行集团和海军第22航空战队夺取了制空权

^①Bill Yenne,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The Invincible Years, 1941-42*, Osprey Publishing, 2014, p.108.

^②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卷》鳞书房、1953年、88页。

之后，高桥伊望中将所率领的第3舰队在泗水附近海域击破荷、美、英、澳四国联合舰队，从而夺取了爪哇海制海权，16军下属4个师团的部队得以在爪哇展开全面登陆。至3月9日，爪哇全境陷落。

至此，东南亚全境（除了巴丹和科雷吉多尔等少数据点外）落入日本帝国的掌控之中，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也暂时宣告结束，“大东亚共荣圈”至少从表面上看成为了现实。关于日军侵略扩张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则众说纷纭，在此不作赘述。^①而本文所关注的地方在于日本的军事胜利是否也意味着其意识形态上的胜利，换言之，日本自明治以来对外侵略扩张中所逐渐衍生出来的亚细亚主义及其最终产物“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意识形态上的宣传是否也对其军事侵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西方国家以及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在这一互动中又扮演了何种角色，这将是本章接下来所要着重阐释的地方。

第二节：建构“大东亚共荣圈”

尽管“大东亚共荣圈”一词的正式出现是在1940年8月1日时任外相松冈洋右有关日本政府对外方针的讲话里（“……作为我国现行的外交方针，其目的在于本着这一皇道大精神首先确立以日满支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②），并且也体现在第2次近卫内阁于7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的《基本国策纲要》中（“以八纮为一宇之肇国之基本精神”，“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有力结合为根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③），而日本也确实从这时开始走上武力南进，挑战列强在东南亚的殖民秩序的道路，但究其根源，“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渊源同样可追溯至德川幕府构建自身所主导的翻版“华夷秩序”的时期。随后经过时间的演变，到了近代，这种思潮逐渐催生出亚细亚主义这一变体。

幕末时期，由于有以武力迫使日本开国的西方列强这一客体的存在，使得日本认识到了在“西洋”威胁下即将朝不保夕的“东洋”的存在，并认为有必要将

^①关于日本胜利原因的分析可参阅道格拉斯·福特：《太平洋战争》，刘建波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60-65页。

^②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81页。

^③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 走向大东亚战争的道路），周启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370页。

亚洲团结起来以应对西方的入侵。即使是前文所提到的主张向大陆方向扩张的佐藤信渊，也在1849年的《存华挫狄论》主张“日中提携”，^①足见当时应对西方入侵的紧迫性超过了对对外扩张的需求。明治维新之后的1878年，随着旧武士阶层发动的西南战争以政府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日本政局逐渐稳定，一些民间的有识之士也开始考虑将亚洲联合对抗西方一事付诸实施。在这一年成立的“振亚社”尽管现在鲜为人知，但却是近代日本有据可查的第一个亚细亚主义民间团体。但这一民间团体也有来自政府官员的参与，如时任内务卿的大久保利通和清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等。而在大久保遇刺之后，这一团体也就让位于1880年所成立的“兴亚会”，而对这两个团体的创建居功甚伟的海军军官曾根俊虎也积极在中日两国官员间进行游说，希望两国能相互提携并带动其他亚洲国家进行联合。只是彼时的中日政府正围绕琉球、台湾和朝鲜等地区进行外交博弈，政府处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与兴亚者们的理想主义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而在1891年成立的“东邦协会”的宗旨则已经在亚细亚连带理论中掺杂进了国家主义思想，这种趋势随着甲午战争的结束愈发明显，其标志为1898年6月“东亚同文会”的成立，这一团体是当时的大隈重信内阁试图将亚细亚主义运动纳入政府管控的产物，因此注定会同日本政府的政策需要进行妥协。尽管如此，同文会仍然为中国的教育、调查研究及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尽管有时其动机可能并不那么纯粹。^②

进入20世纪，亚细亚主义随着冈仓天心在1902年完成的《东洋的理想》而正式形成。冈仓从文明论的高度对所谓东方文明的特点加以定位，从而从侧面强调了亚洲的整体性，而建立这种认同正是亚细亚主义得以形成的基础。同样，冈仓的理想与日本政府的现实主义政策格格不入，或许正因如此，他在1904年写就的《日本的觉醒》一书中则开始拥护日本政府的扩张政策。而且他在《东洋的理想》中还将日本置于“东方文明的博物馆”这一可以反映亚洲全貌的特殊地位，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民族主义，这反映了亚细亚主义诞生之初便蕴含的内在矛盾。而这一“日本特殊论”也顺理成章地衍生出了“日本盟主论”，并被日后的军国主义者所利用作为战争动员的口号，这无论对冈仓，还是对其他亚细亚主义者来说都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悲剧。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由于中国的进一步衰

^①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54页。

^②同上，第56~75页。

退乃至面临被瓜分的危机，而日本的实力则正朝着列强迈进，因此也就不再主张“日中提携”，而是开始鼓吹“支那保全”以及“日本盟主”了，可以说从中日实力开始转换的这一刻起，理想的亚细亚主义便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同现实利益紧密挂钩的实用的亚细亚主义了。在其后亚细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还出现了宫崎滔天这样的有着古代侠士之风的理想主义者，但舞台的主角已经变成内田良平和头山满这样带有功利目的的国粹主义者了。在“黑龙会”的纲领中，可以看到一大批条理清晰的涵盖内政、外交、国防、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政治主张，可以说已超越了普通民间团体的范畴，令人不得不怀疑其背后是否存在着官方背景。而黑龙会也在日后通过为日本的扩张活动添砖加瓦中不断印证着这一猜测。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犬养毅遇刺和日本政党政治的终结，大亚细亚主义与大日本主义、军国主义实现了杂糅，并同军部在大陆和南方的扩张政策融为了一体。尽管这一时期在大川周明的“复兴亚细亚”构想、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昭和研究会“东亚协同体论”及蜡山政道的“区域主义”理论当中可觅得部分理想的亚细亚主义与区域联合的主张，但已无法改变亚细亚主义业已成为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外扩张工具这一现实。

从现在的角度看，尽管亚细亚或者大亚细亚主义从未见诸于日本政府正式的官方文件中，但是其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口号而被有选择的使用。当日本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式扩张得手之际，亚细亚主义便被束之高阁；而当这种扩张遇到西方列强的阻碍时，亚细亚主义便被搬出来用于合理化其侵略行为。^①这种现象在日本退出国联以及中日战争爆发表现得愈发明显。在1938年11月3日发布的“第2次近卫声明”中，日本政府提出了“东亚新秩序”这一口号，希望能借此达到解决日中冲突的目的。而日本的知识界也纷纷著书立说，希望能为这一口号提供更具体的理论支持。然而这种所谓的“新秩序”仍然是在保全日本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和基础上，实现由日本所主导的东亚联合，本质上类似于日本版的“门罗主义”。而在中国顽强抵抗的情况下，日本为早日摆脱泥潭，不得不考虑从南方打开突破口，而为了给武力南进披上合法化的外衣，第2次近卫内阁才在《基本国策纲要》中将“新秩序”的范围由原先的“日、满、华”拓展至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大东亚”。

^①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270页。

如果说这时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还不甚明朗的话，那么到了1940年9月，在讨论德、意、日三国同盟问题的四相会议和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就界定了共荣圈的具体范围：“在同德、意谈判时中，应作为皇国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生存圈而加以考虑的范围是，以日、满、华为主体，包括现在委任日本统治的原德国所属诸岛、法属印度支那及法属太平洋岛屿、泰国、英属马来亚、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缅甸以及印度地区……。”^①很明显，这是日本效仿纳粹的“生存空间”理论所建构出的“生存圈”概念。而到了“大东亚战争”开始后的1943年，对于共荣圈的范围有了更明确的划分，甚至出现了由官方编写的普及读物，如大阪南方院编写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常识》一书中就有如下描述：“……今日纳入我方的势力范围作为共荣圈而被眺望的地区大体上为从北面北满的黑龙江沿岸的漠河县（北纬五十三度半），到南面东印度帝汶岛西南海上的罗地岛（南纬十一度）这大约七千五百公里，以及东起我方南洋群岛东端（东经一百七十二度），西至缅甸的孟加拉湾和印缅国境（东经九十二度）这大约八千八百公里的连绵不绝的广大地区。”^②

而在这一年的5月31日，东条内阁又在御前会议上呈出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确立了年内在东南亚实现缅甸和菲律宾的“独立”并加强其他地区民众的政治参与以笼络人心的方针。^③在同一年的11月5日于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则成为了宣传“大亚细亚主义”的盛宴，会上云集了日本在东亚及东南亚的合作者们（包括代表南京汪伪政权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满洲国”总理张景惠、泰国代总理旺·威泰耶康·瓦拉旺亲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首领钱德拉·鲍斯、菲律宾第二共和国总统何塞·帕西亚诺·劳威尔、缅甸国总理巴莫），他们纷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以向日本输诚。各代表在会后联合发表了《大东亚宣言》，在诸如“协同确保大东亚的安定并建设基于道义的共存共荣秩序”，“互相尊重各国的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各民族的创造性”，“在互惠的前提下紧密提携发展经济增进大东亚繁荣”，“废除人种差别增进文化交流”等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中，恐怕只有“开放资源为进军世界作贡献”^④这句话才道出了共荣圈的实质。

^①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第1巻』、61~62頁。

^②大阪南方院『大東亜共栄圏の常識』大阪南方院、1943年、5頁。

^③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第2巻』、370~371頁。

^④情報局記者会『大東亜共同宣言』新紀元社、1944年、3頁。

事实上松冈在构建共荣圈理论的开始就陷入了一种矛盾：一方面日本为了打破西方列强的经济封锁必须建立由自己主导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圈，特别是在美、英、荷等国对日进行战略物资禁运之后，以武力来掠夺资源便成了日本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又要把亚洲从殖民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要接受日本的“领导”。^①这样一边“解放”又要一边“掠夺”或许本身就证明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虚妄性，其无非是将殖民统治权由西方列强手中抢夺过来而非完全交还给当地民众。

而同盟国方面在战争期间也一直在研究着“大东亚共荣圈”这一对手提出的政治主张。如在1943年9月发行的《太平洋事务》上就刊登了一篇题为《日本的共荣圈》的文章。由于当时战争的发展态势尚不明了，所以该文仅对“共荣圈”的内容和实质做了有限的解读，并认为“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是日本人这一体系上的一个明显的弱点”，而为了维持这一体系，日本人依靠的是那些“保守势力：地主、苏丹、祭司和当地人官僚们被吸收为盟友；古老的习俗得以复兴，告密行为大行其道，盲目的爱国主义被极力推崇”，但对于东南亚的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一体系却并未带给他们多少好处，“他们的经济地位日趋低下，并开始越来越倾向接受盟军的宣传，尤其是这种宣传会许诺给他们带来比前宗主国回归更有利的结果时”。^②

而在日本行将战败的1945年8月10日，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下属的研究分析部（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秘密发布了一份关于“共荣圈”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日本的军事失败注定了共荣圈体系的破产，而该体系的“效率也一直受到理想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支持者之间目标的潜在分歧的掣肘”，然而，“如果日本人已经将大东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完全地整合起来，并且如果亚洲人民不能在战后安排上获取安全和稳定的话，那么在将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种类似的泛亚主义计划”，这无疑是一种对于西方对亚洲战后局势失控的担心。而在报告的最后，研究者总结了大东亚共荣圈失败的原因，一个最明显的原因是“在进行一场艰苦的世界规模的战争的同时试图建立泛亚主义的理念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出于军事安全的需要他们不会允许当地人实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对军事必需物资的需要阻止了任何经济上的真正互

^①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286页。

^②A. J. Grajdanzev, "Japan's Co-Prosperity Sphere", *Pacific Affairs*, Vol. 16, No. 3 (Sep., 1943), pp. 311-328.

惠；军事态势的紧迫性干扰他们试图与当地入建立文化纽带的尝试”。而另一项或许同样重要的原因是统治层“缺乏一种协调一致的动机”，“军队的领导者们决定透支泛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换取唾手可得的现实利益”，而海外的日本商人也无视文官政府所呼吁的“在同当地人接触时保持谨慎的要求，而仅仅将共荣圈视为进行经济掠夺的机会”，同时派往当地的行政官员也罔顾所受到的教诲而经常表现出“一种轻视当地人的态度”，而“日本军人甚至是更糟糕的冒犯者……”，以上这些“不端行为部分或许源自于普通的日本人在实施必要的笼络手段上的无能”。但研究者同时也在报告末尾对共荣圈做了一定程度的“积极”评价，他们认为这一体系中的各成员无论日本战败与否，都会被承诺在战后被确保独立、安全和经济上的稳定，尽管“那些被战时日本人的统治引发出抵抗情绪的当地人现在对这些承诺或许存在怀疑和抵制”的态度，但如果在未来的某些时候这些承诺无法在战后的世界安排中得到兑现的话，他们或许仍会向日本人寻求帮助”，“无论日本人是否会试图建立另一个大东亚共荣圈，泛亚主义的理想，一个‘亚洲人的亚洲’毫无疑问会对亚洲的人民产生强大的吸引力”。^①

然而随着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解放亚洲”的欺骗性宣传最终只能化为历史的余烬。但尽管如此，此时大部分的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在目睹了西方殖民者被日本人驱逐时的狼狈状态并亲身感受了后者较之前者更为残酷的统治之后，应该已不会再接受任何来自外部的控制了。

第三节：《大西洋宪章》的冲击

作为日本对手的同盟国方面，也一直为自身的行动寻找着道义上的制高点。除却一直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奋战不已的中国所发表的一些檄文之外，美英两国在 1941 年 8 月 14 日于纽芬兰的普拉森舍湾（Placentia Bay）举行的大西洋会议上联合发表的《大西洋宪章》可以视作西方在关键时期针对轴心国集团扩张的回应以及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初步安排。

在这份不长的文件中，罗斯福和丘吉尔义正辞严地对于轴心国的此前的扩张

^①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10 August 1945, Current Intelligence Study Number 35,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0710366.pdf, 2017 年 5 月 22 日。

行为加以鞭笞，其中的第二条（“不希望看见发生任何与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不相符合的领土变更”）、第三条（“他们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他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以及第四条（“努力促使所有国家，不分大小，战胜者或战败者，都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为了实现它们经济的繁荣，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世界的原料”）^①或许是对之前德国在欧陆的扩张与日本武力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所做出的一种直接的强硬姿态。对此同盟国内部各成员和苏联都表示了理所应当的欢迎。在丘吉尔返回英国之后的9月24日，9个被纳粹占领的欧洲流亡政府（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以及自由法国领导者戴高乐将军的代表）与苏联政府的代表齐聚伦敦，商讨加入这一宣言的事宜。会上苏联驻英大使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y）也发表了“真诚”的演讲：“……苏联捍卫每个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它们建立自己的社会秩序和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只要这种选择被认为能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和文化的繁荣……。”^②当然考虑到斯大林之前对波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罗马尼亚等国的做法，并从以后东欧和远东的历史发展来看，苏联代表的此番发言更像是逢场作戏，不过作为在1941年夏秋时节正承受着400余万轴心国军队猛攻（特别是刚刚在基辅包围圈中损失掉了70余万军队并即将在10月迎来进攻莫斯科的“台风”）的苏联来说，在此刻为从西方盟国处获取更多援助而在表面上做出曲意逢迎的姿态也无可厚非。

况且，在西方尤其是美英两国政府之间，对于这一宣言的适用范围在认识上也并非达成了一致。在丘吉尔眼里，遏制轴心国对于既存世界秩序的挑战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因此使大英帝国的殖民利益受到损失。基于这点考虑，他最终说服罗斯福同意宪章中的第三条将不适用于非洲和亚洲。然而据当时罗斯福的演讲稿撰写人罗伯特·E·舍伍德（Robert E. Sherwood）记录道：“在不久的将来，印度、缅甸、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人们就会开始质问是否会将《大西洋宪章》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亚洲和太平洋的全部地区。”^③但是丘吉尔在1941年9月对下院

^①Atlantic Charter (1), The National Archives Catalog | National Archives, <https://catalog.archives.gov/id/16608691>, 2017年3月30日。

^②Inter-Allied Council Statement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Atlantic Charter : September 24, 1941, <http://avalon.law.yale.edu/wwii/interall.asp>, 2017年3月30日。

^③Elizabeth Borgwardt, *A new deal for the world: America's vision for human righ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9.

的一场演讲中还是坚持宪章只是适用于被纳粹占领的地区而不是那些“效忠于英国王权的人们所在的地区”。^①然而从1944年10月9日他与斯大林在莫斯科划分了双方在东欧和巴尔干的势力范围这一举动来看，他也并非完全信守了当初的承诺。而丘吉尔一名忠实的追随者，同时也是内阁成员和报业大王的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在宣言发布之后的头几个月更是直言不讳地声称《大西洋宪章》对于不列颠和苏联的安全都是一种“威胁”。^②而同样作为宣言发起者的美国显然对于丘吉尔这种传统的帝国主义行径心怀不满，毕竟其坚称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地区和民族自决的权利，^③但迫于战争的需要，罗斯福只能将解决殖民地自决问题的时间推迟到战后，而对于苏联控制巴尔干的意图，美国人只能口头表示反对而不愿在斯大林正同希特勒血战之时施加更有实际意义的压力。^④

而盛兴于一战时期的民族自决权作为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理论其本身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无论是列宁还是威尔逊所提出的类似主张，其对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都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境地。如倡导民族自决的列宁却“不愿意让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左翼政府脱离自己的控制而独立”，而威尔逊在获得独立的波兰却不允许乌克兰独立时“不顾自己的主张站在了波兰一边，没有考虑乌克兰的意愿”，而贝奈斯也“不接受威尔逊提出的让苏台德地区进行民族自决的建议，而是镇压了当地的独立运动，使苏台德地区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⑤而且，对于原本就实施过帝国主义行径的西方国家和苏联来说，现在再来大谈尊重当地民族意愿其本身就已经丧失了理论的正当性。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种的缺陷，使得他们的对手日本抓住机会展开了宣传上的反击。比如朝日新闻社就在1943年的两辑《朝日东亚年报》上，都专门用一段文字来论述和评价《大西洋宪章》。在第1辑年报（副标题为“世界战局的展望”）“美国的世界政策”这一节，作者在开篇就展开了对《宪章》的讨论，并认为

^①Neta C. Crawford, *Argument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Ethics, Decolonization, 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97.

^②William Roger Louis, *More adventures with Britannia: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Britain*, London: I.B.Tauris, 1998, p.224.

^③William Roger Louis, “American Anti-Coloni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 Vol. 61, No.3 (Summer, 1985), pp. 395-420.

^④William Roger Louis, *More adventures with Britannia: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Britain*, p.224.

^⑤刘显忠：《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在苏联的实践》，《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4期。

英美为“避免重蹈一次大战威尔逊的十四点声明的覆辙而对宣言的形式进行了深思熟虑，但仍不免过于抽象而缺乏具体的操作性”。而且宣言中“所贯彻的思想直言不讳地说，便是保持美英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这一理想论，使得除盎格鲁撒克逊人能支配这个世界外便再无其他实质性的内容”。文中还认为“相比于英国最初将宣言的适用重心放在欧洲，美国从一开始就对推广这一宣言展现出极大的积极性，显示出美国寄托在此之上的称霸世界的野心”。^①而在第2辑年报（副标题为“新支那经济的基本动向”）中，更是直接将对《宪章》的讨论置于对美英对立分析的章节中，认为“两国的纷争……反映了两国在战争目的上的根本对立”，“两国在这场大战中的协力关系只是为了妨碍轴心国的新秩序建设”。而对于美英对战后进行规划行为的评价，日本人还搬出了苏联作为旁证：“苏联也不禁冷笑了一番，并认为在自己如何赢得眼前的战争这一先决问题尚未解决之时，美英就在其他地方热衷于讨论战后的问题是非常愚蠢的行为。”而在最后，文章主张“美英恢复腐朽世界秩序的意图以及努力，是与世界史发展的基本方向相矛盾的”。^②

除去这些明显属于官方团体的富有欺骗性的宣传辞令之外，一些个人（同样具有官方背景）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德富苏峰（大日本国史会会长）在1944年写就的《必胜国民读本》中专门抽出了一章对《大西洋宪章》的条款进行了逐一解剖，尤其是针对第二条和第三条。德富认为第二条无异于美英在“自身已经做出擅自夺取他国领土这一强盗行径，还要让他国闭嘴”，“是在自由意志之名下行擅自分割处置之实”，而针对第三条他又拿出印度举例，认为如果此言不虚，那么“为何要用军队镇压三亿五千万热诚地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印度人民呢”？最后他还是拿苏联来论证这一宣言的不切实际：“比如苏联就不会服从这一安排，如果回到战前的国际秩序，那么波兰就会复国……为了避免出现对苏联不利的状态，其必定会横生阻拦，也会导致《大西洋宪章》难以贯彻执行……”^③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如前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下村宏^④以及前陆军中将铃

^①朝日新聞社中央調査会 編『朝日東亞年報.昭和18年 第1輯 世界戦局の展望』朝日新聞社、1943年、133頁。

^②朝日新聞社中央調査会 編『朝日東亞年報.昭和18年 第2輯 新支那經濟の基本動向』朝日新聞社、1943年、166頁。

^③蘇峰德富猪一郎『必勝國民読本』毎日新聞社、1944年、73~79頁。

^④参閱下村宏『決戦期の日本』朝日新聞社、1944年、52~54頁。

木一马^①等）也纷纷对《宪章》的内容大加批判，但其观点大多同官方保持一致，不排除其中有战时出版审查及管制的作用。反而在战后，出现了相对肯定的声音（如从美国归来的学者大山郁夫^②等），个中缘由则不言自明。

总之，从《大西洋宪章》的发布到美国参战仅相隔几个月的这一事实不难看出这份宣言具有远超字面的意义。同“大东亚共荣圈”一样，《宪章》所蕴含的历史渊源同样悠久，远非临时起意。尽管在落实阶段由于一些现实利益的影响，一些条款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但并不能就此全盘否定其在规划战后格局、消解殖民观念和构建集体安全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在同“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所拥有的类似“民族自决”主张的条款进行对比时，可以发现虽然可能只具有政治宣传的意义，但对东南亚当地人来说，相比于西方人区别对待和模棱两可的态度，日本人在当时明确地指出要实现“去殖民化”的这一主张无疑要更具吸引力（尽管东南亚当地民族主义势力可能识破了这一诡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利用日本的这种宣传）。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当时任缅甸总理吴素于1941年10月前往伦敦向丘吉尔提出将《宪章》的原则应用于缅甸但遭到丘吉尔毫不客气的拒绝后，对宗主国的失望之情以及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辉煌胜利的惊讶终于使得他决定转而同日本人合作。在返程途中的12月29日吴素于里斯本秘密会见了日本驻葡萄牙大使，并同意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建立“自由缅甸政府”。只是这一情报在次年1月7日被美国海军部通报给了丘吉尔。1月12日，吴素在巴勒斯坦被英军拘禁，并被送往英属乌干达囚禁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③

第四节：民族主义者的反应

由于日本同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在战时的互动过程是下一章的主要论述内容，因此在本章的最后一节只从总体上对二战爆发以后到太平洋战争初期这段时间民族主义者们活动进行粗略的阐述，并着重从观念的角度对日本及西方盟国给民族主义运动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

^①参阅鈴木一馬『銃後の米英撃滅戦』新編社、1944年、108~114頁。

^②大山郁夫『日本の進路』労働文化社、1948年、119~128頁。

^③贺圣达：《缅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7~408页。

在二战爆发之后，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宗主国受欧洲战事所累，不得已将大量资源和精力用于优先确保本国的安全（而对于那些在战争初期就已沦陷且政府流亡海外或是成立合作政权的国家，则更是处于自顾不暇的境地），因此对殖民地的“管理”（即对民族主义运动的镇压）有所松动，甚至会给予民族主义上层精英一定程度的让步以换取支持；另一方面，日本为了减少将来南方作战时面临的阻力，也会同民族主义者暗通款曲，希望通过利益交换得到会给予协助的保证。在这种局面之下，民族主义者可以说占据了一种相对主动的地位，并可依据情势的演变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而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与日本互动最为频繁的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者为缅甸的德钦党人。1935年宪法颁布后所成立的新政府并未给缅甸民众带来多少独立的实感：总督可以绕过下议院和上议院进行立法，并可在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刻中断选举机关的工作，而在正常情况下的国防、外交、司法、财政海关和宗教事务也属于总督专职的范围，更遑论少数民族（掸族、钦族、克钦族等）聚居的“特区”（土地面积占全国的43%，人口占14%）仍由总督直接管辖。^①由于在政治上仍受到英国当局的掌控，因此缅甸的经济便理所当然地置于英国公司的控制之下，由此造成的经济压迫进一步激化了缅甸人的不满情绪。

这种情绪集中爆发于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期间展开的反英运动中。这场以缅甸历法计算被称作“1300年大暴动”的群体性运动肇始于中部油田地区的英缅石油公司（BOC）罔顾下属工人改善待遇的要求，最后酿成了一场有德钦党人所鼓动的青年及学生参与的大规模游行，而各地的农民也趁机提出了减免地租的要求。该运动虽然最终以受到英国当局镇压而告终，被捕者超过2000人，死者31人，但却被作为独立斗争的先驱而被铭记于史册。^②以此运动为契机，德钦党人内部的“武装必然论”势力开始壮大，因为对英国的渐进式扩大自治路线的不信任，以及对当时的巴莫政府的消极政策不满，德钦党开始考虑接纳左翼的武装斗争路线。1939年8月15日，德钦党内部的共产主义小组在仰光成立。1940年5月在礁拉瓦底举行的活动人员会议上决定开始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只是当时依靠德钦党秘密组建的私人军队来对抗强大的殖民地军事机器显然是不可能

^①B·Φ·瓦西里耶夫：《缅甸史纲》，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历史研究室、外语系编译组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330页。

^②田边寿夫：《日本军政下缅甸左翼的活动》，司韦译，南洋资料译丛，2007年第1期。

的，因此多数德钦党人（除以德钦梭和德钦丹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开始主张借助外国的力量来达成推翻英国统治的目的。而在这时日本人适时地出现了。

后来成为日军“南机关”机关长的铃木敬司大佐在被免去参谋本部船舶科长一职后于1940年6-7月间从泰国的曼谷化名为叫“南益世”的“读卖新闻记者”进入仰光设置事务所并试图同独立运动领导人建立联系。9月下旬，他从日缅协会会长登貌博士那里得知了昂山等人为躲避当局的抓捕逃往中国寻求援助的情况，并采取了相关措施。这样在1940年11月12日，昂山和兰扬两名志士从中国的厦门被带到了东京，从此与日本军方建立了联系。而大本营方面也在1941年2月正式设立了直属机构“南机关”来进行对缅甸独立运动的扶持工作，此时参谋本部正忙于对法属印度支那的进驻工作而未形成对缅甸具体的作战计划，因此也就接受了铃木大佐利用缅甸民族主义者来切断援蒋路线的方案。^①随后在3月昂山与南机关的杉井满秘密潜回缅甸召集了一批日后被称为“三十壮士”（Yebaw Thongyeik）的德钦党人，并将他们带到日军占领下的海南岛进行军事训练以应对可能到来的缅甸作战。

在这段时期，南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铃木机关长不断灌输“大亚细亚主义”的情况下逐渐将缅甸的独立视作己任，更认为其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在这种“自负”的驱使下他们同缅甸的民族主义者共同生活训练，对他们的民族独立热情产生了共鸣。^②对此感同身受的昂山等人也渐渐认同了日本“亚洲共荣”的主张，并增强了对日本人的忠诚，因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对协助日军在缅甸的作战行动而显得格外卖力，这其中固然有其一直以来抱有的独立愿望之使然，但也不可否认其在海南岛接受日军训练这一时期所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除了昂山这一支民族主义力量之外，缅甸的其他政治派别也有同日本人接触的举动。如登貌博士就在1939年底以经济观光的名义前往日本考察，他在1940年1月回国之后，便开始大力宣传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主张了。而他在“贫民党”内的同事巴莫博士则直接在1940年夏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主张缅甸为了获取自由应不惧怕任何外国侵略，甚至可以同日本人联盟。^③或许这种亲日的倾向部分导致

^①斋藤照子：《二战期间日军对缅工作机构——南机关再考》，司韦译，南洋资料译丛，2009年第2期。

^②同上。

^③B·Φ·瓦西里耶夫：《缅甸史纲》，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历史研究室，第454-455页。

了他们在 1940 年 6 月-8 月间同“缅甸自由联盟”的其他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入狱。

除缅甸之外，法属印度支那（以下简称法印）的民族主义势力也在战前同日军方面建立了联系。早在 1939 年，流亡海外的越南阮氏宗室彊祗就在黑龙会的协助下在上海成立了“越南复国同盟会”，随后该组织依靠日本协助在中越边境地带组建了一支被称作“越南复国同盟军”的武装。同盟军的指挥官陈中立将军计划在 1940 年 9 月日军进驻法印之时抓住机会越过国境直取河内，一鼓作气达成独立。^⑨9 月 23 日，随着日军在进驻过程中同维希法国的军队发生冲突，同盟军趁势收编了同登城内一部分由越南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组成的法印军士兵，并吸收了当地的农民和青年参加，将队伍扩充至 1500 至 2000 人之众。然而在日本与法印当局实现停火和实现和平进驻之后，日军对于同盟军的态度有了根本转变。本来越南人的独立计划就是以日本行使武力为前提，而当日军不再与法印军交战之时，同盟军就失去了必要的支援。最终越南人没有采纳日本人重新退往北部边境地带展开游击战的建议，而是执意按原计划进攻河内。12 月 3 日，在最后的日军部队撤出谅山之际，陈中立趁机起事，沿一号国道一边收拢义勇民兵一边向河内进发，只是此时法军外籍兵团已接替日军驻防谅山，并在山隘路口伏击了同盟军。措手不及的越南人除一部分逃入中国境内外，其余大部战死或者躲入靠近国境线的山区。而陈中立也最终法军俘获，并于 12 月 26 日在禄平县郊外被处决。^⑩此后同盟军的残党多投靠至中国国民党扶持的“越南国民党”以及“越南独立同盟”等反日的独立组织帐下。除了同盟军之外，在日军进驻期间趁机起事的还有谅山区北山县的越南共产党武装以及河内东部的“安南独立革命军”武装，而在南部的西宁市也爆发了高台教武装的起义。然而这些反法独立运动最后均被镇压，而日军囿于同法方的协定而不能介入这些运动，这也令对日军抱有期待的当地人逐渐失望。时任法印派遣军参谋长的长勇大佐就在给陆军省的就越南人对法国人武力镇压的怨恨以及对日军采取旁观姿态的失望日益加深表示了深深的忧虑。^⑪另一方面越共在高平起事后尽管也遭到镇压，但他们得以携带缴

^⑨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防衛研究所紀要』第 3 巻第 2 号（2000 年 11 月）、67～88 頁。

^⑩同上。

^⑪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防衛研究所紀要』第 3 巻第 2 号（2000 年 11 月）、67～88 頁。

获的武器有秩序地退入了深山，并成为越共第一支游击队的来源。1941年阮爱国返回越南时将这支武装更名为“越南救国军中队”，这将是越盟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武装力量，同时这一举动将成为5年后越盟掀起大规模武装斗争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关键一步。^①

而在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民族主义者开始同日本人频繁接触则大多要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了。其中的一些人出于对驱逐西方殖民势力的考虑而选择同日本人合作，如菲律宾的劳威尔、马来亚的易卜拉欣·雅可布（Ibrahim Hj Yaacob）和印尼的苏加诺与穆罕默德·哈达（Mohammad Hatta）等；而另一些人则展开了抵抗活动，这些活动大多处在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共运的延长线上，如马来亚的华人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以及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军”（Hukbalahap）。当然也存在着与前宗主国和盟军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抵抗运动，如菲律宾的一些受美军指挥的游击队等。而泰国则继续作为该地区唯一的独立国家充当特例，其于1941年12月21日同日本签署了《日泰攻守同盟条约》，并在战争期间实现了领土扩张的梦想。但即便如此，在战争进行期间，泰国内部也出现了“自由泰人运动”这一同西方盟国暗通款曲的组织，并希望在盟军赢得战争之后为泰国争取较为有利的条件。

小结

本章梳理了二战爆发至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这一段时期日本同东南亚民族主义者之间关系演变的脉络，并将两者的互动放置于大的国际形势的背景中加以审视，希望能阐明“大东亚共荣圈”观念的建构对于日本实施武力南进以及民族主义者是否选择同日本合作的作用，并将其同《大西洋宪章》中所建构出的“民族自决”观念加以对比，并分析这种博弈所带来的效应。但归根结底，西方殖民者权威的崩塌更多地还是依靠着日军在战争初期的胜利才得以实现，而经历了这种洗礼的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在之后3年多的日本军政时期又是如何与占领者进行互动，这将是接下来一章的论述重点。

^①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一个越南民族主义的伪装者》，第112页。

第三章：日本占领期间与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互动类型

在一系列“军事胜利”之后，日本基本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并摧毁了西方在当地的政治和军事机器。然而在如何重建秩序方面，日本人很快证明了他们在政治上的狂妄和无知。由于东南亚地区过于广阔，且与同盟国的战争还远未结束，导致了任何战前的设想都会很快被证明已经过时或是与现实情况完全脱节。调整需要时间，然而战局的瞬息万变迫使日本军政当局迅速扼杀了任何在他们眼中疑似会损害日本利益的举动，并开始对当地资源进行竭泽而渔的掠夺。这些相比于被赶走的西方殖民者有过之无不及的侵略行为很快使越来越多的当地人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随着战局的发展对日本愈发不利，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者们开始谋求今后的出路：有的人一如既往地反日斗争并对胜利愈发抱有信心；有的人则甘愿同日本人同进退，甚至就此背井离乡；而更多的人则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骑墙派，在日军颓势渐显之时便开始同盟军暗通款曲，以便获取战后的政治资本。那么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转换中，日本同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又会有何种演变，本章将会以三个地区作为三种主要类型的代表加以阐述。

第一节：法属印度支那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印度支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作为日军的后方基地而存在。由于维希法国当时受纳粹德国的钳制，对日本的要求都予以了满足，而泰国也早早地站到了日本这一方，所以除了在当地驻军以及征收军粮之外，日本对于重塑这两地的统治秩序并无多少兴趣。因此，在1945年3月9日日军发动“明”号作战推翻维希法国在印支的统治之前，“静谧保持”作为这一时期日本的对法印方针的关键词被加以强调。对法印“静谧保持”，指的是以法国的行政机构为首，将治安、经济、教育、社会等与内政相关的事务全部保持在日本进驻之前的由法国一手包揽的状态，且日本不得干涉。同时日本也不得支援印度支那

的独立运动，也不能将法印作为对中国的作战基地以避免招致中国军队的进攻。

①这一方针的在思想上起源于1940年8月30日松冈与时任法国驻日大使安里（Arsène-Henry）签署的秘密协定（松冈、安里协定），确定了之后日军需“和平进驻”的要旨。只是后来事态的发展与当初的预想相比出现了偏差，如前文所述日军在9月22日强行进驻了法印北部，并同法军在同登和谅山一带进行了交火，从而激发了印度支那独立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其后日军迫于各方压力，将事件的责任人等（如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和大本营陆军作战部长富永恭次少将）进行了撤换处理，②并任命澄田睐四郎少将作为新任的法印国境监视委员会（后被称为“澄田机关”）委员长负责修复同法印当局的关系。澄田随后在自河内发往东京陆军省的电报中提及了安南的民族独立问题：

“为将来的民族自决和其他事务所成立的独立领导机构自不必说，法国人最为担心的是无力应对安南人的谋反，所以现在立马进行对安南人的宣传攻势不仅会收效甚微，还会很容易被法国人所察觉……所以现在的意见是暂且停止对安南人的宣传攻势……”③

可见此时日本军方出于缓和同法印当局的关系的考虑，对于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采取了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任由殖民当局对其进行镇压。这一“静谧保持”的方针在一年之后进驻法印南部时被正式的官方命令所强化。如当时大本营陆军部在进驻之后的1941年8月12日发布的《大陆指第九百二十四号》中的第6条“要特别强调军纪和风纪，避免同法印方产生不必要的摩擦”以及第8条“对安南独立的谋略活动要避免介入”④的指令都体现了军部特别是陆军为了在将来的南方作战中保障法印作为后方补给、海运中继点和资源供给的基地而格外重视其安定的态度。如果法印的局势产生动荡甚至化作战场，则必须维持相当的兵力确保其处于日军的控制之下，鉴于当前日军的兵力日益紧张，所以在法印避免不必要的事端可以说是明智的选择。⑤而且面对这片陌生的土地和语言不通的当地人，与

①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防衛研究所紀要』第3巻第2号（2000年11月）、67～88頁。

②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室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572-573页。

③佛印現指導機関と和平友好に関する件電，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2358300、昭和15年「陸支密大日記 第37号1/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④大陸指第九百二十四號，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937300、大陸指 巻05（第0901～1095号）昭和16.07～17.0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⑤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防衛研究所紀要』第3巻第2号（2000年11月）、67～88頁。

其让力有不逮的日本人强行接管内政，倒不如保留既存的法国统治机构为己所用，实现人力和统治成本的节约和高效。基于这样现实的考虑，并取得法印当局的合作态度之后，以及轴心国整体战略态势的影响，看似与“大东亚解放”这一口号相违背的“日法协力体制”在法属印度支那正式建立。^①

尽管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于扶持法印的民族主义运动态度消极，但这并不妨碍民间层面上对独立运动的支援。当时法印的许多日本移民在“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亚细亚解放”口号的鼓动下，对于当地人追求独立的愿望抱有一定的同情，其中的代表人物为被称作“北山根，南松下”的山根道一和松下光广。前者为台拓（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的子会社“印度支那产业会社”驻河内的代表。自1937年上任以来，山根除了从事矿山开采工作之外，还取得了以河内为活动中心的当地独立运动家的信赖，并与他们构建了紧密的联系，先前所述的复国同盟军的指挥官陈中立便是他众多当地人朋友中的一员。山根在自己的住所处设立了“印度支那经济研究所”，并经常邀请各界的有识之士进行交流，且不问国别出身。这样一来，不仅会有商人、学者和作家，也会有军人、官员和民间人士到访。其中也有有名的独立运动家如爱国党和大越党的部分成员以及河内大学的激进学者和学生，经过这些人的牵线搭桥，使越盟的相关人士也会偶尔造访。^②除了越南人之外，近江谷口、小松清等与日本文化会馆相关的人物也时常出现这里。在山根回国之后，由大川周明所主办的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附属研究所（通称“大川塾”）的1期生、当时作为所员在印支经济研究所内起居的原田俊明接替主办交流活动。而法印当局也借口研究所被利用来开展独立运动而几次三番施压要关闭这里。但原田对这些威胁置之不理，继续接待来访的独立运动家。而在这期间抱着对于现存的独立运动是否已不再得到民众的支持这一疑问的原田也在持续关注着越盟的发展，并寻求与其接近。^③

至于被称为“南松下”的松下光广则是在1912年刚满15岁之时就远渡重洋来到法印，经过10年打拼，他在1922年独自创立了本社位于西贡的从事商贸的

^①白石昌也・古田元夫「太平洋戦争期の日本の対インドシナ政策—その二つの特異性をめぐって—」『アジア研究』第23巻第3号（1976年10月）、4～7頁。

^②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防衛研究所紀要』第3巻第2号（2000年11月）、67～88頁。

^③西川寛生「ヴェトナムの日本人—その知られざる記録—（2）」社アジア親善交流協会『研究資料』No.4（1996年2月）60頁。转引自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防衛研究所紀要』第3巻第2号（2000年11月）、67～88頁。

大南公司并亲自担任社长。而松下与越南独立运动发生瓜葛的契机则要追溯至上一年同流亡中的阮朝宗室彊柢的书信往来。而等到1928年两人在台湾正式见面之后，松下便成了彊柢在法印当地的代理人，并应后者的协助要求负责联络越南复国同盟会系的独立运动家。^①然而正当松下与独立活动的联系日趋紧密之时，1937年法印当局趁他临时回国之际以间谍罪名宣布将其驱逐出境，并以在其住宅寻获到的海图作为证据，但其本意应是以此为借口切断松下与独立势力之间的联系。结果松下再次踏上法印的土地需等到日军进驻法印南部之后，而这次成行还是在日本政府与陆军方面出于不激怒法印当局的考虑决定停止对松下发放护照后，在法印派遣军海军委员长中堂观惠少将“松下不会再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的保证下才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松下与日后的南越总统吴庭艳也交情甚广。1943年10月中旬，法印官员对于独立运动的镇压波及到了吴庭艳，当时居住在顺化的他事先察觉到了危险，并请求松下帮助他避难。后者命令大南公司的几名职员一路护送吴坐火车南下至西贡，并将其藏匿于公司住宅内。

除吴庭艳之外，日后成为保大政权首相的历史学者陈仲金也在1943年10月末法印当局展开第二轮对亲日派人士的大搜捕时受到了日本人的庇护。当时日本宪兵队通知了陈关于搜捕的消息并提出对其施以保护。尽管陈仲金拒绝了这一请求，但他还是听从了他们不返回住宅的建议而选择留宿大南公司的在河内的员工宿舍。在次日躲过搜捕的陈则主动找到宪兵队要求保护，而宪兵队长大岛亲光少佐则成功劝说他与同样受日本庇护的杨伯濯（Dương Bá Trạc）一同流亡新加坡。12月12日，两人同宪兵队一起从河内坐火车到达西贡，并在大南公司的公司住宅内待到了19日，而后远渡重洋到达了新加坡。^②1945年1月，陈仲金前往曼谷，并与同样是在日军帮助下从法印逃出的彊柢的两个儿子会面，而此时作为一名国社党成员同时也是日后南越总统的阮文绍也受松下的支援出没于曼谷。3月，由日军扶持的“越南帝国”建立后，陈仲金回国并在松下处获得了一幢由原国社党使用的两层别墅，并一直居住至其赶赴顺化出任越南帝国首相一职。^③除了以上的事迹之外，在二战中松下还担任了促成越南复国同盟会与高台教两股势

^①北野典夫『天草海外発展史』下、芦書房、1985年、263～64頁。转引自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防衛研究所紀要』第3巻第2号（2000年11月）、67～88頁。

^②陳仲金（陳荊和訳）『風塵のさなかに一見聞録一（一）』『創大アジア研究』創刊号（1980年3月）155～56頁。转引自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防衛研究所紀要』第3巻第2号（2000年11月）、67～88頁。

^③同上，174、176頁。

力在 1943 年的合作，并担任两者间联络窗口的角色。在 1945 年战争结束前夕的 7 月 8 日，松下还出任了由 2500 名以上的高台教徒组成的隶属于 38 军的“奉仕队”队长一职并直到战争结束。值得一提的是，据说松下在支援独立运动时并未动用大南公司的经费，而是全部投入自己的私财。^①

尽管“静谧保持”这一方针的存在使得日本官方及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公开介入法印的民族主义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在这一问题上毫无动作。作为日本政府对外政策代表的重光葵在 1943 年 4 月就任外相后就开始处理此方针同日本对外宣称的“亚洲解放”这一口号相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然而，在陆军坚持将维持法印的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的前提下，尽管重光在 1943 年 12 月大东亚会议之后、1944 年 8 月 25 日巴黎解放之后以及同年 11 月大东亚会议一周年之际的三个时期内都提出要重新审视对法印的政策，并在适当时机推进“安南独立”，但这些主张都被固执的陆军首脑们所拒绝。^②尽管如此时任驻法印特命全权大使，同时也是前首相犬养毅的女婿芳泽谦吉（此人在 1951 年彊抵客死日本时曾出席其葬礼）对“安南独立”的支持态度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立场在其于 1944 年 1 月 29 日造访陆军省时所作的陈述中可以窥见：

“法印对于帝国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本国维希政府的存在与否，在维希政府很可能垮台的情况下，还企图利用法印的统治机构无疑是徒劳的，不如趁此时机明确地考虑介入安南人的独立愿望并使其对将来充满期许方为上策。”^③

然而，在同月 24 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已经决定“在现今的形势下坚持法印静谧保持的既定方针”，“避免诱发如原住民的民族运动之类的活动”，^④因此芳泽的主张一时还难以成为现实，但他对于当地独立运动动向的关心从其对日本官员同吴庭艳之间存在来往这一事实的态度上可以感知一二。当时芳泽在从河内前往西贡的途中留宿顺化的日本领事馆时得知此处的一名书记生石田昌南经常通过此时正居住在领事馆附近的吴庭艳处搜集本省的越南人情报。在芳

^①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防衛研究所紀要』第 3 巻第 2 号（2000 年 11 月）、67～88 頁。

^②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とフランス領インドシナー「日仏協力」の研究一」彩流社、2000 年、157～59 頁。

^③参謀本部第 20 班（第 15 課）「機密戦争日誌」其 7 昭和 18 年 12 月 8 日～19 年 5 月 20 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324300、機密戦争日誌 其 7 昭和 18 年 12 月 8 日～19 年 5 月 20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④情勢の変化に応ずる対仏措置腹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855500、大東亜戦争指導 基本大綱等文書綴 昭和 16. 2. 15～19. 2. 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泽到访时，石田也趁机为其做了简要汇报。但当时的顺化领事浦布清治对于石田的擅自行动很是不满，而从芳泽对于同吴庭艳接触一事上表示“也不是不可以”来看，他显然并不认同浦布的看法，甚至在之后拜访大南公司的本社时还对松下光广提出要让吴庭艳出任将来可能独立的越南的首相。此外西贡的日本总领事蓑田不二夫也时常为掌握情报而前往顺化造访石田。^①不过这一情报来源在1944年7月被法印当局所察觉，吴庭艳被迫逃入石田的住宅。考虑到仅以自身之力难以庇护吴，石田不得已选择求助于岘港的宪兵队长山野泰典大尉，最后在印度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町尻量基中将等人的介入下（主要是考虑到同盟国的反攻迫在眉睫，此时或有利用民族主义运动的需要），吴庭艳变装成日本宪兵的军曹并和其他6名宪兵一起乘卡车逃出顺化向岘港转移，并在那里乘军机前往西贡后藏匿于陆军医院中。之后，吴庭艳也不负所托，协助日军制定了在推翻法国殖民政权后法印的统治计划。^②

除了政治上的互动之外，日本人还在通过增加教育上的投入来潜移默化地增加对法印当地人的影响力。在日军进驻之后，学习日语的当地人数量与日俱增，而日本这一边也顺势在河内、顺化和西贡等地开设日语学校，并由外务省派遣日本留学生担任教职。但法印当局却担心这些学校会成为独立运动的温床，因而对当地人同日本人的接触格外警惕，对日语学校的开设的要求也愈发严格。在这种情况下，前述的石田书记生在顺化开设学校时就未取得当地市长的许可，这也是出于对其同民族主义分子来往的怀疑。另外作为以向法印介绍日本文化为目的并作为日法“友好亲善”象征的在河内及西贡设立的日本文化会馆，也被法国官僚们视为日本支持独立运动与情报收集的机关。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官员们想要直接同独立运动产生深层次的互动是很困难的，除了同吴庭艳有来往的石田等人之外，日本外交官几乎没有机会在法印当局的监视下同有影响的独立运动家单独接触。因此，让像松下这样的民间人士或是与文化会馆相关联的非正规外交官出身的人员来搜集与独立运动相关的情报似乎就成为了日本政府最稳妥的选择。

最后，尽管日本军方是“静谧保持”方针最顽固的坚持者，但是如前所述，

^①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防衛研究所紀要】第3巻第2号（2000年11月）、67～88頁。

^②同上。

法印当地陆军方面的宪兵队却是相对较早的试图接近独立运动各势力的军方单位。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来保护这些民族主义者来躲避法印当局的搜捕（如疆抵的两个儿子与陈仲金被协助逃亡海外，吴庭艳被藏匿于陆军设施之内）。而且宪兵队还同当时的新兴宗教团体过从甚密，如被法印当局逮捕并被监禁在西贡南方的薄辽省的和好教教祖黄富楚，其在 1942 年 10 月 12 日即将被押往老挝的前夕在宪兵队伙同数名和好教教徒的营救下成功逃出，并被藏匿在西贡的宪兵队驻地附近。再如当时法印最大的宗教势力高台教在 1940 年末受到法印当局的大规模镇压不得已离开本部所在地西宁省逃往金边，而日本宪兵也在 1942 年 11 月间开始与其接触。双方达成协议，高台教为日军搜集法印一方的军力分布状况以及是否同盟国方面联系的情报，作为交换日军不仅为他们提供保护，并在 1943 年 2 月协助高台教势力成功返回西宁省并进入西贡。^①之后高台教将下属青年团的据点秘密设立在西贡堤岸地区的日南商船股份公司的造船厂内。白天，高台教徒们以为日军建造木船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收取来自日军方面的经费（每艘船支付 20 万至 35 万法印银元），这成为其生活和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到了夜晚，高台教徒则有时间利用竹枪开展军事训练。^②

时间进入 1944 年，随着战局对日本愈发不利，以林秀澄宪兵中佐为代表的日本军方开始秘密研究将来可能会出现武力解除法印政权武装以及与安南独立方面的问题。这年的 7 月至 10 月间，林中佐同法印北部及中部的民族主义者展开接触，并希望能将 20 至 30 名独立运动家秘密送往东京来一同讨论安南独立的相关事宜。^③进入 12 月，林制订了在推翻法印政权后迎疆抵回国主政的计划，但遭到了 38 军新任司令官土桥勇逸中将的否决。最终，日军在实施“明”号作战后仍沿袭法国殖民者将阮朝末代皇帝保大作为统治越南的工具的做法，这令许多盼望疆抵与复国同盟会势力能取代亲法的阮氏朝廷从而使越南真正独立的民族主义者大失所望，并逐渐丧失了对日本的信赖，这也成为越盟在战争结束前后能获取大量民众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④

^①Philippe Devillers, *Histoire du Viêt-nam de 1940 à 1952*, Paris: Seuil, 1952, pp. 81-91. 转引自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防衛研究所紀要』第 3 卷第 2 号（2000 年 11 月）、67～88 頁。

^②高津茂<論説>両大戦間期におけるカオダイ教と日本との関わり(上)、『復国時期 1941-1946 におけるカオダイ教の歴史』を中心として、『東洋文化研究』15 号（2013 年 3 月）、81～122 頁。

^③林秀澄「インドシナ三国独立の経緯」『同台クラブ講演集』編集委員会編『「昭和軍事史秘話」一同台クラブ講演集』中、同台経済懇話会、1989 年、379～80 頁。转引自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防衛研究所紀要』第 3 卷第 2 号（2000 年 11 月）、67～88 頁。

^④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防衛研究所紀要』第 3 卷第 2 号（2000 年

总体上看，日本在战时与法印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演变的特点大致可以归为前后不一与见风使舵，欠缺一个一贯性的政策。^①首先，在1940年9月进驻法印北部时，将军事和政治上的便利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选择同法国合作的道路，而对后者镇压独立运动的举动视而不见。在其后4年半的“静谧保持”时期，政府和军方被这一方针束缚住了手脚，即使对独立运动抱有同情也无法公开予以支援。虽然存在宪兵队对独立运动家予以保护的事例，但这显然无法掩盖日本整体上的消极态度。唯一的例外是对高台教势力的长期扶持，经过数年的财力、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日军在1944年8月22日依据战争形势决定将西贡造船厂中的高台教徒们整编为内应义兵和近卫军，最后编组成6个大队，总兵力为3240人。^②而这支武装力量也在之后的“明”号作战之中为日军的军事行动以及后续占领方面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协助。其次，在法国殖民政权被推翻后，日军依然选择扶持因亲法而在当地民众中人心尽失的保大皇帝而非流亡日本许久的彊祗也带来了不小的问题。尽管土桥中将事后辩解说选择此举是出于“避免干涉别国的内政与主权”^③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保留保大皇位的做法也令日军进一步丧失了人心，再加上之前长时期的消极态度给当地人留下的不佳印象，其下场也就同被推翻的“法帝国主义”一样，被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具象受到以越盟为代表的当地民众越来越广泛的抵抗。

第二节：英属缅甸

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前，缅甸在日军的进攻计划中还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在大本营最初的设想中虽然有将缅甸全境占领的打算，但囿于兵力所限，再加上对战争形势预想得比较谨慎，因此只是指示进驻泰国的饭田中将的15军相机摧毁缅甸南部的敌空军基地，并保障正在马来亚方向作战的山下25军的侧翼安全。

11月)、67～88頁。

①白石昌也・古田元夫「太平洋戦争期の日本の対インドシナ政策—その二つの特異性をめぐって—」『アジア研究』第23巻第3号(1976年10月)、27頁。

②高津茂<論説>両大戦間期におけるカオダイ教と日本との関わり(下):『復国時期1941—1946におけるカオダイ教の歴史』を中心として、『東洋文化研究』16号(2014年3月)、49～83頁。

③土橋勇逸『軍服生活四十年の想出』劉草出版サービスセンター、1985年、528頁。转引自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防衛研究所紀要』第3巻第2号(2000年11月)、67～88頁。

待有余力之时，可攻占仰光，切断援蒋通道，并在其他地区作战暂告段落后，再增加兵力一举击溃驻缅英军。^①因此，从开战到1941年年底这一阶段日本人对于缅甸的定位还是遵循着1941年11月15日在大本营联络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促进对美英荷蒋战争结束的腹稿》中所预想的“利用促进缅甸独立的成果来刺激印度独立”这样一种工具型角色的设想。^②而作为实现这一工具型目标的“工具”，“南机关”与昂山的德钦党人也被认为是可以作为节约日军兵力的手段而被大本营所重视，从而成为了缅甸在战争初期模糊的战略定位的受益者。他们在12月27日于泰国成立“缅甸独立义勇军”（BIA）后，然后趁15军所部在泰缅边境上交战时迅速渗透进了缅甸，在制造骚乱的同时，也在基层建立起初步的政权，并计划尽快攻占仰光，驱逐英国势力，尔后逐步平定上缅甸，完成独立。^③

然而到了1942年的1月22日，对日军推进速度和战果均超出原先预期的大本营决定提前发动缅甸战役，遂向15军所属的南方军司令部发出“协同海军攻占缅甸的要地”^④的命令，这一天也恰好是饭田中将向缅甸国民发表“日军进攻缅甸的目的在于扫清英国势力，解放缅甸民众，支援其独立宿愿……”演讲的日子，而在前一天，东条在帝国议会上也做了关于支持菲律宾和缅甸独立的演讲。^⑤但与日本人的表面承诺不相一致的是，早在1月6日南方军所发布的“关于对缅甸谋略实施的相关文件”就提出将来缅甸的新政权在“表面上为独立的状态，而在其施政内容上应使其易于且忠实地执行帝国的意图”，而且“新政权的领导权应交付于占领军司令官”，“对新政权的承认延期到战争临近尾声，并且应设置军政的实行机关（军政部）”。^⑥而在2月9日南方军的参谋石井秋穗大佐专程飞抵曼谷，将应对缅甸的实行军政即不过早使其独立的方针传达给了饭田司令官，而此时甚至连当时的大本营都没有计划到此番地步。^⑦

随着2月中旬之后马来半岛以及东印度群岛方向战事的逐渐完结，再加上缅

^①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戦争全史第2巻』、89頁。

^②对米英蘭蒋戦争終末促進に関する腹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239600、重要国策決定綴 巻1 大本营政府連絡会議々事録 其の1 其の2と同じである 昭和15年7月～16年12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③斋藤照子：《二战期间日军对缅工作机构——南机关再考》，司韦译，南洋资料译丛，2009年第2期。

^④大陸命第五百九十号，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034300、南方作戦 開戦初期に於ける重要書類綴 昭16.9.18～17.2.1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⑤斋藤照子：《二战期间日军对缅工作机构——南机关再考》，司韦译，南洋资料译丛，2009年第2期。

^⑥缅甸に関する謀略実施等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040800、南方作戦 開戦初期に於ける重要書類綴 昭17.1.1～17.1.2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⑦斋藤照子：《二战期间日军对缅工作机构——南机关再考》，司韦译，南洋资料译丛，2009年第2期。

甸方面同盟国的战备并不十分充分，大本营终于决定开始抽调 25 军以及 16 军的部队增援缅甸的 15 军。但此时日军的目标仍然只限于缅甸首都仰光及附近地域，根据《伴随缅甸作战的军政施行要领》，日军计划“在占领仰光附近地域后于短时间内同波及缅甸的重要区域并获得成功组建新政权的独立运动领导人达成密约，并将占领地的统治的根本权能据为己有，而后再把缅甸的行政权让渡于新政权，此后我军对于行政的细节不作干涉，只是做到监督其大纲的程度”，^①从这一文件看出，此时日军在缅甸战况尚不明朗之时仍然只打算占领仰光后然后再根据民族主义势力发展的情况伺机夺取其胜利果实，再许以无关紧要的行政权力以换取忠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军扶持民族运动的真正意图。

在仰光于 3 月 8 日陷落后，战场的形势对日军愈发有利，其对于缅甸独立的搁置态度也就愈发明显。但同时日军即将发动曼德勒会战，尚且需要南机关及独立义勇军进行作战上的配合，所以 15 军司令部才会在 3 月 15 日的“第十五军中部缅甸地方作战计划”中的第 6 节“宣传”当中强调“为有利于直接作战应主要以宣传手段努力获取缅甸民心”，并且“要使缅甸民众对我圣战之目的彻底领悟还要指导他们怀着建设‘缅甸人的缅甸’的希望协助日本军前进”，“强调重庆军为缅甸人之敌并指导他们对其怀有敌对观念”，还要“特别对掸邦住民的工作，使他们同一般缅甸人一道协助日本军”，另外还要“令南机关抓住时机扰乱重庆军后方……并对地方居民示好及鼓动他们对重庆军发起‘游击战’以限制其指挥及作战行动……”。^②而缅甸独立义勇军也不负所托，他们自泰国进入缅甸以来已吸收了人民革命党预先培训好的大批志愿人员，以及许多僧侣和从殖民军队中开小差的当地人，人数由原先的 4000 人增至 5 万人。^③并且，尽管独立军并未从日本人那里获得多少精良的武器装备，但他们仍在同英国及中国军队的对抗中取得了几次胜利，这使得缅甸人在喜悦之余对独立的信心大增（英国人自不必说，而华人在当地也不受欢迎，原因在于其通过投资银行业和航运业被当地人视作支持英帝国主义的“东方犹太人”^④）并在所到之处纷纷组建“自由缅甸行政委员会”这一基层行政机构。

^①缅甸作战に伴ふ軍政施行要領，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027000、南方軍作戦関係資料綴 昭和 16. 10. 7～17. 1. 2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②第 15 軍中部缅甸地方作戦計画，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103700、南方軍各方面軍作戦計画等綴 昭和 16. 12～17. 5(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③B·Φ·瓦西里耶夫：《缅甸史纲》，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历史研究室，第 489 页。

^④Frank McLynn, *The Burma Campaign: Disaster into Triumph, 1942-45*,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1.

然而，随着缅甸战役的胜局已定，日本人对于民族主义者的需求度也在降低，并且也不打算认真履行之前许下的承诺。5月1日曼德勒沦陷后，英印军与中国远征军退出了缅甸战场，日军得以腾出手来应付缅甸独立的问题。6月3日，林集团（15军的代号）发布“关于施行军政及设立中央行政机关筹备委员会的布告”，开始正式在缅甸进行军政统治。在次日，在日本人眼中已经成为军政绊脚石的独立义勇军的地方行政组织也被下令解散，而在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铃木大佐（其一直主张尽快使缅甸独立且日本应全力协助）指挥下对日军缅甸情报收集及作战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南机关也在6月10日迎来了相同的命运。^①日军高层此举确实存在言而无信之嫌，但考虑到实行南方作战的目的便在于确保当地资源供应，为达到此目的尽快以军事管制恢复当地秩序在军部看来似乎是最为快速且有效的手段。

但是日本人毕竟注意到必须加强怀柔政策以重建当地人对其的信任。除了在6月20日发布《南方军宣传计划》中强调“要对占领地居民身上的偏激的民族意识与敌对文化加以扫除，并在其对日认识上渗透进对皇国的信赖奉献精神以及积极参与以皇国为核心的大东亚全体住民所参与的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当中的热情，并以此为手段完成对皇国占领地区军事、政治在思想上完全掌握的基础建设……”之外，^②日本军政当局制定了一个使缅甸“分阶段”达到独立的计划，其实质上与英国人原先给予的没有具体时间表的“引导”缅甸独立的计划十分相似。另外，日本人在之后还会组建所谓的筹备组建缅甸行政机构的“筹备委员会”，并邀请缅甸主要的政治领袖们参加，但该委员会应在保证缅甸人会同占领军“合作”的基础上制定缅甸新的“宪法”。^③

最为重要的是，从1940年8月6日就被英国当局以发布煽动性言论而被关押在抹谷（Mogoke）监狱的缅甸前首相巴莫博士将会成为日本今后在缅甸最主要的合作者。他在1942年5月曼德勒陷落后从监狱逃出并在北掸邦的德昂山脉（Pakung hills）中度过了艰难的一个月后才遇上了刚刚攻陷该地的日军。随后他被送往曼德勒，并目睹了一路上由缅甸独立义勇军造成的混乱局面。他之后在曼德勒见到了昂山，后者也向他抱怨独立义勇军已经有点失去控制的趋势，主要

^①斋藤照子：《二战期间日军对缅工作机构——南机关再考》，司韦译，南洋资料译丛，2009年第2期。

^②南方軍宣伝計画，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066700、南方作戦関係資料綴（一段落後）昭17.6.23～17.6.29(防衛省防衛研究所)，2017年4月14日。

^③B·Φ·瓦西里耶夫：《缅甸史纲》，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历史研究室，第497页。

是因为人数扩充过快导致太多分散的单位在各地单独行动。而“雷电将军”（缅甸语 Bo Mogyo，铃木大佐的化名）也看到了问题所在，并准备在八莫（Bhamo）建立一座训练营来对这支军队进行整顿和改组。而这也与南方军高层的想法不谋而合，最终在双方的协商下，日本人同意独立义勇军改编为“缅甸防卫军”

（BDA）并由昂山以日军大佐的军衔担任总司令一职。^①尽管国防军的人数较之义勇军时期大幅缩水（不足 3000 人），而且各级军事单位中都有日本顾问作为监视这一支军队的活动的存在，^②但是民族主义者面对日军的妥协态度还是为将来缅甸的真正独立保留了一支在将来可供博弈的武装力量。

而在政治层面上，从 1942 年 7 月开始，巴莫与昂山在彬乌伦（Maymyo）成立的为组建新的缅甸政府而进行各种筹备工作的临时委员会（Provisional Committee）开始运作起来。7 月 5 日，已同日本达成妥协的昂山发布了一道让之前独立义勇军在地方成立的行政组织纷纷撤销的命令，并要求他的军官和士兵不得再介入党派政治否则将会被施予严惩，这显然是应日军方面的要求而为之，因为昂山紧接着强调根据与饭田司令官磋商的结果，将会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来筹划新政府的组建。^③但是要从独立义勇军手中收走业已掌握的权力并非易事，如巴莫本人就收获了大量针对他“阴谋协助日本人摧毁缅甸的军队及其政治基础，驱逐‘雷电将军’这位缅甸之父，并且利用昂山来达到个人目的——攫取所有的政治权力”的指责。^④经过一番周折，缅甸独立义勇军还是于 7 月 24 日解散，而缅甸防卫军则在一个月之后的 8 月 26 日正式成立，其下属的 300 名后补军官将会在仰光郊外敏加拉洞（Mingaladon）的军官训练学校受训一年，而后其中前 30 名毕业生将会被送往日本接受更为严苛的训练（而下一届毕业生将会有 40 人前往日本进修，其中的 10 人将会成为未来缅甸空军的核心人物），至于其他人则会前往防卫军位于彬马那（Pyinmana）的营地加入这支将会在战争结束时人数翻倍的军队。^⑤而在之前的 8 月 1 日，巴莫口中的“缅甸的时代”随着日本军政当局的一纸“政府组建”（该命令将现存的缅甸行政机构的职能囊括进更广泛的军政体系中）命令生效而得以开启，^⑥当然现在看来这一日期应该被视作日本在缅

^①Ba Maw, *Breakthrough in Burma: Memoirs of a Revolution, 1939-1946*, New Haven and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210-213.

^②Б·Ф·瓦西里耶夫：《缅甸史纲》，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历史研究室，第 498 页。

^③Ba Maw, *Breakthrough in Burma: Memoirs of a Revolution, 1939-1946*, pp.215.

^④*Ibid.*

^⑤*Ibid.*, p.217.

^⑥*Ibid.*, p.261.

甸开始施行军政的开始。而巴莫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始白手起家组建“缅甸民政执行机构”（Burma Civil Executive Administration），尽管该机构的每一层级都附带有一名日本顾问，且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饭田司令官手中。原来英国治下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被“立法研讨会议”（Legislative Deliberative Assembly）所取代，但是日军指挥官对其结果仍然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力。此外巴莫还组建了当时唯一的合法政党，并将党的口号定为“一个政党，一个血统，一个声音，一个领袖”。而其他的合法大型组织还包括1942年7月由从独立义勇军中选出的青年所组成的“东亚青年联盟”（East Asian Youth League）。^①

另一方面，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崩溃，原先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缅甸左翼团体的成员纷纷趁机逃脱，并转入地下活动。其中曾与昂山共同创建缅甸最初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德钦梭曾评价前者“沦为了日军的第五纵队”，对此另一位左翼领导人德钦登佩则批评前者未能看到昂山及独立义勇军身上的爱国及反殖民的性质，这一想法也受到中间派人士巴亨的赞同，他认为对于缅甸的独立来说，英国与法西斯都是敌人，但在日本暴露出法西斯本性之前则不宜与其直接对抗，而是应该先致力于建立地下抵抗组织。因此在1944年8月各派为反法西斯结成统一战线之前的两年间，缅甸存在三种不公开的抗日活动：昂山代表的假装同日本合作实则寻求更好地实现缅甸独立方法的活动；德钦梭代表的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展开的地下抵抗活动；德钦登佩代表的在国外寻求同盟国势力援助并调停前两派人士分歧的活动。^②

时间进入1943年，随着在上一年中后期的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相继失败，日本面临的战争形势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而缅甸作为切断同盟国大陆战线的西南要冲，无论是在切断援蒋路线还是在策动印度反英的政略和战略上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③基于这种认识，除了一方面持续加强缅甸方面的防务之外，在适当时机给予缅甸一定程度上的独立地位也提上了大本营的议事日程。在1943年1月14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决定的《关于为完成大东亚战争的缅甸独立施策的文件》应为最早的关于缅甸独立的正式文件。该份文件的方针为“为有助于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完成应尽快允许缅甸的独立，并使新缅甸真正

^①Nicholas Tarling, *Na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If the people are with u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p.123.

^②田边寿夫：《日本军政下缅甸左翼的活动》，司韦译，南洋资料译丛，2007年第1期。

^③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戦争全史第2巻』鱗書房、1953年、330頁。

同帝国紧密一体协助战争的完成”，而在具体条款中除了提到“要设置以巴莫为中心的独立筹备委员会”，“政体留待将来由缅甸人自己决定，而对附着在国政运作上的政治机构则应以强力朴素类型为特别考虑对象”，“最迟于本年8月1日之前允许缅甸独立”等基本事项外，还颇为此地无银地宣称“要注意避免在独立后我方的各种施策带给独立有名无实的印象并特别要尊重缅甸官民的创意与职责”。此外，在“战争协力”这一节中，日本要求缅甸“在独立后对美英宣战并为了完成战争要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完全协助于帝国”，而在最后一节“将来的日缅关系”中则宣称要“使新缅甸作为以帝国为盟主的大东亚团结的组成部分，并在军事、外交和经济等领域与帝国保持紧密的盟约关系，为此预计应缔结规范两国间关系的条约”，^①以上的两项看上去应是日本为缅甸获取独立所开出的相当于成为其仆从国的条件，其目的还是在于换取缅甸对其进行战争在各方面更为积极的支持。这一文件的基本精神与条款内容基本延续到了2月20日由陆军起草的《缅甸独立要纲》中，这一要纲对1月14日的文件的内容进行了细化与补充，其中最为主要的要求便是追加了对“……独立后新缅甸国的形态、组织及独立后的相关事务的转移的诸多施策进行立案审议，而日本人要对其进行指导”，“帝国要在缅甸国政府内配备少数精干的日本人进行指导”，“……缅甸国军在战时的用兵作战要在在缅甸帝国陆海军最高指挥官的指挥下进行”等方面的要求。^②该要纲在3月10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获得通过，并在5月31日的联络会议上所决定的“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中再次获得确认。随即外务省条约局的官员们开始加班加点并在6月5日起草了《日本国缅甸国间同盟条约案》与《关于日缅间条约缔结的相关文件》，以便赶得上8月1日正式条约的签订。

而缅甸方面，1943年3月上旬，由巴莫、德钦貌、登貌和昂山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应邀访日，并受到了东条首相和其他政府官员“不同于以往”的“热情”接待，巴莫注意到这些军国主义者表现出以往不曾有过的谦恭姿态（如东条有一次在晚餐时间拜访巴莫时竟会耐心等待他用餐完毕；而在昂山有一次讲了一个整

^①大東亞戦争完遂ノ為ノビルマ独立施策ニ関スル件，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2943700、大東亞戦争関係一件 / 緬甸問題 / 緬甸独立ト日緬同盟条約締結関係(A-7-0-0-9_39_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ビルマ独立指導要綱，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2943800、大東亞戦争関係一件 / 緬甸問題 / 緬甸独立ト日緬同盟条約締結関係(A-7-0-0-9_39_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脚的笑话后，在场的人只有东条发出笑声来打圆场，这令昂山大为感激）。^①不管这些态度的转变是发自真心还是迫于形势所表现出的虚情假意，至少其令缅甸的民族主义者们在与日本人就缅甸独立展开谈判时态度多少不那么抵触。除了欢迎的态度外，缅甸人还在3月23日当天被授予了勋章（如巴莫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他认为这有助于其威慑日本在缅甸的军国主义分子）并获得了进入皇居觐见天皇的机会，觐见仪式的繁琐以及预先准备好的机械式问答环节都令他们大开眼界。^②在这一系列例行公事结束之后，访问进入了正题，双方围绕缅甸独立的事项展开了冗长的会谈，尽管缅甸人最后注定要全盘接受日本人开出的条件，但是巴莫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了一些反抗，比如在一次大型宴会上故意不按事先准备好的稿件进行演讲，引得随行的缅甸方面军的矶村大佐颇为不满，不过在东条等政府首脑的圆场之下，此事也就不了了之。^③

1943年4月上旬巴莫等人回国之后便开始着手组建“独立筹备委员会”

(Independence Preparatory Commission)，并于5月8日宣布该机构成立，其拥有25名成员包括10名政府官员和15名其他成员。到了7月中旬，缅甸独立后将要施行的宪法的最后草案终于完成，同时巴莫在日本人的操纵下以全票通过的结果被推选为独立后的政府首脑。^④最后到了8月1日，在一番冗长的冠冕堂皇的讲话之后，巴莫宣布“……从今天起直到永远缅甸将会成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缅甸同时也会宣布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她将与其它成员建立自由和平等的伙伴关系，团结一切资源、意志并为将东亚团结为一个整体的东亚新秩序而努力，以及将自身经济建设为世界秩序中的一环来为所有人民确保正义、和平和繁荣”。^⑤随后巴莫根据之前的约定正式向美国和英国宣战。而根据日本陆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的传统，昂山出任国防部长一职，而接替他担任现在被称为“缅甸国民军”(BNA)总司令一职的为同样出身于“三十壮士”并将在日后统治缅甸数十年的奈温。^⑥

在1943年的独立的缅甸很容易地被视为受日本操纵的傀儡政权，昂山也曾在一年后的1944年于诺曼底登陆月余之后的某天当面对巴莫抱怨道：“我们现

^①Ba Maw, *Breakthrough in Burma: Memoirs of a Revolution, 1939-1946*, p.307, p.310.

^②Ba Maw, *Breakthrough in Burma: Memoirs of a Revolution, 1939-1946*, pp.313-314.

^③*Ibid.*, p.316.

^④*Ibid.*, p.325.

^⑤*Ibid.*, p.328.

^⑥Nicholas Tarling, *Na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If the people are with us'*, p.123.

在拥有的只是名义上的独立……只是一种日本版本的地方自治，我们不能再让我们的人民因这种有名无实而受苦了……日本人虚伪且傲慢，他们只是在利用我们”。对此巴莫回应道，因为战争正在进行当中，所以无论是日本还是同盟国一方都不会给予缅甸完美的独立地位，相比之下，同盟国甚至在给予名义上的独立这一点上还不如日本。^①尽管如此，随着轴心国战略态势愈发不利，缅甸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已经开始试图同盟国方面接触以捞取战后的政治资本。早在上年意大利巴多格里奥政府投降之际，缅甸政府的一名部长，同时也是一名共产主义者的德钦丹东就秘密会见巴莫要求同盟国接触以便组织抗日抵抗活动。^②而后随着1944年7月日军在英帕尔战役和马里亚纳战役的两场大败，缅甸民族主义者对日本的离心势头愈发强烈。尽管一些年轻军官策划在6月起义的计划被取消，但却促成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AFPFL）在9月的成立，昂山和左翼人士德钦丹东分别担任总指挥和总书记。^③这一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缅甸试图在战后也维持现今的独立地位，但这这一诉求对于前宗主国与其他少数民族来说可能并非那么容易接受。英国人早已开始武装由缅甸山地部落组成的游击队特别是克钦族，他们并非像掸族那样基本上接受了日本人的统治。到了1944年5月，英国军队招募的克钦族人数已达18000余人。^④

而对于是否接受缅甸人提出的合作要求，英国人内部出现了分歧。英军第14集团军司令官斯利姆（Slim）将军倾向于接受，因为他需要一切可利用的帮助以便能在1945年雨季到来之前进入仰光，尽管这可能使英国恢复在缅甸的统治更加困难。而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蒙巴顿（Mountbatten）勋爵则强调了接受合作的好处同拒绝其的坏处一样多。最终这两位高级将领的态度使盟军接受了人民自由同盟和缅甸国民军的合作要求及条件，并加快了盟军对缅甸再征服的步伐，同时也给昂山等人以巨大的政治红利。现在事态的发展已经使英国人将要在1945年5月17日发布的政治白皮书上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完全失去了意义，因为缅甸人已经在战争中积蓄了足够的实力并实现了觉醒。^⑤

最终，1945年3月27日，在盟军逼近仰光之时，昂山指挥各地的缅甸国民军对日军倒戈相向，在给后者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的同时，也使盟军收复仰光之

^①Ba Maw, *Breakthrough in Burma: Memoirs of a Revolution, 1939-1946*, p.335.

^②*Ibid.*, p.333.

^③B·Φ·瓦西里耶夫：《缅甸史纲》，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历史研究室，第567页。

^④Nicholas Tarling, *Na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If the people are with us'*, p.124.

^⑤*Ibid.*, p.125.

路变得愈发顺畅。4月23日，巴莫和他政府的剩余成员在一片狼狈之中从仰光撤离，而他本人将会流亡日本并直到战争结束。至此，日本同缅甸的民族主义势力的互动基本结束。从最开始“三十壮士”时期的以合作为主到中期的嫌隙丛生以至于最后的公开决裂，可以看出双方的态度都随着战争局势的演变而变化着。当形势对日本有利时，其对民族主义者可以说抱着比较轻视的态度，甚至经常对之前的承诺出尔反尔；而当战况向对日本不利的情况发展时，日本对缅甸独立的搁置态度出现了松动，甚至开始比较积极地推进此项事务以换取缅甸的“忠诚”；而当日本战败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时，开始换作民族主义者从事政治投机活动了。在与同盟国进行利益交换的过程中，缅甸人利用从日本人处获取的政治资本（名义上的独立、一支规模可观的武装力量等）为自己增添了相当多的谈判筹码，并在战后同前宗主国的交涉中占据了有利位置。

第三节：荷属东印度

在日本人战前的计划中，对荷属东印度的占领并未做统一的规划，而是将几块主要岛屿的归属于统治类型做了不同的区分，这其中固然有荷属东印度面积过于广大加之陆海军在一些关键地域的归属上有较大分歧的缘故，更包括不同地区的资源状况有较大差异这一原因。比如在1941年11月26日陆海军高层协商决定的《关于占领军军政实施的陆海军中央协定》中就规定由陆军占领（海军辅助）苏门答腊和爪哇而由海军占领（陆军辅助）荷属婆罗洲、西里伯斯（苏拉威西）、摩鹿加群岛、小巽他群岛及几内亚。^①而在开战之后不久，在12月19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决定的《关于南方占领地归属思想调整的草案》中规定将苏门答腊及附属岛屿以保护领（一部分划为直辖领）的形式纳入帝国版图，与之有相同命运的还有南婆罗洲、西里伯斯等荷属领土，但却将爪哇及附属岛屿同缅甸和菲律宾一道被划为“使其独立”的类型，“但要将其置于帝国强力的保护之下，其军事由帝国掌管，外交和经济受帝国干预”。^②从以上的计划可以看出，日本

^① 占领地軍政実施に關する陸海軍中央協定，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153000、占领地行政に關する決定綴 昭和16年11月～昭和18年3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② 南方占领地帰属ニ關スル思想調整ノ腹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2970700、大東亜

人对于荷属东印度的重要性置于无以复加的地位，甚至不惜要完全兼并其大部分领土而仅对爪哇一地许以日后独立的前景作为彰显其“亚洲解放”口号的证据，但东京实际上还是希望将其置于日本的保护国的位置。

但对于荷印本身来说，日本人推翻西方在当地统治的所造成的不同于菲律宾和缅甸情况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大大促进了地方自治程度的发展。日本人到来之后给予了当地一定的独立地位（尽管很有限）并允许其建立一支国民军，这些相较于以往革命性的变化重塑了在殖民地时期被成功遏制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使其甚至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讨论未来的政治进程。而民族主义者也面对着这样一种挑战，即能否确保被驱逐的宗主国势力在战后不会卷土重来以保证现在独立的地位并使自身在国际冲突中最后能够全身而退。缅甸人之所以成立“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而菲律宾的民族主义精英则要确保战争不会打乱美国在之前许诺给他们的独立路线图。然而荷印一项重要的独特之处是其领土上的资源对日本人的重要程度要远远高于缅甸和菲律宾。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石油是日本入侵东南亚的最主要动因，而为确保获取这些资源所制定的官方政策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最优优先级的地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人直到1944年的危机到来之前总是对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要求虚与委蛇，其对当地独立的态度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头承诺上。^①

根据前文所述的日本的占领计划，可以认为当时荷印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应为由被计划在将来“实现独立”的爪哇，这座岛屿在当时拥有4200万人口，其中98%为印尼人，而华人则仅有52万人，且大多数在当地定居已超过第二代和第三代（不同于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受中国本土高涨抗日情绪影响的华人），对日本人并没有太大的敌意。^②得益于该地区民族的单一性，日本人在当地的军政得以比较顺利地实施。在占领初期，16军的今村均中将原想依照1941年11月25日大本营陆军部出台的《伴随南方作战占领地统治要纲》中的“施行军政时尽可能利用现存的统治机构并尊重当地之前存在的组织及民族风俗以达到减轻我军占领负担的目的”条款，^③来起用荷兰官员来协助日军维持统治。而在该项政策被

戦争関係一件 / 戦時中ノ重要国策決定文書集(A-7-0-0-9_5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①Nicholas Tarling, *Na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If the people are with us'*, p.129.

^②黒田秀俊【軍政】學風書院、1952年12月、89～90頁。

^③南方作戦ニ伴フ占領地統治要綱、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137500、軍命令及情勢判断書原文又は写提出要求の件回答 昭和16年11月15日～昭和20年1月27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弃用后，日本人也更愿意同当地的土邦贵族而非民族主义者进行合作。但民族主义者还是通过摒弃流亡中的荷兰政府和放弃开展游击活动等举动向日本人展示了合作的态度，而日本人也从1942年3月29日开始利用这些来自战前“印度尼西亚党”（Parindra）的合作者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3A”运动。^①当日本军政当局于8月份正式组建时，这些荷印的稳健的合作者们已经在军政诸机关内部大量就职，并成为3A运动所推动建立的众多的大众团体的指导者。

另一方面，在战前对殖民当局一贯采取不合作态度的以苏加诺和哈达为中心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也要求参加日本主导的军政体系。他们此举主要的动机在于在将参与的军政咨询机关及大众团体渐渐向民族主义化转变的同时，再利用这一既成事实来就民族独立问题对军政当局施加压力。^②这种积极性在稳健派身上则很少见。而且在这些激进民族主义者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共产主义者，他们利用在公共职务这一身份的掩护结成各种的团体进行反日的地下宣传活动。激进派中信仰传统伊斯兰教代表性领导人有苏丹·夏赫里尔（Soetan Sjahrir）与亚当·马里克（Adam Malik），而阿米尔·谢里夫丁（Amir Sjarifoeddin）则属于共产主义势力中的代表人物。但另一方面，由于秘密从事地下反日活动的许多领导人又同时参与了日军军政统治的缘故，这种双重身份的掣肘导致其规模和影响力受到局限，且与菲律宾、马来亚和越南的抗日斗争无法相提并论。另外，由于苏丹·夏赫里尔长期受到结核病的困扰，考虑到身体情况所限以及现实情况的需要，他长期以来的战友苏加诺和哈达说服他专心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而与此同时他们二人则继续同日本人合作以积累斗争所需的资金与军政关系方面的情报。^③而阿米尔·谢里夫丁则在1943年初日本当局的一次逮捕行动同其他4名共产主义者一起被逮捕，最后也是在苏哈托和哈达的积极斡旋下才得以生还。

而日军方面在战争初期对同盟国连战连胜的局面也随着中途岛海战的惨败而宣告结束，同时1942年下半年开始的长达半年的瓜岛争夺战的失败也标志着战争主动权落入了盟军手中。有鉴于此，日军大本营在进入1943年后确立了今后采取守势的战略方针。同时，与印尼人期待相反的殖民政策的加强以及经济上

^①这场运动的名称来自于其宣传口号：“日本是亚洲的领袖，亚洲的保护者和亚洲之光（The leader of Asia, the protector of Asia, and the light of Asia.）。”参阅 M. C. Ricklefs,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since c.1200*,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p.251.

^②谷川荣彦「太平洋戦争と東南アジア民族独立運動」、『法政研究』、福岡：九州大学法政学会、第53卷第3号（1987.03）、361～398頁。

^③Rudolf Mrázek, *Sjahrir: Politics and Exile in Indonesia*, SEAP Publications, 1994, p.222.

的破坏性掠夺也令当地人的不满与日俱增。日军为将印尼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防卫体系也接连出台一系列政策。首先是在1943年3月为了争取当地人对征发人员的支持而成立所谓“人民力量中心”（POETERA/ Center of People's Power），为了避免引发民众和民族主义者的不满，日军还对苏加诺和哈达许以该机构中的高位；其次就是加大对前述的主要以补充兵员与劳务者（Romusha）为对象的残酷的人员征召行为的强度；其三是在1943年9月为笼络人心而进行的小步伐的政治改革，包括设置中央参议院这一占领军当局的咨询机关并在军政机关的上级职位中扩大对土著官吏的任用比例；最后，其第四点措施是创建一系列日军的辅助机构和组织，包括在1943年9月创建“乡土防卫义勇军”（PETA），1943年11月创建作为占领军与当地农村的沟通渠道的“印度尼西亚回教联合会”即“马斯友美党”（Partai Majelis Syuro Muslimin Indonesia/Masyumi Party），然后在1944年3月设立作为“印尼版大政翼赞会”的“爪哇奉公会”等等。以上这些做法说到底都是日军在占领政策上的策略性变化，并非真正地对印尼人做出让步。^①但是，随着日军的战局不断恶化，以及印尼人对日本占领政策的不满不断加深，再加上民族主义势力以此为契机对占领军当局不断施加压力，最终使得日本人对印尼人开始不断地做出让步。

到了1944年中期，日军在东南亚各战场都陷入了危机。1944年9月7日小矶国昭首相在第85回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之时，首次公开表示要使除新几内亚之外的荷印人民在将来获得独立，这一演说是基于9月2日所制定的《关于东印度独立施策的文件》的内容所发表的。^②另外，军政当局从此时起也开始允许当地人悬挂本民族的旗帜以及歌唱本民族的歌曲。这些政策尤其刺激了年青人的民族主义感情，令他们愈发活跃起来，并成为了日后印尼进行独立以及卫国战争的中坚力量。然而，此时的占领军当局对“小矶声明”的付诸实施采取了拖延搪塞的态度。出于对可能失去民族主义情绪日益滋长的年青人的支持，苏加诺慎重但又坚决地对日本人施加尽快设置“印度尼西亚独立筹备委员会”的压力。进入1945年，日军在各战场不断败退，而日本本土也在盟国不间断的战略轰炸

^①谷川栄彦「太平洋戦争と東南アジア民族独立運動」、『法政研究』、第53巻第3号（1987.03）、361～398頁。

^②详情可参阅大東亜戦争関係一件／東印度問題（蘭印ヲ含ム）、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2980300、大東亜戦争関係一件／東印度問題（蘭印ヲ含ム）(A-7-0-0-9_5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中明显丧失了将战争继续维持下去的能力，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仅仅只是时间问题了。对于战争的进展情况，印尼的民族主义者与年青人早已通过暗自接听盟国方面的广播而心知肚明。正在这一局势动荡之时，1945年2月14日，在爪哇岛东部的勿里达（Blitar）驻守的乡土防卫义勇军一部由于对日军长期不满而在地下组织的煽动下起兵反叛。这一行为是对日军长期进行的残酷的强征粮食及劳役和对妇女施暴等行为日复一日所积累的怒气的集中爆发。虽然日军对这些士兵进行了彻底的镇压，但因为这次起事代表了印尼人的对日不满情绪，其才会造成远远超出其活动范围的影响力。

首先，日军意识到了当地人强烈的反日情绪，并察觉到自己原先对与独立仅仅只做口头承诺是远远不够的；其次，苏加诺等政治领袖原考虑利用年青人的民族主义能量来推动独立工作，却不曾想到这些新生代已经抛开了他们的政治指导而独自将独立运动推向了高潮。^①于是在1945年4月，日本军政当局为促成印尼独立而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该机构由包括印尼人、日本人、华人、印欧混血人等60名成员组成，^②并负责印尼独立后将要实行的、将要体现苏加诺所提出的“建国五原则”（Pancasila）的宪法草案的制定。之后苏加诺和哈达等政治领袖在人民的独立意识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对军政当局要求设立独立准备委员会。而此时正准备本土决战的东京方面也在大厦将倾之时也失去了设立条件的意愿和底气而是选择推动荷属东印度全境独立。在7月17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所通过的《关于东印度独立的处置方法的文件》中就提出“推进全地区的独立准备”，“新独立国的国体、政体、国名、国民的范围等相关事项依据当地民意定夺”，“本施策在当地的实行之责全部交予当地驻军”，^③这些条款表明此时已自顾不暇的日本政府已经无意也无力再控制印尼的独立进程了。

在日本战败前夕的1945年8月7日，印尼的独立准备委员会终获设立。这一重大成果的取得，如前所述，并非是由日本人轻易所许，而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斗争过程。以激进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在同军政当局进行妥协与合作的同时，又以广大民众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后盾，同时利用日军在战场上节节失

^①谷川栄彦「太平洋戦争と東南アジア民族独立運動」、『法政研究』、53(3)（1987.03）、361～398頁。

^②同上。

^③東印度独立措置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236500、重要国策決定綴其の7 昭和20年4月16日～7月17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利的局面，来对军政当局进行强有力的施压，最终收获了这一结果。^①在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后的8月16日上午，苏加诺与哈达被一群受到苏丹·夏赫里尔支持的乡土防卫义勇军军官（包括前面提到的亚当·马里克）绑架出雅加达并被带到井里汶（Cirebon）附近的一处义勇军驻地中被逼迫立即宣布印尼独立。最终在日本驻雅加达武官前田精海军少将的斡旋与默许下，苏加诺等人在8月17日上午于雅加达官邸内正式宣读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宣言，为绵延300余年的外国殖民地统治划上了休止符，并开始着手准备将来同卷土重来的殖民势力所进行的印尼独立卫国战争。^②而日本人也将继续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小结

本章选取了太平洋战争时期东南亚三个在民族主义运动与日本互动关系演变的方面有较大区分度和代表性的地区进行了阐述。从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地区和战争的不同阶段，日本与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双方的需求、行动与心态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反过来又影响了双方在互动中的位置以及状态。当战争的形势对日本有利之时，其对民族主义者占据着主动地位，且对其只是一时利用的态度，而民族主义者这时往往会对日本抱有较大期望，对其鼓吹的口号和许下的承诺往往会比较相信；而当战局对日本愈发不利之时，互动的主导权就开始渐渐滑向民族主义者这一方，其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拥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最后，在日本行将战败之时，在扶持民族主义势力方面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反而会像其当初所进行的宣传那样毫无保留，而民族主义者也正好抓住了这一权力的真空时期从而极大地扩充了自身实力，在对付战后卷土重来的殖民势力时占据了有利的主动地位。

^①谷川荣彦「太平洋戦争と東南アジア民族独立運動」、『法政研究』、第53卷第3号（1987.03）、361～398頁。

^②M. C. Ricklefs,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since c.1200*,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p.260.

第四章：“南进”的“冲击”与“遗产”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东南亚重新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使得一些民族主义者跃跃欲试，希望可以就此掌握国家的命运。然而伴随着西方盟国胜利的还有殖民势力的卷土重来，东南亚的国家就此出现了迥然的命运走向。一些国家很快获得了独立，而其宗主国势力也得以体面地退出；而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则经历了长期的谈判甚至是残酷的武装斗争，其宗主国最终不得不背负着失败的屈辱退出了舞台。而反观日本这边，在战后初期确实面临着许多艰难境地，然而相比于隔海相望的重新陷于战火之苦的中国人、越南人和印尼人来说，日本人无疑要幸运地多。经历了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亚洲成为了冷战前沿，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由于无法进入当时的中国大陆市场，则开始将目光重新投往东南亚。昔日“南进”中的互动双方，在另一个时空中重新遭遇。事实证明，和平的经济手段远比武力手段来得有效。在付出了一些成本后，日本重新获得了东南亚国家的接纳，并持续至今。本文的最后一章则试图解答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即此种好感究竟同日本的武力“南进”关系几许，其对战后东南亚对日本的观感究竟有多少影响。最后，本章将对日本的“南进”的实质以及其对东南亚战后实现独立的影响做一总体性的评价。

第一节：“南进”与东南亚民族主义：“真实”与“虚幻”

就在新加坡沦陷前不久，一位马来亚的印度籍文职人员宣称虽然他在理智上完全抗拒着日本的入侵，但在情感上他却本能地倾向于“同盎格鲁—萨克逊人作斗争的日本人”。而与之相似且更加明确的言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的东南亚人当中广泛地存在着。^①在一些例子当中，日本军队的进入会受到当地人一定

^①Willard H. Elsbee, *Japan's Role in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st Movements, 1940—45*, Cambridge: Harvard

程度上的欢迎，似乎预示了其同西方的战争即将大获全胜。而在另一些情况中，他们会收到当地人态度冷淡的迎接，并且几乎只有受到日本侵华战争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的华人群体在战争初期不顾一切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

东南亚人对日军胜利做出这一反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人将“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这一口号作为卓有成效的宣传武器。他们尽可能地使用这一武器并且在战争初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这种效果也在逐渐递减。正如后来的缅甸巴莫政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一样，“针对英帝国主义所使用的陈旧口号因为被不断用来作为搪塞因日本人到来的所出现的新问题的借口而导致其效果被严重削弱。”^①西方殖民者曾经犯下的罪行并不能完全抵消日本人正在犯下的罪行。而后者也能明显感受到在入侵东南亚时所受到的一定程度的欢迎和在撤离时的众叛亲离的境遇之间的强烈对比。在菲律宾他们处处受到游击队（包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虎克党”以及受“远东美军”指挥的亲美的武装力量）的袭扰；在缅甸他们受到被曾经的合作者训练和组织的缅甸军队的进攻；在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他们则发现到战争末期时安全的地方屈指可数。即使当地人明显不乐意西方殖民者卷土重来，他们也几乎不会对即将战败的日本人施以任何援手。显然，日本人在试图将东南亚人的利益和自身利益整合到一起时失败了。^②

这一失败可以归结为许多原因——两项最重要的原因分别是其施加于当地人头上的残酷统治和因战时的经济混乱所导致的物资匮乏。在本研究中，^③已注意到另一种导致其失败的原因，即日本人的侵略本性无法真正获得当地民众的信任。在许多例子当中日本人从民族主义团体上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并且成功地吸引了那些厌恶前殖民政府（并被殖民政府厌恶）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们，他们在某些时候提供了虽然只是名义上但总体上算是积极的合作。然而，这种合作从未发展成两者之间利益的真正整合，如本文第三章关于缅甸的内容所指出的，两者从未展开过真正平等和互利的合作，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大部分东南亚人并未对日本的失败感到绝望，也并不认为他们必须依靠日本的支持才能获得独立。

另一方面，日本的入侵给各地区不同种类的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运动创造了一定的机会，尽管这并非出自日本人的本意。但日本人在处理同民族主义者的

University Press, 1953, p.163.

^①Willard H. Elsbee, *Japan's Role in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st Movements, 1940—45*, p.163..

^②*Ibid.*

关系时还是失败的，并暴露了他们一直以来对东南亚人以及其他亚洲人根深蒂固的歧视与偏见。这往往导致日本人总是将一些无关紧要的职位交付于民族主义者，同时将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比如缅甸和荷印的事例）。他们在对民族主义运动的评估当中不自觉地带入了日本人至上的思想，这在前文中已经有所提及，而其在整个占领期间的相关活动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日本人宣称是为从西方手中“解放”东南亚，但讽刺的是，其所作所为更类似于吉卜林笔下“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所表现的种族主义观念，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两者存在一种在平等层面上对某一问题进行商讨的关系。当一个外来的“先进”国家试图将其基于自身经验所结出的果实传播给另一个相对“落后”地区的人民时，这中间的过程通常是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特别是对东南亚这些要以牺牲古老的社会传统为代价的接受者来说。虽然历史上的许多案例已经证明解决这一问题并没有什么妙计，但毋庸置疑的是日本人的多数行为显然已经越过了这种处理这种关系的大多数基本底线。最后，日本人原本视民族主义为一种可助益于他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的工具，但他们却未能及时认识到如果民族主义势力壮大到可堪一用的地步，民族主义者将会更多地考虑回报而不是准备无私奉献，并不再甘心仰人鼻息而是会对日本人要求实现真正平等的地位，以及不仅仅满足于被作为权力结构的点缀而是要求真正拥有可供行使的权力，这是日本人在最后将不得不面对的最低诉求。在本研究有关于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章节中展现出日本人已逐渐认识到民族主义是一股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强大和成熟的力量，并且会不断要求日本人做出比现在更大的让步这一事实。最终，他们会像前几年才被赶走的那些西方殖民者一样，只有在失败的危机迫在眉睫之时才会考虑满足这些要求。^①

如果日本人发现民族主义者作为他们眼中的一种工具要比他们想象得更为强硬，那后者就会发现日本人往往会言而无信。当互动中的单独一方每次寻求利用另一方作为实现其自身计划的工具时，结果总会令人失望，但是双方也总会在博弈中获得些许回报。毫无疑问的是正是有着广大民众的默许和许多领导者们的合作才使得日本的占领变得相对轻松，并且为军政当局提供了绝佳的宣传武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日本的各项政策

^①Willard H. Elsbree, *Japan's Role in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st Movements, 1940—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166.

对此只是有着比较小的影响，甚至其政策本身也只是战争这一大环境变化下的产物，但在 1945 年时，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确实要比 1941 年日本入侵前的任何时期都更加强大。

同样如前文所示，在荷属东印度被占领期间有两项重要的变迁被着重探讨——当地人在行政事务中的角色的重要性得到提升，以及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日本人首先控制了所有重要的行政岗位，但也在印尼人的压力之下逐渐做出让步从而使后者得以部分地开始管理自身事务。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日本人都会在行政体系中任命日本顾问来试图亲手掌控最终决定权，但这一手段由于面临着诸多环境的限制以及其他事务对于注意力的分散，其结果并不总遂人愿，尤其到了战争的结束阶段，将带有真正权力的职位交到印尼人的手上已经是不可扭转的趋势。或许从结果上看，印尼人不会获得太多的关于行政方面的经验，但他们确实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激励，使得他们在战争结束之后下定决心来抵抗卷土重来的西方殖民势力。

东南亚各地的积极和消极的抵抗运动所带来的压力迫使日本人在行政领域做出种种让步，这也使他们意识到了当地民族凝聚增强的强烈趋势。特别是 1944 年以来，日本人开始有组织地利用其宣传机器进行拉拢当地人民的任务，这无意间增强了当地的民族凝聚力。随着盟军的反攻势如破竹，日本人如果想要保住其扩张成果，获取当地人的支持就变得迫在眉睫了。此种形势的转变扩大了民族主义者讨价还价的余地。印度尼西亚的事例表现了民族主义领袖被赋予了相对更宽松的活动空间，他们工作效率的提高得益于日本人提供的传播手段与运输工具，这也意味着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民众人数的增加。在日军占领之下，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比之战前从未有过的集中，并且拥有了一大批决心将东印度群岛统一起来的领导者们。这些组织得到了一些占领当局在民事和军事方面的资助，这是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效地在地方层面上推进民族主义运动的手段。他们不只接触到了新的受众，一些新的干部也接受了培训，与此同时，他们也获得了统一的纲领和宣传口号，这会帮助他们打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长久以来存在的藩篱。而在占领期间得以正常运转的教育系统也成为了另一种协助民族主义运动整合的工具。所有的这些发展，“伴随着由战争引起的旧殖民体系的推翻和日常生活的瓦解，都成为了旧秩序消亡的催化剂，也为印尼现代政府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①

还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对于国家统一的需要使得东南亚少数民族群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比如缅甸的克钦族与马来亚的华人群体）。一般来说，日本人在“分而治之”政策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方针，虽然有着特殊例外，就是由于中国抗日战争以及之前长期存在的反日活动的影响，华人是抵抗占领当局的主要力量。但退一步来说，即使是对于华人，为了努力确保在战争后期取得的国家统一的成果，也通常会被迫表现出同日本人合作的姿态来加强同其他民族群体的团结而不是分裂。^②

进入冷战时期之后，除了法属印度支那外，政治独立已不再是战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要考虑的头等问题。其他问题（如经济和外交）现在占据着舞台中心，但民族主义仍是这片群岛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影响要素，而政党制、民主制或是军事独裁、共产主义等其他因素将会在未来持续影响着这一要素的走向，并共同推动着该地区政治生态的演变。对于试图卷土重来的西方殖民者来说，即使有着强有力的决心以及万全的准备，想要在因日本人的影响而声势壮大同时又保持着传统的反殖民主义传统的东南亚民族主义势力手中重新夺回权力的尝试，已被战后初期的法国、荷兰乃至更将来的美国都无一例外落败的现实所证明是绝无可能了。而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会将从更宽广和多元的角度来审视日本的扩张对东南亚造成的影响。

第二节：“南进”的实质：“破坏”与“掠夺”

太平洋战争给东南亚带来的首当其冲的影响便是暴力。这源于其同其它地区正在进行的冲突所共同组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拥有规模巨大的暴力程度。这是武器科技的进步同大规模动员相结合的产物。毫不奇怪的是，死者大部分是平民而非军人。大约 5500 万或更多的人失去了生命，其中 3900 万人来自欧洲尤其是苏联，其余大多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但也来自爪哇、越南和日本自身。^③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见证了德累斯顿和东京的冲天大火，并以降临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破坏力无与伦比的原子弹作为结束的标志。在这种破坏力面前，天皇选择了投

^①Willard H. Elsbee, *Japan's Role in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st Movements, 1940—45*, p.167.

^②*Ibid.*, p.168.

^③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p.252.

降。日本人结束了战争，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战争本身的破坏性终结了战争。

在这广泛的暴力行为中，日本人的暴行无与伦比。但相比于德国对战争罪行的深刻反省与道歉，日本人对此则尽可能的逃避，甚至罔顾是非。14 名甲级战犯被供奉于靖国神社，成为日本对于自身的侵略历史缺乏真正反省的象征。这一行为勾起了一些人对战争的痛苦记忆，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提供了谋求政治利益的机会。而战后日本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就感也会使其对过往的战争记忆变得模糊。

战俘是战争暴力的直接承受者，但是相比于落到德军和意军手中的美军和英军战俘 4% 的死亡率，落到日军手中的战俘死亡率高达 27% 的数字仍然让人震惊。^①日军的行为或许可以同其认为投降是一种耻辱的信条联系起来，投降者也因此成为他们蔑视的对象。虽然日本签署并批准了关于俘虏待遇的 1907 年《海牙公约》，但却并没有批准《日内瓦公约》及 1929 年的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1942 年的盟军战俘指出他们应被适用于 1929 年的条款。外务省对此回答道日本并不受相同条约的约束，显然，对公约条款的忽视是一项蓄意的政策，这可以用于证明日本发动的是一场针对白人的种族战争。但是东南亚地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高达 735 万人以上的死亡总人数（其中华人可能达 60 至 70 万人）^②使得这一论点难以为人们信服。

在东南亚，日本人不仅要摧毁欧洲人建立的殖民体系以取而代之，还要摧毁欧洲人的威望这一殖民帝国的根基，这也确实可以解释欧洲人为何会受到如此待遇。而东南亚华人的遭遇或许跟其支援中国抗战并在日军入侵后继续同日军抵抗有关。但要解释日本人为何对已被宣称纳入共荣圈体系的其他东南亚族群施加暴力是比较困难的。他们的恣意妄为和恐怖手段使那些他们所需的支持者们渐渐疏远，而且他们对当地劳动力的剥削压榨是残酷和低效的。日本作为后发的帝国主义国家导致其在殖民政策上有点不足。一是当日本在 19 世纪末期开始进行扩张时，帝国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已逐渐由殖民扩张转为投资倾销。施加于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政策可以说只是欧洲列强自 16 世纪以来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实行政策的一种升级版。日本人对这种政策的极大完善却也表现出其已经同时代逐渐脱节的特质。对于急速崛起的日本帝国主义还存在一种问题，就是会被所施行的残酷

^①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p.253.

^②李国梁：《日本“军政”统治下的东南亚华侨》，《八桂侨刊》，2005 年第 3 期。

政策所束缚。大多数殖民帝国都建立在将寻求当地合作者和有选择性地使用武力
的手段混合的基础上，而武力的使用也是被用来作为说服和支持合作者的手段，
但日本人很少做到这一点。

首先，日本人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轻而易举地获胜。“胜利”滋生了过度骄
纵的情绪，使得他们对于完成原先制定的行政计划变得不那么热衷。事实上，日
本人对东南亚的族群与文化情况并不是非常了解，他们致力于搜集的大多是关于
当地的政治、战略资源和军事实力的情报。而关于民情的情报也并未得以充分利
用。军队的决策者们在利用当地的日本移民方面缺乏热情。在占领期间，比起当
地原先存在的日资企业，军队更依赖于本土财阀的支持。同时还存在一种消极趋
势，就是日本人会在当地粗暴地嫁接之前在中国东北、内地和日本本土所实行的
战时管制措施，即构建政治控制、军事动员及对经济进行粗暴干涉的组织体系。

其次，日本帝国同西方盟国的战争还远未结束。尽管新的进攻计划已被起草，
但这些计划的实行却会被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和机械的指挥方式所破坏。对于这
些问题的解决需求很快又会被“共荣圈”内部的交通瘫痪以及日益增长的对防御、
军事行动和地区自给的需求所取代。这意味着对劳工更为严酷的压榨，更为严重
的物资短缺，更为夸张的通货膨胀水平（如表 4-1 所示），以及因为尝试控制食
物供给所产生的大规模饥荒。

表 4-1 日本占领地的货币发行量及物价指数（物价指数按 1941 年 12 月=100）

年月	“满洲 国币(百 万元)”	中国联 邦准备 银行券 (百万 元)	中国储 备银行 券(百万 元)	马来元 (南发 券)(百 万元)	菲律宾 比索(南 发券) (百万 比索)	印尼盾 (南发 券)(百 万盾)	缅甸卢 比(南发 券)(百 万卢比)
1941.12	1262	966	280				
1942.12	1669	1593	3696				
1943.9	2121	2552	11797	385	348	537	497
1943.12	3011	3762	19150	482	513	674	685
1944.12	5877	15841	139699	1512	4874	1976	2832
1945.8	8158	93585	2277179	5650	6150*	3880	5654
	新京(长 春)	北京	上海	新加坡	马尼拉	巴塔维 亚(雅加 达)	仰光
1942.12	112	158	206	352	200	134	705
1943.12	122	267	671	1201	1195	227	1718
1944.12	162+	892	5707++	10766	14285	1279**	8707
1945.8	?	17273	7189	35000	14285*	3197	185647

资料来源：中村隆英编：《日本经济史 7：“计划化”和“民主化”》，历以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年，第 36 页。

注：*表示 1945 年 1 月的数字；**表示 1944 年 9 月的数字

+表示 1943 年 3 月的数字；++表示 1944 年 11 月的数字

以上两方面的问题又使第三个问题的冲击更为严重。日本军队的传统精神，以及征募和训练方式使其成为有效的战争机器，却又不称职的占领工具。这支军队是有选择地建立在日本的传统价值观之上，这被视为可以增强这个新建立的现代国家的扩张效率。随着规模的扩张，其也越来越受到日本乡村社区中的传统

等级观念的影响。^①他们的训练使军官和士兵丧失了人性，在打造了一部高效的战争机器的同时也导致强奸、屠杀和劫掠行为的日益增多。

这些因素导致了占领期间暴行的日常化。当战争需要进行更广泛的征兵时，为了使士兵在为帝国征战时更富效率，军官们必须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这在 1941 年或之后的时间里是无法做到的。令人毫不惊讶的是，来自日本核心殖民地台湾和朝鲜的士兵甚至比来自日本本土的士兵更加残忍。他们似乎更乐意用欺凌当地人的方式来作为自己在日军当中受到的地位低下待遇的心理补偿。^②而据一位在 1942 年时逃出马来亚的华人描述，在当地的外籍日军当中，相较于台湾人和山东人（应为王克敏、齐燮元部），朝鲜人是“最坏的”。^③而对于因其残暴行径而臭名昭著的宪兵队来说，在其中任职的朝鲜人的残忍程度也同样令人咋舌。但是不管如何试图对作战士兵的表现进行解释或掩饰，也不管以其身处多么极端的战争环境所带来的压力之下为借口，日军对内对外的大量残暴行径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④而这些行为使他们短期内赢得支持的尝试变得愈发徒劳无功，而他们本希望通过赢得东南亚精英阶层的支持可以进一步赢得底层大众的支持。

以上所提及的暴力和掠夺行为也使一些学者对于日本在东南亚战后实现独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自己的判断。“日本的军事占领暂时地斩断了西方的控制并削弱了前统治者，”家永三郎写道，“不过这只是一个附带的结果：日本并没有解放亚洲。”^⑤路易斯·艾伦（Louis Allen）却有着不同看法：“日本是通过其自身的失败使东南亚获得了解放，而不是通过预先设置好的一系列政策。”^⑥或许最有说服力的是同样持不同观点的乔伊西·莱博若（Joyce C. Lebra），她认为日本军队并没有怀揣着“基本的革命目标”，但是军事占领“刺激了许多地方上的革命力量。这一结果一部分是无心插柳，但一部分也确实源自于日本鼓励反殖民独立运动的政治目标。”^⑦但无论如何，这场战争的最终受益者是东南亚的精英阶层，尽管他们在战后要经历远比以往更艰苦的斗争，但正如李光耀所说，他

^①Richard J. Smethurst, *A Social Basis for Prewar Japanese Militarism: The Arm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1974, p.182.

^②*Ibid.*, p.256.

^③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C. Hurst & Co. Publishers, 1998, p.46.

^④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p.256.

^⑤Tenaga Saburo, *Japan's last war: World War II and the Japanese, 1931-1945*,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8, pp.179-80.

^⑥Louis M. Allen, "Fujiwara and Suzuki: Patterns of Asian Liberation", in William H. Newell ed., *Japan in Asia 1942-1945*,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98.

^⑦Joyce C. Lebra, *Japanese-trained Armi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0, p.181.

的同僚和他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占领的一代人，而且他们逐渐认识到没有人——日本人也好英国人也好——有权压迫和驱使他们。他们下定决心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并让他们的孩子在一个可以保持自身尊严的国家中成长。^①但是，在面临战后卷土重来的西方殖民势力之时，一些东南亚民族主义者也并不排斥于借助残留于当地的日本军人的帮助。事实上，在战后的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有相当数量的日军官兵滞留在当地，而其中又有相当数量的人员出于种种理由自发地加入到当地对抗前殖民势力的战争当中，为民族主义者们提供军事技能方面的协助。^②

除了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之外，日本的入侵同样在社会及文化层面上给东南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层面上，首先是日军在各占领地从城市到乡村都组建了大量的民众组织，包括“邻组”（隣組）、青年团、警防团、自警团和妇人会等。通过这些组织，东南亚无论是中央到地方还是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实现了民众与社会向组织化方向的过渡。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仍然存在着以当年“邻组”为原型的 RT（Rukun Tetangga）^③与 RW（Rukun Warga）这样的基层居民组织，足见这一举动的重要性。^④其次是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战前的东南亚社会处于阶层固化的状态。而战争打破了这一局面赖以维持的殖民与社会传统秩序，又随着之前提到的一大批民间组织的建立实现了城市与农村人员的移动和交流。而随着乡村社会的逐渐开放，日本人开始在人事方面采取相对注重才能而非唯出身论的选任方式并部分地提供了与之相对应的受教育途径。比如在地方长官的任用以及义勇军军官的任命这种社会上升的渠道上摒弃过去那种注重出身的传统，并增加了个人在接受教育提升能力方面的机会。^⑤最后，日本人也造成了当地民族对立这一消极的影响。比如在英国和荷兰殖民时期，当地的少数民族会受到优待而主体民族会受到打压。而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人往往会反其道而行之。受这一影响最为显著的恐怕是马来亚。在战时，日本人会任命马来人担任警官来取缔华侨华人抗日运动，这就招致了两者在战后

^①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p.257.

^②详细情况请参阅井川一久、加藤則夫、白石昌也合著的「ベトナム独立戦争参加日本人の事跡に基づく日越のあり方に関する研究」（東京財団研究報告書、2005）；立川京一的「インドシナ残留日本兵の研究」【戦史研究年報】第5号（2002年3月）；後藤乾一の「東南アジアから見た近現代日本——「南進」・占領・脱植民地化をめぐる歴史認識」（岩波書店、2012年）中的相关章节。

^③小林和夫「インドネシアの住民組織 RT・RW の淵源—日本占領期ジャワにおける隣組・字常会の導入—」、【総合都市研究】、第71号（2000）、175～191頁。

^④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南進の「衝撃」と「遺産」—」岩波書店、2010年、310頁、321頁。

长时间的对立，并进一步影响到该地区的民族和解、独立的进程以及独立后国家的组成形态等问题。^①

而在文化方面，日本的同化政策（以奴化为目的）无法在短期内有效实施，所以他们转而开始推动当地语言的普及。日本出于宣传需要将宗主国语言的使用排除之后试图推广日语的普及，但这并非易事。结果，出于现实形势的需要，印尼语和他加禄语这种当地语言被作为公用语言被普及开来。这也就导致当地人民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而民族主义者在使用民族语言同民众交谈以强化民族一体感的同时，也将其作为自己获取支持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日本在战时与东南亚实行的文化政策在今天一般被认为已经难觅踪影。但是也很难否认日本人客观上刺激了当地原住民文化发展。以文学、音乐、话剧、电影等形式而被发掘的原住民题材（日本的本意是为了推广文化上的奴化）成为了培养民族认同的途径，并通过当地语言所展现，其对东南亚发展独立文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刺激作用。^②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战时的印尼设置的“启民文化指导所”，这一机构除了以促进传统艺术为目的进行艺术从业者的教育和培训外，更对以当地语语言制作的电影的拍摄和上映采取奖励措施。^③当然，日本人的这些文化政策的根本目的或者实质是为了在文化上对当地民众进行奴化教育，以培养殖民“忠诚”。

总体上看，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在根除西方殖民帝国的权威与影响方面，他们无情且高效，并因此获得了部分当地人的支持；但在重建当地秩序并兑现战前的承诺方面，日本人则显得效率低下，再加上暴行与掠夺的与日俱增，使得东南亚人无论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逐渐丧失了与日本合作的意愿，并转而与之对抗，也使得日本所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在当地人心中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第三节：“双重枷锁”与“双重使命”

^①立川京一「東南アジアにとっての太平洋戦争」『平成24年度戦争史研究国際フォーラム報告書』防衛省防衛研究所、2012年5月、67-75頁。

^②同上。

^③Aiko Kurasawa, "Films as Propaganda Media on Java under the Japanese, 1942-45" in Goodman, Grant K., ed., *Japanese Cultural Policies in Southeast Asia during World War 2*,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p. 37-38, 47.

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由于长期受到当地殖民当局的压迫，同时也受到日本所宣传的“亚细亚主义”与“大东亚共荣”的蛊惑，曾经将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束缚，争取民族和国家的独立的希望寄托于日本，并在后者入侵之时提供过一定程度的合作以希望获取预期的回报。然而日本占领东南亚的真正目的在于将其“全域作为‘物资和人力的供给源’而置于日本事实上的支配之下”，^①两者根本目的上的巨大差异就注定了这种合作的最终破裂。同时这也意味着东南亚在刚刚摆脱西方殖民者的统治后又会陷于日本的全面支配中，等于只是将“枷锁”的“主人”换掉而未打破这种“枷锁”。而在一些特殊地区（法属印度支那），甚至会出现原宗主国与侵略者共同统治当地这一“双重枷锁”存在的情况。同时，这也赋予了民族主义者在实现自身目标的过程中既要反抗西方殖民者，又要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双重使命”。

作为遭受“双重枷锁”束缚最为严重的地区，法属印度支那在整个战争期间遭受了惨重的人员和物质损失。如前文所述，由于日本在法印长期实行“静谧保持”的政策，从而对法国殖民者镇压当地民族主义运动的行为采取消极的应对态度。此举很快使除一部分亲日知识分子之外的法印民众原本对日本抱有的期望烟消云散，转而开始支持由胡志明所领导的越盟，显然后者的“土地改革与减少地租”的“明确口号”对于“国民中占据大多数地位的希望改善贫穷困苦处境的农民”比日本人虚无缥缈的“大东亚共荣”口号与言行不一的举动更具有吸引力。^②另一方面，日本入侵后使当地本已不堪重负的经济雪上加霜。1945^年，在河内的一本知识分子主办的名为《清议》的杂志上有这样一段描述：

“经过大概一个世纪的法国的统治，特别是这四年来，农民们遭受到了巨大的牺牲与压榨。用汗水收获的大米近在眼前，却不得不默默地忍饥挨饿而将其拱手让人。织着绢和棉花的妻子却衣不蔽体忍受寒冷。虽然生产出油和盐，但每天却只能小口喝着没什么味道的糠粥果腹，夜晚就只能待在没有一盏灯的漆黑的小屋中。恐怕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也没有那段时期能像今日这样使农民蒙受如此巨大的牺牲了吧。”^③

在这段感性的描述背后，是法印的广大底层民众在双重压迫下的不堪重负。

^①後藤乾一「東南アジアから見た近現代日本——「南進」・占領・脱植民地化をめぐる歴史認識」、329頁。

^②内海愛子、田辺寿夫「アジアからみた「大東亜共栄圏」——教科書に書かれなかった戦争part2」、梨の木舎、1995年、120頁。

^③同上，121頁

尽管相比于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法印并未直接陷入战火而招致经济上的破坏，但根据之前签署的《日法共同防卫协定》中的条款，法印当局每年需报销日本占领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从表 4-2 可以看出这笔费用是呈直线上升的态势。希望将这一负担转嫁到当地民众身上的法国人，大肆超发货币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各阶层民众的生活均陷入了困境，同时存在的强征粮食现象也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更加困苦。除此之外，日军为了建设机场和兵营还强征劳役，房屋，车、船、牛马等交通工具，并强制当地将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转为种植麻等经济作物，这种行为同之前的强征粮食一道构成了战争末期越南北方发生的一场可能导致超过 200 万人饿死的大饥荒的直接诱因。^①

表 4-2 日军占领法印年度费用表（单位：越南盾）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6000000	58000000	86000000	117000000	363000000	90000000

资料来源 内海愛子、田辺寿夫『アジアからみた「大東亜共栄圏」——教科書に書かれなかった戦争 part2』、梨の木舎、1995 年、122 頁。

而在东南亚的其他地区，尽管日本人代替了原来的宗主国进行统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的负担就会比受到双重压迫的法印要轻。不同于台湾、朝鲜和中国东北等与日本所谓“同文同种”的占领区，东南亚对日本人来说是相隔甚远的异文化圈，传统上被其视作“文化程度较低”^②的地区，再加上日本对于当地资源的迫切需要，导致了军政当局的统治比起之前的殖民政府更为强硬和残酷。但是，由于占领地区的广大和兵力的有限，又迫使日本人不得不倚重当地愿意提供合作的民族主义者们，以求用最少花费获取最大效果。如表 4-3 所示，当时日本在东南亚的主要合作者们毫无例外都接受过先进的西式教育，但这种教育并未使其产生对西方殖民者的忠诚，而是在宗主国被击败后纷纷投身至日本人麾下。不管这些人的动机究竟为何，其在客观上协助了日本的入侵和占领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随着战局的演变愈发对日本人不利，一些实用主义者如銚披汶等最先开始动摇，

^①内海愛子、田辺寿夫『アジアからみた「大東亜共栄圏」——教科書に書かれなかった戦争 part2』、122~123 頁。

^②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南進の「衝撃」と「遺産」』、岩波書店、2010、275 頁。

甚至拒绝亲自参加“大东亚会议”。但多数人还是选择与日本共同进退，劳威尔和巴莫甚至不惜背井离乡，但从二者战后的遭遇来看，似乎也并未因对日本的忠诚而受到太多责难。而对于同日本人合作最为紧密的苏加诺和哈达来说，日本的战败仅仅是另一场更为艰苦的斗争的开端，比起仅仅占领印尼4年的日本人，染指当地超过300年的荷兰人的卷土重来显然是更加无法容忍的情况。从这些民族精英转换立场的熟练程度上似乎可以让人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在他们眼中，日本人与西方殖民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均可以成为实现其民族独立目标的可供利用的并注定要被抛弃的工具。

表 4-3 东南亚主要政治领导者与日本的关系

	苏加诺 (1901—— 1970)	哈达 (1902—— 1980)	劳威尔 (1891—— 1959)	巴莫 (1893—— 1977)	奎披汶 (1897—— 1964)
教育背景	万隆工科大学	鹿特丹商科 大学	耶鲁大学	剑桥大学	法兰西炮兵 学校
开战前约5 年间的地位	服刑	服刑	最高法院法 官	首相，后入 狱	首相
战前是否曾 访问过日本	无	有(1933 年)	有(1938 年)	无	有(1930 年)
政治立场	反荷民族主 义	社会民族主 义	亲美精英	反英民族主 义	收复失地， 保持独立
战时地位	“爪哇奉 公”会中央 本部部长	“爪哇奉公 会”中央奉 公会议副议 长	“菲律宾独 立国”总统	“缅甸独立 国”首相	首相，后下 野
与日本首相 会谈(访日) 次数	2次(1)	2次(1)	4次(3)	5次(4)	1次

大东亚会议	未被邀请	未被邀请	参加	参加	拒绝参加， 派遣代表
日本方面的 评价	“通力合 作”	“通力合 作”	“通力合 作”	“有些讨 厌”	“需要提 防”
战后	一段时间内 被政敌视为 “日本的走 狗”；总统	副总统	从巢鸭监狱 被释放；上 院议员	从巢鸭监狱 被释放；被 政敌监禁	被一时拘 禁；首相； 流亡国外

资料来源：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南進の「衝撃」と「遺産」』、岩波書店、2010、277頁。

而作为经济凋敝与残酷统治更直接的承受者，东南亚广大的普通民众以及中下级官员比起精英们显然对于日本人有着更为强烈的反抗情绪。从表 4-4 中可以看到，在东南亚的大多数地区，日本人的统治都不算稳固。在日军暴行最为频繁的马来亚和新加坡，当地的抵抗活动的烈度也最为激烈。而即使是在最为恭顺的印度尼西亚，也有因不堪日军暴行的武装起义存在。至于菲律宾、缅甸和泰国，则是随着战争局势的演变，其打破日本束缚的尝试也愈发频繁。如果从反抗的模式来看，则同西方盟国串联的势力与左派甚至共产主义势力组织的抵抗活动可谓并驾齐驱，这也预示了战后该地区转变为冷战前沿的宿命。而由于日军对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的粗暴干涉所诱发的武装反抗的数量如此众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人在战前对于收集当地民情风俗的情报之不足，也从反面证明了其所谓“大东亚共荣”理论的虚伪，更注定了其不久之后的失败命运。

表 4-4 主要的抗日组织·事件

地区 模式	印度尼西 亚	菲律宾	缅甸	泰国	马来 亚·新加 坡	法属印度 支那
与旧宗主 国·盟国 相联系		USAFFE (1941 年 7 月)		“自由 泰”运动 (1943 年 2 月)	“星洲华 侨抗敌动 员总会” (1941 年 12 月); “136 部 队” (1942 年 7 月)	
左派·共 产系		虎克党 (Hukbal ahap) (1942 年 3 月)	若开邦 (Rakhin e State) 起义 (1944 年 12 月); AFO 及后 身 AFPFL (1944 年 8 月)		“马来亚 人民抗日 军” (1942 年 3 月)	越盟 (1941 年 5 月)
日本军创 立的各类 组织	勿里达 (Blitar) 起义 (1945 年		“缅甸国 防军”同 AFPFL 共 同实施的			

	2月)		起义 (1945年 3月)			
社会·经济·文化的诱因	新加帕勒那 (Singapura) 事件 (1944年2月); 南安迪 (Indramayu) 事件 (1944年4月)			班蓬(Ban Pong) 事件 (1942年3月)	亚庇 (Kota Kinabalu/Jesselton) 事件 (1943年10月)	
日本方面的过激反应	庞提纳克 (Pontianak) 事件 (1943年10月); 巴巴岛 (Babar Islands) 居民屠杀事件 (1944年11月)				华侨大屠杀 (1942年2月)	

资料来源：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南進の「衝撃」と「遺産」』、岩波書店、2010、279頁。

总的来看，东南亚的民族主义精英和普通民众尽管行为选择和行动模式随空

间和时间的以及意识形态的转移而有所不同，但其最终的目标大致一致，就是打破一切外来的束缚，实现和国家和民族的完全独立。因此，当西方殖民者以“白人的负担”自居所制造的枷锁被日本人所打破，而后者的枷锁又因为内外因的限制而未待完全成型便崩溃之后，面对卷土重来的西方势力之时，东南亚民族主义者的最终使命便不言自明了。

小结

本章试图从整体上把握日本同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在战时的关系演变的走向，并对日本的入侵对东南亚其他领域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说明。从研究的结果来看，日本的侵略和占领行为以及随后导致的长期战争的确给东南亚当地造成了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并给一些民众造成了长久的精神创伤，这些恶果必须得到承认。同时日本的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尽管这一后果并非出自日本人的本意（或者是相反的目的），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却也不应该被忽视（但也绝非如某些日本右翼言论所主张的那样作用巨大）。因为，这将有利于中国学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当地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并在实践上有利于中国处理复杂的当代东亚国际关系。

总结

首先应当指出,日本所谓的“南进”,始终是从日本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所进行的。在1941年11月20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所制定的《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领》中,就有“为了取得国防资源以及占领军实现当地自给自足,不得不在民生方面进行压缩,对此进行的宣传要注意不能违反这一目的的实现”与“要强化当地原住民对皇军的信赖,并避免过早诱发其独立运动”^①这样的以日本利益为优先的安排,这也反映了日本“南进”的真实意图绝非是其所标榜的“将东南亚从西方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那样的冠冕堂皇,而是试图取代西方殖民者继续奴役和掠夺当地以获取将侵略战争与军国体制维持下去的战争资源。

而从太平洋战争开始直到日本战败所一直伴随着的,是日本对东南亚各地区的侵略、干涉、占领和殖民地支配,给当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与此同时,,即使并非出于本意,但日本的入侵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客观环境。当然,由于东南亚范围广大,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这就必然导致日本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在不同空间和时间的维度上会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这里所说的客观环境是综合了日本各种侵略、压迫、宣传、拉拢、欺骗、掠夺和施暴行为的产物,并非是导致东南亚实现战后独立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利用这一产物的东南亚民族主义者自身的选择。

其一,战争初期日军对西方殖民地军队的压倒性胜利,为东南亚各地的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来自原殖民政府的压力大为减小,同时也使西方各宗主国的威信有了较大程度的丧失,使得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对于对抗在战后卷土重来的殖民势力做好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其二,日本在占领和支配东南亚的同时也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欺骗性口号为幌子,宣称将“东南亚从西方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来换取当地人的支持,而后者至少在一开始对日本人抱有着幻想与期待,并认为其不仅仅是宣传而已。然而,日本却对东南亚采取了比西方殖民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镇压和经

^①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领,「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152100、占领地行政に関する決定綴 昭和16年11月~昭和18年3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济掠夺政策。此外因战争导致的经济破坏和产业萧条也给东南亚人民造成了莫大的损失和痛苦。这也造成了东南亚人民对日本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与反日情绪的滋长，并成为当地日后以抗日为主要目的的民族解放斗争发展的重要原因。

其三，日本为使东南亚当地人对军政持合作态度，组织了各式各样的亲日的群众运动，并起用具有威望的民族主义政治家担任各级机构的领导，使他们获得了较之在战前西方殖民时期更为丰富的行政经验。在这方面又以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民族主义者为代表，他们一方面与日本军政当局周旋应付，同时又巧妙地运用群众运动，将民族意识直接牢牢地灌输到民众的脑海之中。这一行动在促进民族主义运动飞速发展的同时，又使这些领袖在运动中的地位愈发稳固。

其四，日本军政当局将前殖民地统治机构的西方人官员大量裁撤，并提拔原先由当地人充当的中下层官吏来接任这些高级职位（这些职位多数并没有实权），这就使后者积累了一定程度的经验，并刺激了战后东南亚各独立国家独自建立行政体制的尝试。而且，日军为了在当地人当中开拓兵源，给当地人提供了军事训练和接触轻武器的机会，这有助于各国在战后组织对抗重返的殖民势力的武装力量。

其五，在战争末期，面临战败危机的日本在面对各占领地区人民对于军政当局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时，为了使他们保持合作的态度，对于缅甸、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地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承认。这当然并非出自日本的本意而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让步，这种态度令东南亚各地区的民族主义领袖对日本的不满和不信任感与日俱增，并强化了其在日本战败后对于实现真正独立的渴望。

东南亚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利用了以上所说的日本的占领所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以及其他状况，通过不断积累与日本军政应对的各种经验，不断壮大着各自的势力，并构筑了通往未来民族独立的道路。还有一点，是同日本军政的妥协与合作。各地区的稳健派与激进派民族主义势力，从一开始的各自为战到最后的携手并进。他们一方面同军政当局合作以对其进行政治上的利用，同时也根据自身的立场来从事对民众的工作谋求增强他们的民族意识。在这一点上激进派要比稳健派来得更要积极。印尼和缅甸的激进派领袖均同抗日地下组织暗中联络并对其进行支援。而缅甸的激进派更是在战争末期更是以抗日游击战的形态掀起反日的武装斗争。这些激进派民族主义者诸如此类的对日本人先利用后转而对抗的

举动，使他们虽然有着同日本侵略者合作过的历史，但却依然能够获得本国民众的支持与西方盟国方面的谅解。这也使他们能够在日本投降后掌握各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国家政治体制创建的主导权。

民族主义运动对于日本军政还有一种反应，就是抗日地下活动与公开的武装斗争的形式。这种斗争在各地区以共产主义势力与激进派民族主义势力单独和共同领导人民大众的形式来进行着。抗日武装力量以游击战的形式不断袭击日本占领军与对日合作者，并对其造成大量损失。他们在菲律宾和越南甚至建立了“解放区”，并在这里进行了以土地为中心的大大小的社会改革。而且这些抗日武装斗争还因为与参加了军政体系的激进派民族主义者以及盟军方面暗中进行密切合作而发展得更为迅速。这样的大规模、深层次以及同外部势力进行广泛合作的针对统治当局的武装斗争，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中并不普遍，因此锻炼了其领导者和追随者的能力，并使其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形势下成为了民族独立运动的新的中坚力量。越南的共产主义势力，缅甸的激进主义势力等都在战后掌握了民族独立运动和国家政治的领导权。而对于菲律宾和马来亚来说，其武装势力的发展也无法使重返当地的西方殖民者坐视不管，并逼迫他们在今后长时间内用军事力量予以应对。

总而言之，因为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与日本的侵略所催生的形势以及其他条件的主动、积极地利用并与日本占领者不断进行周旋，东南亚的反殖民主义以及民族运动相较战前有了较程度的发展。到了战争后期，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者审时度势，抛弃了行将失败的日本人，从而免于受到来自同盟国方面的惩罚，甚至掌握了战后博弈的主动权。而日本的残酷统治与最终失败也是战后东南亚各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与最终取得民族独立胜利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这也意味着，太平洋战争是东南亚各国民族独立运动史中的一次比较重要的转折点。但也必须看到，除了个别时间段与个别人物之外，日本同东南亚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互动很难称得上是真诚与互利的，更多的是相互利用，甚至到最后会转为相互对抗。东南亚能在战后获得独立，日本等外部势力的干预固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最大的功劳应归功于东南亚人民自身孜孜不倦的奋斗与牺牲。对此有学者认为“……不光是因为日本在战争初期的胜利，如果没有日本的战败——由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苏联的参战，中国的对日长期抗战，东南亚占领地的抗日民族

主义情绪的高涨。或许还有厌战情绪在日本社会的蔓延等——的话，东南亚的解放就不会存在，或是会大幅延迟，这是很容易估计到的”。^①因此，在当今日本等西方势力试图重返东南亚时，当地人民应该牢记历史教训，不轻信任何外部势力的宣传与拉拢，真正将这一地区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①後藤乾一『東南アジアから見た近現代日本——「南進」・占領・脱植民地化をめぐる歴史認識』、330頁。

参考文献

原始資料

1. 「機密戦争日誌」其 7、参謀本部第 20 班（第 15 課）、昭和 18 年 12 月 8 日~19 年 5 月 20 日（1943/12/08 - 1944/05/20）。
2. 「ミャンマー国防相「旧日本軍の独立支援にいつも感謝」稲田朋美防衛相と会談」、産経ニュース(2016/9/21)。
3. A. J. Grajdanzev, "Japan's Co-Prosperity Sphere", *Pacific Affairs*, Vol. 16, No. 3 (Sep., 1943), pp. 311-328.
4. *Atlantic Charter (1)*, The National Archives Catalog | National Archives,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 (Franklin D.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1933 – 1945.
5. Ba Maw, *Breakthrough in Burma: Memoirs of a Revolution, 1939-1946*, New Haven and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6. *Inter-Allied Council Statement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Atlantic Charter*,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September 24, 1941.
7.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10 August 1945, Current Intelligence Study Number 35.
8. ビルマ独立指導要綱、陸軍 | 大本營政府連絡會議、昭和 18 年 2 月 20 日~昭和 18 年 3 月 10 日（1943/02/20 - 1943/03/10）。
9. 朝日新聞社中央調査会 編『朝日東亜年報.昭和 18 年 第 1 輯 世界戦局の展望』、朝日新聞社、1943 年。
10. 朝日新聞社中央調査会 編『朝日東亜年報.昭和 18 年 第 2 輯 新支那經濟の基本動向』、朝日新聞社、1943 年。
11. 大阪南方院『大東亜共栄圏の常識』、大阪南方院、1943 年。
12. 大東亜戦争関係一件 / 東印度問題（蘭印ヲ含ム）、江村事務官 | 関係省主務者、昭和 19 年 9 月 2 日~昭和 20 年 7 月 17 日（1944/09/02 - 1945/07/17）。
13. 大東亜戦争完遂ノ為ノビルマ独立施策ニ関スル件、大日本帝国政府、昭和 18 年 1 月 14 日（1943/01/14）。

14. 大陸命第555号、参謀總長杉山元、昭和16年11月6日(1941/11/06)。
15. 大陸命第五百九十号、大本營陸軍部、昭和17年1月22日(1942/01/22)。
16. 大陸指第九百二十四號、大本營陸軍部、昭和16年7月19日～昭和16年8月18日(1941/07/19 - 1941/08/18)。
17. 第15軍中部緬甸地方作戰計画、第十五軍司令部、昭和17年3月15日(1942/03/15)。
18. 東印度独立措置に関する件、最高戦争指導会議、昭和20年7月17日(1945/07/17)。
19. 対米英蘭蒋戦争終末促進に関する腹案、連絡会議、昭和16年11月15日(1941/11/15)。
20. 佛印現指導機関と和平友好に関する件電、澄田機関、昭和15年10月7日(1940/10/07)。
21. 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寄两广总督张之洞电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85页。
22. 国策ノ基準、広田内閣閣議、昭和11年08月11日(1936/08/11)。
23. 鈴木一馬『銃後の米英撃滅戦』新紘社、1944年。
24. 緬甸に関する謀略実施等に関する件、南方軍、昭和17年1月6日(1942/01/06)。
25. 緬甸作戰に伴ふ軍政施行要領、陸軍省、昭和17年(1942 - 1942)。
26. 末広鉄腸『鴻雪録』博文堂、1890年。
27. 南方軍宣伝計画、南方軍總司令部――南方軍總司令官伯爵寺内壽一、昭和17年6月20日(1942/06/20)。
28. 南方占領地帰属ニ関スル思想調整ノ腹案、大本營政府連絡会議――外務省、昭和16年12月19日(1941/12/19)。
29. 南方占領地行政実施要領、大本營政府連絡会議決定、昭和16年11月20日
30. 南方作戰ニ伴フ占領地統治要綱、大本營陸軍部、昭和16年11月25日(1941/11/25)。

31. 情報局記者会『大東亜共同宣言』新紀元社、1944 年。
32. 情勢の変化に応ずる対仏措置腹案、大本營政府連絡會議決定、昭和 19 年 1 月 24 日 (1944/01/24)。
33. 三省堂南方文化講座刊行係編『南方文化講座—民族と民族運動篇』、三省堂、1944 年。
34. 蘇峰徳富猪一郎『必勝国民読本』毎日新聞社、1944 年。
35. 下村宏『決戦期の日本』、朝日新聞社、1944 年。
36. 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1932 至 1942 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蒋相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
37. 越南巢南子述，梁启超撰：《越南亡国史（记越南人之言）》，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第 508-542 页。
38. 占領地軍政実施に関する陸海軍中央協定、參謀總長杉山元、昭和 16 年 1 月 26 日 (1941/11/26)。
39. 志賀富士男編『志賀重昂全集』（全八卷）、志賀重昂全集刊行会、1928 年。
40. 竹越與三郎『南国記』，東京二酉社、1910 年。

日文

专著

1. アジアアフリカ研究所編『ベトナム解放史：資料』（全三冊）、東京：労働旬報社、1970 年。
2. 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南進の「衝撃」と「遺産」』、岩波書店、2010 年。
3. 後藤乾一『昭和期日本とインドネシア-1930 年代「南進」の論理・「日本観」の系譜』勁草書房、1986 年。
4. 後藤乾一『東南アジアから見た近現代日本——「南進」・占領・脱植民地化をめぐる歴史認識』、岩波書店、2012 年。
5. 後藤乾一『日本占領期インドネシア研究』、東京：龍溪書舎、1989 年。

6. 黒田秀俊『軍政』、學風書院、1952年。
7. 瀬島龍三『大東亜戦争の実相』、東京：PHP 研究所、2000年。
8. 内海愛子、田辺寿夫『アジアからみた「大東亜共栄圏」——教科書に書かれなかった戦争 part2』、梨の木舎、1995年。
9. 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全4巻）、鱒書房、1953年。
10.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年。
11. 矢野暢『日本の「南進」と東南アジア』、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75年。
12. 矢野暢『日本の南洋史観』、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年。
13. 歴史学研究会編『太平洋戦争史』（全6巻）、東京：青木書店、1973年。
14. 徳富猪一郎『陸軍大將川上操六』東京：第一公論社、1942年。

論文

1. 井川一久、加藤則夫、白石昌也「ベトナム独立戦争参加日本人の事跡に基づく日越のあり方に関する研究」、東京財団研究報告書、2005年。
2. 久保田 武「東南アジア諸国が抱いた日本像：日本占領期を中心に」『教育総合研究：日本教育大学院大学紀要』東京：日本教育大学院大学、第6号（2013年3月）、1-25頁。
3. 高津茂<論説>両大戦間期におけるカオダイ教と日本との関わり(下):『復国時期 1941-1946におけるカオダイ教の歴史』を中心として、『東洋文化研究』16号（2014年3月）、49～83頁。
4. 高津茂<論説>両大戦間期におけるカオダイ教と日本との関わり(上):『復国時期 1941-1946におけるカオダイ教の歴史』を中心として、『東洋文化研究』15号（2013年3月）、81～122頁。
5. 小林和夫「インドネシアの住民組織 RT, RW の淵源—日本占領期ジャワにおける隣組・字常会の導入」、『総合都市研究』、第71号（2000）、175～191頁。
6. 谷川栄彦「太平洋戦争と東南アジア民族独立運動」、『法政研究』、福岡：九

- 州大学法政学会、第 53 巻第 3 号（1987.03）、361 ～398 頁。
7. 白石昌也・古田元夫「太平洋戦争期の日本の対インドシナ政策—その二つの特異性をめぐって—」『アジア研究』第 23 巻第 3 号（1976 年 10 月）、1～37 頁。
8. 立川京一「インドシナ残留日本兵の研究」『戦史研究年報』第 5 号（2002 年 3 月）。
9. 立川京一「東南アジアにとっての太平洋戦争」『平成 24 年度戦争史研究国際フォーラム報告書』防衛省防衛研究所、2012 年 5 月、67-75 頁。
10. 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とフランス領インドシナー「日仏協力」の研究—」彩流社、2000 年、157～59 頁。
11. 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期の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と日本」、『防衛研究所紀要』第 3 巻第 2 号（2000 年 11 月）、67 ～88 頁。

英文

专著

1. Alfred W. McCoy, eds., *Southeast Asia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80.
2.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6.
3. Benedict Anderson, *Java in a Time of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1944-1946*,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4. Benedict Anderson, *Some Aspects of Indonesian Politics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 1944-1945*, New York :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1961.
5. Bill Yenne,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The Invincible Years, 1941-42*, Osprey Publishing, 2014.
6. Bob Reece, *Masa Jepun: Sarawak Under the Japanese, 1941-1945*, Sarawak Literary Society, 1998.

7. Datuk Sharom Ahmat, eds., *Reminiscences of Tunku Abdul Rahman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1-1945*, Pulau Pinang : Jawatankuasa Sejarah Lisan dan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1989.
8. E. Bruce Reynolds, *Thailand and Japan's Southern Advance, 1940-1945*, Hounds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9. Elizabeth Borgwardt, *A new deal for the world: America's vision for human righ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 Elmer Norton Lea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Leyte, 1941-1945*, Ithaca, N.Y. : Southeast Asia Program, Dept. of Far Easter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1961.
11. F. C. Jones, *Japan's New Order in East Asia: Its Rise and Fall, 1937-194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12. Frank McLynn, *The Burma Campaign: Disaster into Triumph, 1942-45*,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 Ienaga Saburo, *Japan's last war : World War II and the Japanese, 1931-1945*,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1978.
14. Jan Becka,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in Burma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1941-1945*, Prague : Oriental Institute in Academia, 1983.
15. John Hayter, *Priest in Prison : Four Years of Life in Japanese-occupied Singapore, 1941-1945*, Rangoon, Singapore : Graham Brash, 1991.
16. John Toland,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 Toronto : London : Bantam, 1971.
17. Jon Halliday and Gavan McComack, *Japanese Imperialism Today: "co-prosperity in Greater East Asia"*, Harmondsworth : Penguin, 1973.
18. Jon Livingston, eds., *Imperial Japan, 1800-1945*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1973.
19. Joyce C. Lebra, *Japanese-trained Armi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0.
20. Justin Corfield, *A Bibliography of the Malayan Campaign and the Japanese Period in West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orneo, 1941-1945*. Lewiston, N.Y. : Edwin

- Mellen Press, 2001.
21. Lawrence Olson, *Japan in postwar Asia*,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70.
 22. M. C. Ricklefs,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since c.1200*,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23. Neta C. Crawford, *Argument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Ethics, Decolonization, 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4. 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Singapore : Horizon, 2001.
 25. 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2,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6. Nicholas Tarling, *Na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If the people are with u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27.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1—1945*, London: C. Hurst, 1998.
 28. Paul H. Kratoska, eds., *Food Supplies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South-East Asia*. Houndmills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29. Paul H. Kratoska,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0-1945*,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2.
 30.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C. Hurst & Co. Publishers, 1998.
 31. Richard J. Smethurst, *A Social Basis for Prewar Japanese Militarism: The Arm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1974.
 32. Suetō Sudo, *The Fukuda Doctrine and ASEAN : new dimensions i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Singapore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33. Tan Beng Luan, eds.,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1945 : A Pictorial Record of Singapore During the War*, Singapore : Times Editions, 1996.
 34. Willard H. Elsbree, *Japan's Role in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st Movements*,

1940—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35. William G. Beasley, *Japanese imperialism, 1894-1945*.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87.

36. William H. Newell, eds., *Japan in Asia, 1942-1945*. Singapore :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1.

37. William Roger Louis, *More adventures with Britannia: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Britain*, London: I.B.Tauris, 1998.

论文

1. Aiko Kurasawa, “ Films as Propaganda Media on Java under the Japanese, 1942-45 ” in Goodman, Grant K., ed., *Japanese Cultural Policies in Southeast Asia during World War 2*,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2. B. H. Farmer, “Perspectives on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South 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20, No. 1 (1986).

3. Lousis M. Allen, “Fujiwara and Suzuki: Patterns of Asian Liberation”, in William H. Newell ed., *Japan in Asia 1942-1945*,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 Radin Soenarno, “Malay Nationalism, 1896-194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1, No. 1, Nationalism in Malaya (Mar., 1960), pp. 1-28.

5. Stephen Uhalley, Jr., “Japan's Southern Advance: The Indochina Phase”, *Asian Studies*, (April 1966), pp.84-102.

6. William Roger Louis, “American Anti-Coloni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 Vol. 61, No.3 (Summer, 1985), pp. 395-420.

中文

专著（含译著）

1. B·Φ·瓦西里耶夫：《缅甸史纲》，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历史研究室、外语系编译组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
2. D·G·E·霍尔：《东南亚史》（上册），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3.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一卷 季风吹拂下的土地），吴小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4. 毕世鸿：《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5. 陈衍德：《对抗、适应与融合——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岳麓书社，2003年。
6. 道格拉斯·福特：《太平洋战争》，刘建波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
7.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全四册），张宝祥、赵宝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8. 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上册）》，吴世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9. 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一个越南民族主义的伪装者》，传记文学，1970年。
10. 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11.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 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姜晚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12.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一册 天皇制军队的形成），姜晚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13. 梁英明、梁志朋等：《东南亚近现代史》（上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

14. 林庆元, 杨齐福:《“大东亚共荣圈”源流》,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
15. 米庆余:《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16. 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 贺圣达等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室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室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大本营陆军部〉》摘译》,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9. 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 东英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 年。
20.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21. 小坂文乃:《孙中山与梅屋庄吉》, 吴艳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 年。
22.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 西欧的冲击与开国), 周启乾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1982 年。
23.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 走向大东亚战争的道路), 周启乾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
24.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下册),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25. 熊沛彪:《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26. 依田熹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 1868-1945》, 卞立强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27. 原不二夫:《英属马来亚的日本人》, 刘晓民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28. 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下册)》, 姚楠、马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
29. 臧运祜:《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30. 中村隆英编：《日本经济史 7：“计划化”和“民主化”》，历以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年。
3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
32.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

期刊论文

1. 陈奉林：《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源流》，《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5 期。
2. 陈奉林：《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源流的再探讨》，《日本学论坛》，1997 年第 2 期。
3. 陈小冲：《日本南进政策中的台湾——以福建官脑局案为中心之个案分析》，《台湾研究集刊》，1988 年第 4 期。
4. 陈艳云：《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对东南亚日侨的调查——以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为中心》，《南洋问题研究》，2009 年第 4 期。
5. 陈艳云：《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对南洋种植业的调查与日本南进政策》，《求索》，2010 年第 8 期。
6. 黄光耀：《中国抗战与日本南进政策的选择》，《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6 期。
7. 黄生秀：《中国抗战与日本北进、南进》，《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3 年第 3 期。
8. 纪宗安，崔丕：《日本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1925-1945）》，《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 期。
9. 李国梁：《日本“军政”统治下的东南亚华侨》，《八桂侨刊》，2005 年第 3 期。
10. 李国梁：《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政的华侨政策》，《东南亚》，1987 年第 4 期。
11. 刘显忠：《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在苏联的实践》，《俄罗斯学刊》2016

年第4期。

12. 宋立道:《佛教民族主义在南亚·东南亚的发展》,《佛学研究》,1996年第5期。

13. 孙福生:《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对东南亚政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14. 田边寿夫:《日本军政下缅甸左翼的活动》,司韦译,南洋资料译丛,2007年第1期。

15. 王学新:《南进政策下的籍民教育(1895-1937)》,《国史馆学术集刊》,第十四期。

16. 余茂辉:《略论中国抗日战争对日本“南进”政策的牵制》,《咸宁师专学报》,1991年第8期。

17. 余子道:《中国抗战与日本的南进政策》,《江海学刊》,1995年第2期。

18. 斋藤照子:《二战期间日军对缅工作机构——南机关再考》,司韦译,南洋资料译丛,2009年第2期。

19. 周俊:《二战前日本南进政策形成的历史脉络——海洋史视角下国际关系》,《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学位论文

1. 卞凤奎:《台湾总督府的华南与南洋拓进政策——以籍民为中心探讨》,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1年。

2. 李文超:《二战时期缅甸民族主义精英对日本态度的转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5年。

3. 汪济南:《论日本近代南部扩张战略的形成与实施(1868——1941)》,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5年。

4. 王学新:《日本对华南进政策与台湾籍民之研究(1895-1945)——兼论台湾黑帮籍民的形成与演变》,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7年。

5. 王云翠:《日本陆军派阀与战略抉择》,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6. 吴永航:《知识分子与缅甸独立运动之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师范大学,2015年。
7. 杨梅:《“我缅人协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0年。
8. 张坚:《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研究(1912-1928)》,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2年。
9. 张旭东:《缅甸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2年。
10. 张艳军:《论日本的南中国海政策:1901-1945》,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师范大学,2012年。
11. 周彦宇:《日本“南进政策”原因探析》,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电子文献数据库

1. 「岸幸一コレクション-南方関係軍政・海軍資料を中心に」
http://d-arch.ide.go.jp/asia_archive/collections/Kishi/index.html
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1931-1941 (in two volume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http://digicoll.library.wisc.edu/cgi-bin/FRUS/FRUS-idx?type=header&id=FRUS.FRUS193141v02>
3.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http://www.jacar.go.jp/>
4.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index.html>
5.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http://dl.ndl.go.jp/>

致谢

在厦大三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活转瞬即逝，面对毕业的时节，心中百感交集，又有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你们给了我相对优越的物质条件，并在我选择读研时给予了最大的理解与支持，并在我迷茫彷徨之时关心我，鼓励我，此等养育之恩儿子当穷尽一生来报答。

然后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陈遥老师，感谢您在研一时收我为徒，并时时关心我的学习与生活。而在毕业论文的写作方面，您又对我的选题、思路和文章结构提出了许多中肯和宝贵的建议，让我受益匪浅，学生在此拜谢。

我还要感谢为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诸多宝贵学术成果的国内外学者们，以及自村山富市首相以来的历届日本政府对这一时期的史料进行保护、整理和数字化并通过互联网进行公开的行为，更要感谢九州大学的石榴学妹在百忙之中为我代购和邮寄相关的学术著作。

另外我还要感谢陈衍德、曾玲、胡锦涛山、曲天夫、李莉、赖国栋、高艳杰等世界史、中国史和南洋院的其他老师，感谢老师们对我的传道授业，让我这一个历史专业门外汉逐渐掌握了许多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并开拓了眼界，磨砺了心性。

我还要感谢历史系的同班同学，感谢你们三年来的陪伴，从你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并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

我还要感谢厦门大学的各位工作人员，感谢你们的敬业与付出，使我能专心致力于学术水平的磨炼。

最后，我要把感谢的话语留给自己，感谢你从出生到现在的努力，让我见识到了自己的潜能所在，谢谢你。

重新启程的日子已经临近，我将整理好行囊，收拾好心情，带着未竟的雄心与壮志，带着家人的期望与关怀，重新上路。

贾超

4月28日午前

于海韵公寓